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第四期(总第一〇〇期)第二十五卷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2023
第4期

2023年12月 第4期(总第100期) 第25卷
Dec.2023 No.4 Sum.100 Vol.25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



11月2日，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中华文化学院）于昆明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来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省内外院校、社科界、文艺界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从不同的研究角度作现场发言。

此次会议是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旨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更好地发挥云南中华文化学院在文化交流传播方面的作用，也是进一步落实凝聚文化共识，筑牢共同思想政治根基，坚持以学术讲政治、以文化育共识的具体行动。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进行了系统、精辟的论述，对中华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和重大理论创新。特别是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体现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了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党对文化作用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社科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要提高政治站位、履行职责，做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阐释和宣传工作。

与会专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讲好新时代云南故事”主题，从“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与品格”“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品格与意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社科工作者学习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使命担当”等方面，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了交流研讨，体现了学术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向，为持续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讲好云南故事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来自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省委统战部、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省文联、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的相关专家学者及学院干部教师近50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云南网记者 李雯）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3 年第 4 期(总第 100 期)

本刊顾问

于千千 徐 彬 苏 莉 李玛琳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高 峰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岳 宁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 波 杨松禄 罗建生 钟瑞华

诸 芳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杨松禄

副 主 任:罗 雷 李亚强

责任编辑:念兴昌 刘林华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严维国

编 务: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中央治港方略中的底线思维探析 高明鸣 (5)
- 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的逻辑关联 吉伟涛 (12)
- 统一战线共识教育的问题与创新路径探析 刘树升 (18)
- 新时代政协新闻宣传创新路径探究 张莹莹 (25)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边疆治理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
- 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董国菊 (32)
- 藏羌彝走廊：中华民族共同体要素、特质、共同性的具现 王 芬 (41)
- 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研究
- 以临沧市 44 个沿边行政村为例 唐 伟 (47)
- 演进·热点·展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探析
- 基于 VOSviewer 的 CNKI 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李俊余，安 敏 (54)

● 历史与文化

- 缘水而起：一个彝族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互动关系研究
- 钟瑞华，许姝钰 (64)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5*2023-04]

- 逻辑、困境和路径：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的多维思考 郭 路 (72)
-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治理秩序建构 陈 静 (79)
- 非遗保护传承应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 基于云龙“耳子歌”个案的思考 叶 莹 (87)
- “西南联大精神”的多维赓续及其当代价值 余梦成, 李直飞 (93)

● 发展问题研究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钱仕英 (100)
-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 以云南省网约配送员为例 黄银秀, 陈思璇 (109)
-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年 1—4 期 (总第 97—100 期) 总目 (119)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4, 2023

Contents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 Understand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trategic Line behind the Policy Regarding Hong Kong
Administration Gao Mingming (5)
- Logical Links between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deas and Culture Ji Weitao (12)
- Issues on the United Front's Consensus Education and Related Innovation Approaches
..... Liu Shusheng (18)
- Ways to Innovate the CPPCC's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Zhang Yingying (25)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 Exercis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in
Bordering Areas: A Case of Deho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the Dai and the Jinpo Dong Guoju (32)
- On and Through the Zang-Qiang-Yi Corridor: Crystallizing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into Elements, Qualities and Commonness Wang Fen (41)
- Cultural Upgrading of Bordering Villages in the View of Chinese Identification: Taking 44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along the Border in Lincang City Tang Wei (47)
- Studies o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Advancement, Issues and
Prospects Li Junyu, An Min (54)

History and Culture

- From the Water: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Order and Water-management
Mechanism of a Yi Village Community Zhong Ruihua, Xu shuyu (64)
- Logic, Dilemma and Approaches: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on Developing the Chinese Nation's Modern
Civilization Guo Lu (72)
- The CPC's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Order in Localized Governance in Period of Jinggangshan-based
Revolution Chen Jing (79)
- The Value of Protecting, Promoting and Practising with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to Forg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Ye Ying (87)
- Diversified Inheritance of the NSAU Spiri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Yu Mengcheng, Li Zhifei (93)

Issues of Development

- Research on the CPC's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Relevant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 Qian Shiyong (100)
- Study of the Employees' Injury Insurance in New Business Lines: With Online Contracted Deliverymen in
Yunnan as an Example Huang Yinxiu, Chen Sixuan (109)
- Contents of YIS Journal (Issues from 1st to 4th) (Vol. 97-100) (119)

统战理论与实践

中央治港方略中的底线思维探析

高明鸣

(中山开放大学, 广东 中山 528400)

摘要: 底线思维是中央治港方略中的重要科学思维方法, 具有忧患意识、底线意识、斗争精神、系统观念、转化意识等多重理论意涵和实践品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 中央在解决香港前途问题和治理香港的具体实践中, 均运用以特定目标为特征的底线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新时代治港方略, 展现出深刻和丰厚的底线思维特质, 主要包括: 确立了全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科学内涵的根本底线, 明确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政权建设底线, 坚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法治底线, 采取坚决斗争与积极建设相统一的底线思维, 为保持香港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治港方略; 底线思维; “一国两制”

中图分类号: D676.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4-0005-07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 始终坚持运用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 经受住一次次的生死考验, 战胜了一系列的困难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底线思维在治国理政中的运用, 在治港方略中尤其突显。梳理中央治港方略的发展脉络, 探析其中蕴含的底线思维, 有助于提升科学思维能力,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

一、底线思维的理论意涵和实践品质

“底线”是指最低的条件和最低的限度, 是不可逾越的边界线或警戒线, 是实践主体应该达到的最低期望^①。所谓“底线思维”, 则是一种以“底线”为导向, “从最坏处着眼, 做最充分的准备, 朝好的方向努力, 争取最好的结果”^②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底线思维蕴含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纵观党的历史, 可以从以下多重维度把握底线思维的理论意涵和实践品质。

一是忧患意识。底线思维注重预估风险, 强调凡事做最坏的打算, 防患于未然。事物本身潜藏的风险因素并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只有充分把握事物自身的客观规律, 才有可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抗战初期, 毛泽东同志准确研判抗日战争的艰巨性, 预估到战争必定是旷日持久的,

作者简介: 高明鸣, 中山开放大学副教授、办公室主任,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港澳治理等。

^① 张琳:《习近平“底线思维”重要论述的思想内涵及其双重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5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但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提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① 1945年，面对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同志却在党的七大上一口气列举了“十七条困难”，体现了鲜明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

二是底线意识。底线即不容突破的边界，是必须捍卫的“基本盘”。底线一旦失守，将会导致事态出现根本性的逆转和全局性的失败。底线意识体现了量变可能引起质变，关键性的局部质变将可能导致全局性质变的哲学原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以独立自主的原则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问题，体现了强烈的底线意识。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主要内容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为改革开放划定了底线，确保改革开放始终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三是斗争精神。运用底线思维的根本目的在于化解风险挑战，而风险尤其是重特大风险，往往是一系列问题与矛盾的集中表现。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战胜风险挑战。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②

四是系统观念。底线思维并非孤立地看待事物，更不是局限于细枝末节或者眼前利害的短期行为，其本身就是一种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战略思维，包含有显著的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讲话中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③ 这一论断表明底线思维应当是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而不只是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这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而在党中央最新的论述和要求中，政治风险被置于各种风险之首。政治底线意味着“保持战略定力，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确，不能有丝毫含糊。在前进道路上，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独立自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④。这突显了政治底线是最根本的底线这一战略判断。

五是转化意识。底线思维蕴含着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注重矛盾对立面的转化。在实践中，底线思维不是被动地守住一城一池，而是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作为，善于转危为机，从而“守乎其低而得乎其高”，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用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在应对风险挑战中锻炼提高，在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⑤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2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42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81页。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47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188页。

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①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在治理香港等工作领域上实现了从“危”到“机”的成功转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成果，这正是底线思维及其转化意识的生动体现。

二、中央治港方略中的底线思维溯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在解决香港前途问题以及治理香港的工作中，始终站在国家的长远和全局利益上，以清晰的底线思维审时度势，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变化不断优化调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毛泽东同志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战略决策者。早在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并签发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但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该指示反映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港政策，可概括为“暂时不动香港”以及“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体现了维护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底线与斗争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一是绝不容许英国政府策动任何形式的“港独”，这是基本底线。港英政府深知中国共产党在涉及国家主权等问题的根本立场和底线，加上受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震慑，担心一旦推行“港独”式的自治计划反而会刺激中国提前收回香港。正因如此，时任总督杨慕琦推出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最终搁浅。

二是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不变，这是基于底线的灵活机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周密的分析和研判，认为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不变更有利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周恩来同志解释道：“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在这个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②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当年由邓华所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在解放广州后顺利推进至深圳河北岸，但却出人意料地按兵不动，并没有乘胜收复香港。

三是发挥香港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是在底线基础上争取最好的结果。中央对香港采取被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内地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通道这一独特优势，既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也帮助内地瞭望资本主义世界并第一时间掌握国外动态，对改革开放事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对香港也采取特殊政策，以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为香港提供淡水、工业原料和部分生活必需品，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也从未中断。

（二）中英谈判及过渡时期：“主权问题不容讨论”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曾提出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即后来被周恩来同志概况为“一纲四目”的内容，这为后来“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打下重要的基础，并最早运用到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1月11日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将其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20页。

^② 叶张瑜：《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香港问题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47页。

作为解决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①，并从1982年9月开始经历了持续2年22轮的中英谈判。从中英谈判到筹备过渡政府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运用底线思维妥善解决香港问题。

一是以“定调子”的方式为谈判划下底线。针对撒切尔夫人提出的“以主权换治权”方案，邓小平同志当即拒斥，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收回整个香港地区，而不仅是新界，还包括港岛和九龙。同时，正告英方，希望两国合作实现平稳过渡，如谈判不成，中方将采取单方面行动；如果过渡期间香港社会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②这一底线为其后双方达成《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是为“一国两制”划下底线。1987年，为了安定人心，邓小平同志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不会动摇，否则可能保不住现在的经济发展势头，这反过来对香港也不是好事。但是中国仍会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将保持五十年不变。”他又提道：“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同时指出：“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③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明确为“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划下了清晰的底线，即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影响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国家主体制度的性质，此为关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底线；回归后的香港不应采取三权分立的体制，这是关于香港政制发展的底线；港人行使自由权利不应扭曲为对抗中央和内地，这是关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底线。

（三）回归初期：“确保香港繁荣稳定”

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正式变为现实。香港回归祖国初期，中央始终把确保香港繁荣稳定作为治港方针的底线之一，充分尊重两地的制度差异，充分信任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并以最大限度的包容处理香港事务。这一方面展示了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特区管治的平稳过渡，有助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了保障香港繁荣稳定，中央支持香港抗击1998年金融风暴，“非典”过后推出旨在促进香港经济复苏的CEPA和“自由行”政策。

三、新时代中央治港方略中的底线思维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态势，科学审视和研判香港特区发展过程中的新形势、新变化、新问题，对如何全面准确认识和贯彻“一国两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述、新方略。新时代治港方略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科学和丰厚的底线思维。

（一）根本底线：全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科学内涵

回归以来，香港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总体是成功的，香港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总体也得到落实。然而，近十年香港社会先后爆发诸如“占中”“修例风波”等严重事件，暴露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际上仍未得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的短板，其深层次问题之一在于香港部分群体并没能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忽视“一国”之同，而片面强调“两制”差异，人为制造内地与香港的区隔，抗拒甚至阻碍两地融合，鼓吹本土意识，宣扬消极和曲解的“一国两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97页。

② 宗道一：《邓小平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55页。

③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491页。

制”观念。

全面准确理解“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根本前提和底线所在。

一是在理论层面，要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总体概念，“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统一于“一国”之内，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唯有尊重、维护好“一国”，“两制”才有无限发展空间。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才能推动‘一国两制’事业行得稳、走得远。”^①2022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国两制’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前提下，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同时，又指出，“‘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彰显”。

二是在实践层面，关键在于把维护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香港回归以来，部分人员片面理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甚至将其歪曲为“完全自治”“自决”“剩余权力”等有悖于“一国两制”原意的政治企图，在行政、立法和司法层面均为完善国家治理制造巨大的障碍。2014年6月，国新办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首次明确提出“中央拥有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在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中，这一原则得到再次的确认和强调，起着重要的正本清源作用，有效扭转了一段时期里部分人员对“一国两制”理解的偏差和混乱。

（二）政权建设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香港近年出现的社会骚动乱以及立法机关无休止“拉布”等现象，暴露出香港回归后一段时间里香港特区政权建设的缺失，其政治权力的运行逐渐偏离“一国两制”的正常轨道，也背离了制度初心，且在驾驭复杂局面和应对重大风险上存在能力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越来越注重香港特区的政权建设，从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局高度，对香港特区政权建设进行全方位的亮底线、堵漏洞和补短板，有效实现了香港特区政治局面的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

一是明确国家安全底线。通过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港区国安法》），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特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均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通过设立中央驻港国安公署、香港特区国安委、警务处国安处、律政司专门检控科、特首指定法官等组织架构，建立起中央与特区合力、特区政府和“公检法”系统合作的维护国家安全治理体系。通过列明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四类罪行，为香港特区所有机构、组织和个人行使权利和自由划定了法律红线。

二是明确“爱国者治港”底线。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411页。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正式从制度层面保障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政治架构。通过扩大选举委员会代表性、完善立法会组成和选举机制、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从制度上确保邓小平同志1984年提出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得以全面落实，也从根本上大大压缩反中乱港势力的活动空间，并将其排除在特区管治体系以外。

从2020年出台《港区国安法》到2021年完善特区选举制度，中央分别从政治权利行使与政治权力运行的角度，为香港特区的政权建设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从而筑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制度之基，也从根本上重塑了香港的政治生态，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法治底线：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定海神针”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一直坚持依法治港的基本原则，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依法治港经验，如必要情况下的人大释法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更加积极主动、更加全面准确的法治思维推进依法治港，即使是面临2019年连串“黑暴”事件的严峻挑战，依旧保持清晰的战略定力，始终坚守法治底线，以富有远见的法治思维解决多年来困扰香港政治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一是高度维护宪法与基本法权威。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尤其是部分法律界人员有意或无意的建构扭曲的法理认知，如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宪制基础，认为其在回归以后仍具有法律效力；把《基本法》视作“小宪法”，试图隔断国家宪法与香港基本法的宪制联系；认为《基本法》的解释权只能基于香港终审法院的提请，不接受人大主动释法和特首提请释法；认为香港基本法的修改必须要经过香港立法会程序^①；等等。诸如此类的法理认知误区为香港特区的行政管理和司法实践带来了思想混乱，也为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制造了障碍。针对此问题，中央始终坚持从法理分析、文本解读和立法原意的高度，厘清对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基础性认知，明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作为国际法条约的使命已随着1997年政权交接完成，英国对香港已再无主权、无治权、无监督权；《基本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而制定，而不仅是依据《宪法》第31条；香港基本法的“母法”只能是国家宪法，《宪法》与《基本法》是单一制主权秩序内“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宪法》理所当然适用于香港特区，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作为对香港特区司法的必要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与特首提请释法不仅合法有效，而且正当必要；全国人大有修改《基本法》的权力。中央对香港关于《宪法》与《基本法》原理的认知误区及时正本清源，体现了对《宪法》与《基本法》权威的尊崇和维护，是坚守依法治港底线的重要体现。

二是以法治思维破解香港政治困局。面对香港特区多年来对国安立法、政制发展等重大议题的无休止内耗乃至社会内乱，中央立足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破局。在修补国家安全漏洞层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先提出“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其后，通过“全国人大决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修法+香港特区配合立法和执行”的“三步曲”推进香港关于维护国家安全、完善选举制度等方面的法治进程，及时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在政治体制层面，同样阐明《宪法》与《基本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理，进一步明确中央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明确香港特区政权是地方性政权，特区的一切政治权力来源于中央授权，不存在所谓的“固有权力”或“剩余权力”；明确香港特区实行的是以行政长官为核

^① 田飞龙：《“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评梁美芬〈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天府新论》2017年第6期，第155页。

心的行政主导体制，而不是“三权分立”体制，“司法独立”也不等于“司法独大”；明确行政长官不仅是特区政府的首长，也是特区的首长，行政长官代表特区，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中央对香港政治体制的厘清，有效匡正了对“一国两制”的认知与实践。

（四）争取最好结果：坚决斗争与积极建设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香港特区落实“一国两制”进程中出现的重大挑战和复杂局面，团结带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开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面对重大风险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2017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港并会见香港特区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寄语“一寸丹心为报国”“为官避事平生耻”“上下同欲者胜”三言，强调斗争精神之于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性。

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中央充分支持香港特区的社会经济建设，高度重视筑牢“一国两制”的社会政治基础。一是聚焦发展要务，以粤港澳大湾区与“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全力帮助和支持香港充分发挥竞争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二是致力于改善民生事业，全力支援香港抗击新冠疫情，支持香港解决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香港市民。三是更加注重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重点加强特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法治教育，以中国梦凝聚身份认同和政治共识，携手香港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征程。

新时代坚持斗争与积极建设相统一的治港方略，深刻体现了坚守底线与积极争取最好结果的对立统一，充分彰显了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的制度初心，是底线思维的绝佳诠释。回顾“一国两制”的实践历程，不难发现，中央治港方略中总的底线原则一贯是清晰稳定的，即确保“一国”的“本”和“体”；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两制”之“利”和“用”，并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内涵，从而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不走样”“不变形”。可以说，这一治港方略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的“体用辩证思想”^①，值得认真体会和运用。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强世功：《中央治港方针的历史原意与规范意涵——重温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论述》，《港澳研究》2020年第2期，第20页。

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的逻辑关联

吉伟涛

(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3)

摘要: 在当今社会, 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统战宣传文化是统一战线理论的一部分, 统战宣传工作是各级党委统战部职责范围内的必要工作, 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之间具有在历史发展上彼此契合、相互成就, 在生成逻辑上同源同宗、一脉相承, 在内涵体系上相似相近、相融相通等逻辑关联, 梳理、总结、归纳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之间的逻辑关联, 有利于以“大宣传”助推“大统战”, 推动两者深度融合, 将共势转化为优势,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好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作用夯实理论基础。

关键词: 统一战线; 宣传思想文化; 逻辑关联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4-0012-0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这两个思想的具象呈现, 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 其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日益凸显。统一战线工作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融合发展, 有利于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深入研究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的历史沿革、关联逻辑, 对不断巩固和夯实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 学者对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统战宣传方面, 把统战宣传文化作为统一战线理论的一部分, 认为统战宣传工作是各级党委统战部在职责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必要工作。这方面的研究较多, 成果较丰富。截至2023年11月中旬, 在中国知网上以“统战”+“宣传”为题检索, 找到学术期刊文章302篇, 学位论文3篇; 以“统一战线”+“宣传”为题检索, 找到学术期刊文章89篇, 学位论文4篇。这些研究主要是站位统战宣传工作对象(如焦建桥等人的《关于加强高校学生统一战线宣传思想工作的研究》)、如何开展统战宣传工作(如吴少强等人的《统战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开展统战宣传工作(如张洋的《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优化策略研究》)等^①角度, 从微观、实操的层面对开展统战宣传工作进行探索, 提出了一些建议, 但系统性研究不足。从宏观、理论视角就如何架构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叠加两者优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还很少。笔者期望通过梳理、

作者简介: 吉伟涛, 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四级调研员,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① 李翠斌:《新媒体时代H省网络统战宣传工作优化对策建议》, 河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21年, 第5页。

总结、归纳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之间的逻辑关联，实现“大宣传”助推“大统战”，“大统战”服务大发展的目的，并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增添微薄之力。

一、两者在历史发展上彼此契合、相互成就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是在因党而生，伴党而行，是伴随着中国具体实践而发展前进的，是一个不断成熟又充满艰辛的过程。自诞生以来，二者就相互依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它们在多个方面、多个维度有着相似相通之处。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这说明，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是历史、现实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在吸收一切先进经验、优秀成果的过程中孕育、产生的。本文从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对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在发展过程中的联系进行梳理。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这个时期，统一战线在四个时间节点依次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概念也随之演变，通常表述为“宣传工作”“政治宣传”“教育宣传”“宣传鼓动工作”等^②，其共同目的是激发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它们都呈现出鼓动性、斗争性等“革命”特征。我们以抗战时期为例，察看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此时，宣传思想工作在工作重心上，以服务抗战为首要任务。如《党的工作》共计49期，刊发的文章大部分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关，及时传达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相关意见和指示；在宣传阵地上，除了采取文学艺术、标语口号外，把党报作为鼓动、组织、引导群众的利器，创办了以《晋察冀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众日报》等为代表的流亡党报。这些贴合中国抗战实际，符合各阶层、各救亡团体救亡要求的宣传，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巩固和扩大这个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党的宣传工作由地下状态逐步转变为公开状态，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条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统一战线基本政策后，党扛起抗日大旗，在新闻机构中秘密发展通讯员，帮助团结进步新闻人士和进步报刊，积极争取新闻界的中间力量为抗日宣传作出积极贡献。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党从局部执政变成全国执政，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对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出了新的部署。此时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广泛凝聚民主党派、民族、宗教、华侨等社会关系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则是要“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③。两者都是无条件执行和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引导作用，呈现出务实性、重建性等“建设”特征。例如，在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改造方面，统一战线工作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6月25日召开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和部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加强统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② 张铁军、王喜花：《百年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概念演变、时代特征与经验启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第36—40页。

③ 刘少奇：《刘少奇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页。

战线工作进行了充分讨论,在重申统战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和平过渡方法的可行性^①;随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民主建国会全体会议等会议,引导资本家进一步提高认识、认清形势、减少疑虑,为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与此同时,党中央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教育活动热潮;1954年,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重点开展了以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为核心的宣传思想工作。正是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团结联合优势和宣传思想文化教育引导作用,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商界代表的密切配合下,我国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之初,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困难局面和复杂程度不亚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面对一系列的难题、问题和挑战,统一战线坚持十六字方针,在建立广泛共识基础上,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画好同心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则通过不断回应、观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并以此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同度来不断夯实群众基础。在贯彻落实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和推动思想理念的变革中,呈现出创新性、开放性等“改革”特征。它们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比如,在党做出建立海外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后,统一战线工作者以文化认同为抓手推进海外统战工作、以祖国统一为目标推进境外统战工作,通过社团联谊大会、培训研习班、国情考察等活动,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提升了海外侨胞的中华文化认同感、提高了港澳台同胞的向心力。宣传思想战线随之跟进,把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印发《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组织首届中美互联网论坛、首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世界媒体峰会等会议,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情况,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在新的阶段,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象、载体、方法等都发生了变化,两者之间的嵌入度更深、融合度更强,呈现出多元性、网络性等“变革”特征。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②,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多样性、显著的社会性;^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成为一个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的极端重要工作,对于举旗定向、凝聚共识,对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和宣传工作,提出了“大统战”思想、“大宣传”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④“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⑤。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广泛凝聚共识,只靠默默工作是不够的,统战必须加强宣传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也必须紧紧围绕“一个高举”

① 王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3页。

③ 《党政干部统一战线知识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④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统一论坛》2015年第3期,第3—4页。

⑤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两个巩固”“三个建设”，在完成“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五大使命任务时，宣传好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我国的政党制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让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统战，使统战工作的同心圆越画越大。事实也是这样，例如，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统战工作从线下向网络空间延伸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载体也从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向全媒体转型，网络成为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新的交汇点；新媒体从业人员既是统战对象中的一部分，又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的主体，双重身份加持下，使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交织在一起，共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为实践。

二、两者在生成逻辑上同源同宗、一脉相承

（一）理论基础源自马克思主义

1840年，恩格斯以弗·奥的署名在《知识界晨报》第249号上发表了文章《唯理论和虔诚主义》，其中写有“在同宗教的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①这表明恩格斯最早提出和使用“统一战线”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主要创始人。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全称使用“统一战线”的表述并不是太多，但学界大都赞成统一战线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无产阶级大团结大联合的论述，都认为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活动自古有之，但马克思主义政党“宣传工作”概念的第一次提出，则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7年6月），章程指出“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②；他们通过创办报刊（1848年6月首创《新莱茵报》）、著书立说[共写了1700篇（部）文章（著作）]、印发传单、现场演讲等方式，对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宣传，并把“努力宣传革命工作”当作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更是形成了一系列新闻宣传思想。后来，列宁结合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实际，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宣传思想工作论述为基础，对宣传思想工作做了进一步探索，他指出，共产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面灌输到工人阶级头脑中，强调“实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始终应放在第一位”^③，尤其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指导作用。这些论述和措施证明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是系统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工作。

（二）文化基础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天下为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统一战线形成的社会理想基础；“和而不同”的观念，包含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和情怀，承认不同的内在性、普遍性，尊重差异、宽容他人；中国共产党将“和而不同”思想的历史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产生了“求同存异”原则，“和而不同”思想是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原则的理论来源。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需要做到“七个着力”，我们以其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宣传思想文化发展提供的源源不断精神滋养。中华传统文化包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理念，如《尚书·五子之歌》载：“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蕴含“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要素，如《淮南子·修务训》载：“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厚植“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2页。

③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4页。

情怀,如《孟子·梁惠王上》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为培育和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和丰厚滋养。

三、两者在内涵体系上相似相近、相融相通

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都属于完整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们既有着独特的外在表现和本质特征,又在理论内涵的多个部分中相互关联,存在极大的一致性。

(一) 阶级属性高度一致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政治联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则守护着党的思想舆论阵地,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受党领导的政治工作,具有举旗定向的鲜明政治属性,从讲政治的角度分析形势、考虑问题是其工作的重要原则。党的百年发展史也昭示,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健康发展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根本上是坚持党的领导、站稳政治立场、具有政治敏锐性、能够彰显政治担当的结果。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四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也印证了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会失去正确前进方向。例如,在大革命时期,“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1942年,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出现了违背党的政策和一部分新闻宣传干部向党组织“闹独立”的倾向,当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和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辑人员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各地党组织要“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①。

(二) 价值导向完全相同

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的政治基因,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和始终不渝的初心,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继承了这一特质并持久保持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优良传统。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虽然每个历史阶段的工作任务不同,工作策略存在差异,但统一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都始终站稳人民群众的立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群众”是其工作的根本遵循,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统一战线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做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重大论断,无不警示着我们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工作,把教育引导群众与服务群众有机结合,才能把亿万群众的创造力激发出来,才能汇聚起奋进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三) 工作对象广泛重叠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工作性质和任务的变化有所不同,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象和范围也有所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是民主革命的同盟军,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对象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开明绅士、其他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同胞和海外侨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即由大陆全体劳动者、爱国者组成的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范

^① 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97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

围和对象包括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等12个方面的群体，范围之广泛前所未有。不同历史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范围也是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根据宣传对象不同，分为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对内宣传包含社会全体成员，对外宣传包括世界各国各阶层、各种不同政治思想的人，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华裔。只是基于每个阶段的工作任务，宣传的侧重点不一样，如延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舆论封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际友人、国外新闻记者的到访。总体上来看，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象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叠，后者的范围比前者更广。

（四）目标任务殊途同归

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跟随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聚焦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围绕工作方向、目标和着力点的有机统一，把“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相贯通，坚定不移地完成既定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使党的社会地位合法化、壮大了党的自身实力、成为党争取人心的法宝，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统治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个阶段，它们完成了“救国”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统一战线为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探索；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初步建构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个阶段，它们完成了“兴国”的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在构建“五大关系和谐”、引资引智方面为改革开放提供和谐环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围绕基本路线开展工作，激发人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这个阶段，它们完成了“富国”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阶段，它们正在朝着“强国”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五）核心理念本质相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统战工作“是什么、要干什么”的重大问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中心环节，“聚民心”则是重中之重，就是促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更大贡献。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都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责任编辑：念兴昌

统一战线共识教育的问题与创新路径探析

刘树升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99)

摘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 对统一战线共识教育培训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社院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学科建设滞后、班次设置不规范、师资力量薄弱、教培质量不高等共性问题。对此, 建议认真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通过加强机构平台、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现场教学体系等方面的建设, 实行线上线下融合办学、联合开放办学, 实施中华文化浸润工程,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式, 切实提高统一战线人才教培成效。

关键词: 统一战线; 共识教育; 社会主义学院; 创新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4-0018-07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和社会主义学院(以下简称社院)工作。2016年, 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专致贺信, 要求学院坚持社院姓“社”, 突出政治培训, 强化政治共识, 为统战教培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统战教培工作和社院职责使命, 对统一战线共识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为统一战线共识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统一战线共识教育改革创新的历史必然性

统一战线共识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所谓政治社会化, “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 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 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①。统一战线共识教育同样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即“通过多方式、多渠道、多手段的社会政治互动, 在政治社会化组织和群体与社会个体之间传播政治文化信息, 以延传政治文化, 教育社会个体, 巩固政治统治, 推动政治发展”^②。从政治社会化视角来看, 在新的历史方位下, 社院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职责使命, 需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功能, 进行统一战线共识教育改革创新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

(一) 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必然要求

2022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 现在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 统一战线作用更加重要, 强调要深刻理解发展壮大新时代爱

作者简介: 刘树升,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刊图书资料部编辑, 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① 李元书:《政治社会化: 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 第18—19页。

② 李元书:《政治社会化: 涵义、特征、功能》, 第21页。

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工作。三个“作用更加重要”进一步彰显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①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要求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社院作为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必须适应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发挥独特的政治功能，自觉把“培养谁、如何培养”与党的主张、人民利益、统战事业需要结合起来，在凝聚新的统战群体、协调新的多元诉求、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新的挑战中担当作为，最大限度团结积极力量、争取中坚力量、转化消极力量，扩大团结联合的覆盖面和包容性，为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应有贡献。

（二）贯彻落实三个“条例”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坚持政治培训为主，开展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理论培训。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作为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作用”，把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纳入社院教学内容，从制度层面确定了统战人才教育培养阵地建设的职责使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突出强调社院“五个是”的性质定位，进一步明确了办学的总体要求、工作方针、基本任务、培训目标，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和社院工作的新精神新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社院工作提供了方向引领，是社院工作的根本遵循。其中明确要求，社院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作用，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作出贡献。《干部教育培训条例》规定：“社会主义学院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应当坚持功能定位，承担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统一战线其他领域代表人士、统战干部及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人才等培训任务。”大力推动社院共识教育改革创新，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是贯彻落实以上三个“条例”的必然要求。

（三）守好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的必然要求

统一战线点多、线长、面广，需要有独特的教育培训体系和丰富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随着统战工作社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统一战线成员越来越多，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任务日益繁重。社院面对的学员群体多来自于党外、体制外、海外、境外，其阶层多元、思想多元、价值多元、文化多元、诉求多元、职业多元、背景多元，社院教培工作必然有别于其他干部培训机构，要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按照政治社会化理论，政治社会化的教育功能，首先是引导社会个体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念，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观念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对政治本身的看法，即对政治的价值评价，以及对参与政治的看法。^②因此，如果说党校是党性教育，行政学院是忠诚教育，高校是通识教育，那么社院就是共识教育，也就是政治观念教育，要教育引领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社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③因此，社院共识教育工作在党的事业发展大局中不可或缺，且独具挑战性、紧迫性和必要性，需要不断改革创新。

二、当前统一战线共识教育的问题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共识教育工作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各地社院不断开拓进取，社院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所承担的使命任务相比仍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①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第1版。

^② 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第23页。

^③ 《习近平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团结报（北京）》2016年10月15日，第1版。

（一）机构设置不健全

目前，在机构建设上，全国社院系统的统战教培工作机构设置不健全、专业化程度不高、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较突出。在31家省级社院中，辽宁、海南、青海等地的3家社院是与党校（行政学院）一体办学，设有多个教研部（室）；黑龙江、山东、广西、北京等地的10家社院设置了多个教研部（室）；有18家社院只设有一个教研部（室），没有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基础理论学科和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中华文化等特色学科设置专门的教研部（室），其所占比例为58.1%。由此可见，在省级社院层面，教学机构设置的科学化专业化程度不够。在市、县层面，机构设置不健全的情况尤其突出。与中央、省级社院不同，市、县社院大多与党校（行政学院）合办，多数没有专门的统战教研部门和专职统战教师，“有的社会主义学院甚至只是在党校大门口挂了块牌子，机构和人员均没有落地落实，出现平时隐身、开班才现身的现象”^①。以山东省为例，16个地级市中，只有青岛市社院是单独设立的。这种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造成市、县两级的统战教育培训工作多头领导、业务交叉、权责不明，甚至“导致统战部门往往撇开社会主义学院而直接采取异地教学的方式到上级社会主义学院和高校培训，本应在教育培训工作中发挥主阵地作用的社会主义学院被虚化、边缘化”^②。从长远来看，这种机构设置不健全、人员编制少的情况影响了基层统战教培事业的发展。

（二）教培体系不完善

全国社院系统尚未形成统一的教学大纲和完整的教学体系。虽然中央社院引领各地社院进行了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课程设置体系化不足、课程总量偏少、课程布局不均衡、教学菜单针对性不强以及精品课程评价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尤其是共识教育课程体系化不足的问题，对课程质量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一是优势特色课程偏少，且缺乏替代机制。相对于快速增长的教培需求来说，特色精品课程供不应求，现有的精品课程也缺乏替代机制。二是课程资源有效供给不足，内容更新较慢。与学员的期待和要求相比，课程的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仍需进一步增强。而且不少学员反映，社院课程内容更新缓慢，分层分类适应性不强，有的课程已经重复听过多次。

（三）学科建设滞后

社院系统共识教育课程体系化不足等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也与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滞后导致的学科体系不完善、理论研究薄弱、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有关。统一战线学作为独立学科起步较晚，2013年山东大学自主设立隶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的统一战线学二级学科，2015年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并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联合培养，这是统一战线学首次作为独立学科被纳入国民教育招生系列。近年来，联合培养的统一战线学毕业生陆续进入中央、地方社院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工作，推动了统一战线共识教育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但时至今日，仍然只有山东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开设统一战线学学科，且所招收的学生有不少此前并未就读政治学专业，影响了人才培养效果。与紧迫的共识教育课程需求、教师需求和理论支撑需求相比，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滞后的问题仍然突出。

（四）教培效果欠佳

统一战线共识教育要取得理想成效，既需要实现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全面覆盖，又需要通过班次学制的科学设置、教学方式方法的综合有效运用实现对学员的人脑入心，但是现在看来做得还不够，主要有以下原因：

^① 郑鹏飞：《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主阵地作用加强统战教育培训工作——兼谈市级社会主义学院正规化建设》，《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第112页。

^② 郑鹏飞：《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主阵地作用加强统战教育培训工作——兼谈市级社会主义学院正规化建设》，第112页。

一是培训结构有待更新。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统一战线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日益突显，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等传统的统战教培对象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等群体发展迅速，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新的群体出现并不断扩大，再加上网络统战工作的日益重要，都对统战教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是，当前社院系统所培训的学员结构仍以民主党派成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干部等传统领域为主，对新的统战群体关注不足，教学设计不够精准。

二是班次学制设置不够科学。在当前社院系统的教学班次中，一周以内的短期班占了大多数，甚至存在不少2~3天的“微型班”。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教育培养难以持续深入，对政治共识和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有限。

三是教学方法“形”与“效”不够统一。统一战线共识教育不能依靠空洞的说教或者教条式的灌输，必须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方法，提高吸引力和有效性。调研发现，学员希望增加结构化研讨、情景模拟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但是现在这些教学方法研发占比较小，愿意尝试的教师不多，且多数运用在长期班中，短期班还是以讲授式、传统研讨式为主，一些相关的创新实践效果也不明显，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现象。

四是文化认同教育基础作用发挥不够。在社院教学布局中，文化认同教育是基础，以文化认同增进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社院共识教育的重要方式，但是当前社院的文化认同教育多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文化讲座、书画笔会等传统方式，创新性、多样性不足，系统化、精品化程度不高。

（五）教师队伍建设滞后

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是统一战线共识教育取得实效的基本前提，但由于社院基础薄弱、资源不足等原因，教师队伍恰恰是许多社院的突出短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专职教师队伍小、弱、散，专兼职教师比例失衡。2020年的调研显示，全国48家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副省级城市社会主义学院中，专职教师人数在10人以下的有30家，占比62.50%。^①与社院担负的任务要求相比，专职教师力量严重不足。与同级党校（行政学院）合办的市、县社院中，承担统战教学的教师极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施行后，云南、山东、重庆、湖北、江苏等省（市）出台了贯彻意见、细则等，但仅有少数省份对省级社院专职教师力量配备进行了量化规定，专职教师少仍然是制约社院共识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不少地方社院在日常教学安排上以兼职教师为主，大量从党政机关、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校、科研院所聘请行政领导和专家学者作为兼职教师。在实际操作中，一些社院聘任流程不规范，也很少从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培养、办学特色等方面进行长远规划。兼职教师很少对社院培训对象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有的缺乏统战理论素养和统战工作经验，或是不能把握好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关系，教学效果难以达到要求。

二是专职教师队伍水平不一，能力亟待提升。《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要求社院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师德高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充满活力的专职教师队伍，但是目前来看，社院系统也存在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没当过领导的在给领导干部讲领导艺术，没出过国的在给经常出国的人讲国外经验，没经历复杂环境考验的在帮助每天同各类矛盾打交道的人出主意解难题”^②的现象，教师的政治素质、视野阅历和能力素养还有待提升。与党校（行政学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相比，社院在科研平台、科研资源、科研基础等方面还有待提高，教师整体科研水平不高，科研对教学的支撑作用有限。不少专职教师还要承担相当多的行政工作，

^① 张师平、宫捷：《社会主义学院教师发展：现状、问题与路径——基于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师资情况的调研和分析》，《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47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9期，第3—13页。

分散了其投入教学和科研的精力。

三、统一战线共识教育的创新路径

推进统一战线共识教育改革创新,需要明道优术,在总体思路上坚持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工作方式方法。^①“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实现无产阶级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发展壮大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一条基本原则。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时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要有特殊的方式方法,有时要灵活体现原则性。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②做好统一战线共识教育工作,同样需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为根本遵循,坚持“社院姓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共识教育核心内容,综合运用“理论+实践”“课堂+现场”“线上+线下”以及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等教学新模式新方法,针对统战各领域培训对象特点分类施教,让学员从内心深处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性力量和实践伟力,真正解决共识教育真懂真信问题;充分发挥中华文化丰厚资源优势,用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以文化浸润的方式引导学员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充分发挥社院统战教培主阵地作用,强化对统战成员思想政治引领,做到统战工作的重点难点在哪里,社院教育培训就跟进到哪里,教育引导学员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在上述总体思路指导下,可从以下方面入手,进一步把握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推进统一战线共识教育改革创新。

(一) 推动社院机构平台建设

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尤其是关于“选优配强社会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加强教职工队伍建设”等相关内容,对社院领导班子配置、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进行加强和优化。省级社院可报请以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召开全省社院工作会议,及时研判问题、总结经验、商讨对策,加强对市、县社院的业务指导帮助,形成上下联动、协调推进的新局面。此外,社院应不断加强科研平台建设,结合自身资源优势,成立相应学术平台,增强科研对教学工作的支撑作用。如广西社院建有广西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站、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海外统战工作理论研究基地、广西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心等平台,较好地支撑教学工作开展。

(二) 构建完善教育培训链条

针对统一战线共识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课程质量不够高的问题,需要构建完善教育培训链条。

一是推进统一战线学科建设。在全国层面,可由中央社院牵头协调推动,在更多优秀高校设立统一战线学科,并由中央社院和高校联合,统筹规划统一战线学科理论体系建设,重点培养统一战线学优秀博士研究生,为统一战线共识教育的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提供顶层设计支撑。在省(市)社院层面,应重点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

^①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第1版。

^② 崔珏:《爱国统一战线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使命——学习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第47页。

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基础理论学科，积极打造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中华文化等特色优势学科，形成与统一战线共识教育培训发展相适应，基础扎实、特色突出的学科体系。如山东社院充分利用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学科资源，通过邀请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教授参与教学课程建设、科研课题评审、学报稿件外审、特约稿件撰写、招聘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优秀博士生等方式，大力促进学院教研资一体化发展，推动课程建设和教学科研水平提升。又如江苏社院编制了《理论教学课程体系》《现场教学基地名录》，涵盖了128门主干课程和225个教学基地，有效完善了课程体系。

二是加强教材体系建设。近年来，中央社院编写的《中华文化“十个讲清楚”教学大纲》《共识教育十八讲——民主党派干部进修班讲义选编》等教材，对促进共识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指导地方社院教学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地方社院应及时引进中央社院特色教材，同时不断加强自身教材体系建设。如上海社院推出“统战理论进党校”精品课程配套读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论》，组织专职教师参与《上海统一战线史》编写工作，编撰《寻先贤足迹 品统战文化》。又如重庆社院组织教师编著了《统一战线学研究》《重庆与中国统一战线》等统战学科教材。

三是实行联合办学、开放办学。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吉林在第十四次全国中华文化学院工作会议上指出，全国社院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即与肩负的重要职责使命相比，社院的基础薄弱、资源有限等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吉林指出，要加强全国社院体系内协作配合，打造社院共识教育联合体，共同做大做强共识教育主业。在社院系统内进行合作办学，在线上精品课、优秀师资、现场教学点、科研、资政等方面搭建资源共享共建平台，进行教学协作，彼此取长补短，加强联系与交流，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尤其是上级社院与下级社院之间的纵向合作办学，能够有效弥补下级社院的资源缺陷和教学短板，推动其规范化发展。此外，地方社院还应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合作，密切与省（区、市）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合作，善于借助外力推动办学。

（三）提升共识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是优化教育培训结构。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实行“定制化”教学菜单，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这与社院的课程体系改革、教师队伍建设相辅相成。

二是实行线上线下融合办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造性地解决制约共识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近年来，针对社院的培训班次大多学时较短。尤其是疫情严重冲击教学安排等问题，使得各地社院开始探索线上线下融合办学的新途径，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如中央社院于2022年6月至8月，在网络社院平台连续举办3期全国社院系统教师线上培训班，获得了广大学员的好评。

三是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情景式等方式方法推出一批统战精品特色课程。比如，为庆祝建党百年，山东社院自编自导自演百年统战史教学情景剧《永远跟着你》，变课堂讲授为舞台演出的浸润式教学，引导学员在情、景、意的融合中深刻领悟百年党史和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和作用，引起良好反响，该情景剧荣获2021年度山东省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成果一等奖。山西社院也引进了教学剧等新型教学方式，《晋商魂》《三晋文化》等教学剧受到学员的广泛好评。

四是建立健全共识教育现场教学体系。不断丰富教学主题和教学内容，拓展线上实景再现和现场感悟体验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为学员构建“听—看—学—思—悟—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浸润式教育链条，形成特色鲜明、主题丰富，上下联动、内外结合，分工明确、团结协作的共识教育现场教学体系。此外，在同一现场教学点，针对不同学员群体挖掘阐发相应教学主题。比如，在济宁“三孔”“两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点，面向党外干部进修班学员时，可着重阐发儒家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理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之间的渊源，儒家思想对当今干部政德修养的启示等主题；面向伊斯兰教培训班学员，则应着重讲清楚伊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以儒释经”，接受中华文化浸润，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讲清楚儒家思想的“仁”与伊斯兰教义中“仁慈之爱”的关系等。

（四）实施中华文化浸润工程

针对文化认同教育基础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可实施全方位、立体化中华文化浸润工程。

一是开展国情教育和中华文化研修活动。加强与各级涉外、涉侨部门的联系协作，持续打造线上线下中华文化研修活动品牌。通过课堂讲授、现场体验、交流研讨等形式，引导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华侨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各省（市）发展形势，以文化认同增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二是打造共识教育“第二课堂”。持续推动“文化社院”建设，通过学院标识视觉形象设计、文化节点打造、文化教室建设等内容，让学员在学院的各个角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巨大感召力。

三是加强中华文化交流传播平台建设。通过面向海外华侨华人举办中华文化专题讲座、书法笔会、座谈交流等方式，搭建文化传播有效载体，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五）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专职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增加专职教师数量。另一方面，提高专职教师素质。对专职教师学习、授课、听课、评课、研课和科研等进行量化管理，提高教师用学术讲政治的能力水平。选拔培养具有发展潜力和学术竞争力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形成梯次衔接的青年教师帮带团队。同时，加强对地方社院的业务指导，通过举办社院师资培训班、教学竞赛、打造统战特色课程等方式，推动形成教学名师队伍。

二是优化兼职教师队伍结构。对外聘教师师资库实行动态管理，强化政治把关，明确遴选条件，建设包括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先进模范人物和优秀党外代表人士在内的覆盖广、素质高、专业化、创新型兼职教师队伍。

责任编辑：念兴昌

新时代政协新闻宣传创新路径探究

张莹莹

(云南政协报, 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 政协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政协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职责是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服务大局、建言资政、凝聚共识, 旨在开辟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功能的内在要求, 政协新闻宣传工作也是彰显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特色优势的重要体现。为做好这项工作, 需要遵循政协新闻宣传的基本原则, 发现鲜活的政协新闻素材, 研究新时代政协新闻宣传的创新策略, 积极融入互联网、创新政协新闻传播方式, 打造联系广泛的政协新闻宣传队伍。

关键词: 新时代政协新闻; 报道原则; 宣传创新; 网络融合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4-0025-07

政协新闻宣传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是牢牢把握党的领导地位, 积极传播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 助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这一核心任务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在工作中要全面贯彻, 要引导社会各界摒弃错误思想, 积极响应和引领主流舆论。新闻宣传工作要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稳定团结的思想根基加强统一战线建设, 进一步推动国家发展和繁荣。

政协新闻宣传必须时刻绷紧“宣传思想工作就是政治工作”这根弦, 牢牢把握政协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方向。政协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人民政协事业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思想,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 突出鲜明的政协特色、统战特色、协商民主特色, 大力弘扬新时代奋斗精神、创新精神、求真务实精神, 努力提升政协新闻舆论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政协事业、服务广大人民群众。^①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最大的政治, 而共识则是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前进的动力和基础。人民政协是“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政协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②。为了更好地汇聚人心、凝聚共识和增强团结力, 政协新闻宣传工作至关重要, 只有做好宣传工作, 才能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和作用。要以政协特色为切入点, 宣传政协工作的全貌,

作者简介: 张莹莹, 《云南政协报》新媒体部主任, 主任记者, 研究方向为广电新闻编导、融媒体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① 梁春武、谢靓:《汪洋:提升政协新闻舆论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人民政协报》2018年4月5日,第1版。

^② 董云虎:《凝聚共识是政协服务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的价值所在》,《人民政协报》2020年12月30日,第8版。

提升新闻宣传的质量和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对政治制度的广泛宣传,增进各界别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同。要积极反映党委和政府关注民生问题的关注,特别是针对调研、视察、社情民意信息等经常性工作的宣传,使政协的新闻宣传工作有内容、有深度。

一、政协新闻宣传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在凝聚人心、传递民意、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建议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而在这一进程中,新闻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在政协新闻宣传工作中,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宣传内容不够多元化

政协新闻宣传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重要决策以及领导讲话等方面,缺乏足够多元的内容。这样的宣传方式很难吸引广大民众的兴趣,也失去了新闻宣传的本质和价值。

(二) 宣传载体不够多样化

政协新闻宣传一直使用传统的宣传方式,如新闻发布会、新闻公告、新闻稿件等,而缺乏创新性地运用新媒体进行宣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协宣传效果的提高。

(三) 宣传形式不够生动化

政协的宣传形式多以文字和图片为主,这种形式缺乏生动形象的视听表达和图形化的呈现方式,使得政协宣传效果受到一定的制约。因此,政协需要以更加多元化和创新化的宣传形式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和提升宣传效果。

(四) 宣传话语不够亲民化

政协新闻的宣传语言相对形式化,宣传内容的语言往往过于专业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难以产生共鸣,从而限制了广大民众对政协工作的认知和了解。因此,政协需要更注重使用贴近生活、易于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增加宣传效果和提高群众对政协工作的关注度,加深民众对政协工作的了解和认知。

二、政协新闻宣传遵循的基本原则

基于政协工作的特色,面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政协的新闻宣传报道需要做出更好的表率,以提升政协宣传的影响力。为此,我们需要紧紧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 以凝聚社会共识为己任,不断画出最大同心圆

政协新闻报道要积极探索基层群众有序参与政协协商的有效途径,要善于凝聚社会共识,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要准确把握人民政协的性质和定位,研究政协新闻规律和特色。突出政协新闻宣传的统战属性,处理好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落实好大团结大联合的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鼓干劲、聚人心、促团结,多宣传政协系统发挥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的工作实践,多宣传各民主党派当好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具体成效,进一步增进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突出专门协商机构的性质和定位,把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作为工作的着力点,把宣传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作为主攻点,把凝聚思想共识作为出发点,注意宣传的艺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用感人事迹折射伟大时代,用鲜活故事彰显政协制度优势,广泛凝聚共筑中国梦、同心向未来的智慧力量。

(二) 以突出政协特色为目标,尽情讲述基层故事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想感动别人,首先得感动自己,只有用

心用心用力，真正下沉到基层、深入一线，才能写出“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好新闻，政协新闻亦是如此。

只有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走到委员身边、走进履职现场，多采访、多调研、多分析、多思考，才能挖掘到一线的政协好故事，发现履职好案例，寻找委员好榜样，培养出政协真情感，彰显政协新闻宣传的强大影响力和感召力。要多角度了解各级基层政协的工作亮点和新鲜经验，立足行业特色，做好深度报道，全方位再现基层政协委员履职业绩和精神风貌。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在基层，实效在基层。^①要大力宣传基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实践经验和工作成效，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的工作成效，促进经验交流、识见分享。

（三）以跟踪提案报道为主轴，推动满足人民需求

提案是委员履职的重要形式，因此需要重点关注政协委员的提案。在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的制度化发展方面，我们需要及时发现那些群众高度关注的提案，并收集有特色的协商民主内容。丰富的新闻素材库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一手好素材，凝聚共识，引发读者情感共鸣，最终塑造出有实力的政协形象。

政协新闻报道既是政协代言人，也是人民的代言人。政协新闻报道要紧密切关注群众的需求，密切跟踪群众关注高的政协提案，关注社会热点，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政协新闻宣传工作者应积极与委员交流，及时探访相关部门，广泛了解群众对提案的看法，并以合适的视角进行主题策划。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专题研讨，以挖掘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要善于通过新闻报道，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人民的创造性，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推动人民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四）以发挥政协优势为抓手，充分盘活委员资源

政协委员是一个人才汇聚的群体，他们肩负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多方面的重任，同时也拥有建言献策的独特优势和平台。因此，政协委员的资源是政协新闻报道的重要宝藏，我们应该善于利用这些资源，充分挖掘他们在各领域的专业素养和内在价值，并将其转化为丰富多彩、权威可信的新闻资讯，以提高政协委员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一是必须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以此来打造新时代政协委员的全新形象，并展现委员们在为民履职方面的新风貌，让广大群众通过新闻报道真切地感受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们就在身边。二是要善于与政协委员打交道，和他们交朋友，及时收集政协委员为党和人民群众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并从中提炼出典型事例，以情感化的方式展现政协委员的价值和作用，用鲜活生动的事例宣传政协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反映民意的界别群众代表作用和立足本职岗位、投身改革发展的模范带头作用，生动、真实地反映政协工作者的风采，提高委员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三是对委员中的先进典型人物，要通过深入采访，把委员个人的命运融入时代的洪流中，全面展现委员风采和模范行动，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真实的人物报道最感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动听的故事，叙事报道要坚持报道社会现实中的真人真事，敏锐地追踪时代的发展趋势。”^②要积极宣传政协委员在履职中的主体作用，把镜头、话筒对准委员，宣传报道他们在议政活动中的“亮眼表现”、协商议事中的“暖心话语”、工作岗位上的“先进事迹”，增强委员们的使命感、荣誉感和自豪感。

（五）以善用政协语言为要素，创造具有政协特色的报道

政协新闻宣传工作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方法，如标题提炼、框架结构、语言风格等，以传递正确、客观、准确的信息。在新闻标题中、语言中，我们经常用到“助推”等词语，因为政协是推

^① 李宏：《新时期政协新闻报道的采编思路与创新实践》，《传媒评论》2022年第8期，第56页—58页。

^② 李希光：《记者怎么学会“讲故事”》，《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4期，第79—82页。

动工作而不是越位工作。要有效避免类似问题,就要把握新闻宣传工作的规律,更好地运用政协的话语讲政协故事,注意使用严谨、准确、全面的词语。同时,要善于运用新闻的背景性语言介绍等手段,讲好政协故事,让社会各界更好地接受政协新闻宣传所传递的信息价值和美学体验。

直接报道时事新闻往往难以“吸引粉丝”,读者看到这样的标题时通常会快速划过。换句话说,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时事新闻的受众群体只限于体制内。而“故事化”的政协新闻报道能够吸引广大民众的关注,通过实现广泛的传播来传递政协关怀和履职表现。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协开展的政协助推市场主体倍增“5+5”行动为例,州、县政协委员搭桥,使农户获得银行授信、取得营业执照,“农户”变“商人”等鲜活事例,被挖掘形成专题报道,得到了不少群众点赞、转发。这一案例如果仅以“红河州政协召开助推市场主体倍增‘5+5’行动启动会”为消息做简单报道,想必难以获得充分的赞誉和关注。

政协拥有优秀的人才和广泛的联系,是一个智力密集的组织。因此,政协在新闻宣传方面有着许多独特的优点和着力点,如组织优势、特色资源和专业能力等。政协需要将这些优势与新闻宣传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政协特色的新闻宣传模式。

三、如何发现鲜活的政协新闻素材

政协好新闻的素材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源自机关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源自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在履职实践中的新样子、新风采,源自协商议政中的好观点、好建议等。只有把每次协商调研、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提案工作等政协的基础性工作做扎实,政协新闻才有“源头活水”,涓涓流淌。^①政协不乏许多好新闻素材,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出来。从近年来中国新闻奖、省级新闻奖获奖作品来看,源自人大、政协的好新闻越来越多,说明政协新闻宣传领域有更多发力的空间。

(一) 从政协的日常工作中找方向

政协的新闻报道既有一般新闻报道的共性,也有服务政协职能的特殊性。要善于在领导讲话、政协提案、委员建议、专题协商议政、调研视察活动中寻找有特点、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一是政协新闻宣传不同于普通的宣传,不仅要具有政协特色,还常常需要就重点领域进行深度报道,对一些大型的调研活动、重要提案的形成过程,一些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深入追踪报道,本身就是对相关主题、领域进行深度调研和剖析的过程。政协工作蕴含着可成为政协新闻宣传素材的参政议政、社情民意、统一战线、文史工作等方面的宣传资源,在进行政协新闻报道时应遵循“三贴近”原则,在跟随委员调研、视察中,从议政、统战、社会问题等方面深挖能够满足受众需求的选题,撰写出主题重要、针对性强、价值高、实效性强,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新闻报道,提高新闻报道的传播力。

二是政协各类会议、活动中的新闻素材十分丰富,这些素材种类繁多、各具特色。一般性动态报道很难吸引读者注,在报道重大主题时,要着重捕捉领导讲话、会议文件精神或相关活动的意义、目标、成效、社会影响、所涉重要知识等,挖掘有吸引力、影响力、传播力的新闻素材,并善于从各类会议、活动中挖掘党委和政府关心的重点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等具有较高新闻价值的内容。

(二) 结合新闻热点,梳理与政协的联系

政协的工作都是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的,在政协新闻宣传工作中,要紧紧围绕政协各时期的中心工作,结合当下社会的新闻热点,寻找和梳理与政协工作的联系,带着问题去思考,透过现象看本质。以《人民政协报》刊发的《南宁实现商品房“交房即交证”——广西南宁

^① 任瑞:《坚持“内容为王”“言必有物”,深入挖掘政协新闻“富矿”》,2023年5月18日, <http://www.rmzxb.com.cn/c/2023-05-18/3346900.shtml>, 2023年6月10日。

市政协督办提案破解房产办证难问题》这篇新闻报道为例，作者看到南宁市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商品房交房即交证的新闻，联想到政协委员提出的商品房办证难建议持续跟踪办理、二次深度办理的案例，并当即把这则新闻热点和政协工作联系起来思考，深挖“交房即交证”背后的提案办理故事，通过多方采访核实，迅速采写了这篇新闻报道。

（三）突出地域特色，聚焦各地政协工作亮点

基层协商，是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在城乡社区为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开展的民主协商，是近来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政协工作的特色亮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张峰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发展路径》课题研究报告中提出，基层协商一般具有4个鲜明特点：一是具有明显的自治性。二是具有微观务实性。三是具有实际利益性。四是具有广泛群众性。政协新闻宣传应聚焦基层协商等突出亮点，生动反映报道内容的相关特色。

例如《人民政协报》报道的，北京市通州区政协依托委员工作站（室）建立的“协商议事厅——你说我听，我说你听”协商议事机制；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的“有事好商量”；焦作市政协打造的“政协邀您来商量”协商议政平台；四川省政协的“有事来协商”等新闻，及时反映了各地政协对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发挥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进行的积极探索。

各地政协创新工作机制的新闻报道，充分宣传了政协在基层开展的协商工作，使得很多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得到了市、区、街道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切实为人民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从相关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协向基层延伸的协商方式，为解决民生问题增加了新的渠道。

（四）镜头聚焦委员，既有“颜值”又有“言值”

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政协工作影响力大不大、成效好不好，关键在委员。要大力宣传好委员为人民利益冲锋在前的“感人故事”、议政活动中的“亮眼表现”、协商议事中的“暖心话语”、工作岗位上的“先进事迹”等。

政协委员大多是各界精英、贤达人士，还有一些是身怀绝技的专长人才，他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对社会问题有深刻认识；他们的提案和会议发言，为新闻报道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各级政协委员中的专家学者、行业精英都是人物报道的良好素材，要对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思想进行充分挖掘，发现其深刻的内涵，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要突出委员，把镜头对准委员，宣传展示好政协委员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风采，不断提升委员的影响力，让有影响力的委员去影响更多的人。

四、新时代政协新闻宣传的创新策略

（一）营造主流，强化舆论引导力

充分认识和了解政协特色，是做好政协新闻报道的基础和前提。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专门协商机构，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织形式。

要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基本职能出发，发挥人民政协资源优势，抓住热点，深挖故事，在实践中寻找政协与社会热点事件的结合点，挖掘社会热点事件中的“政协元素”，写出内涵丰富、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新闻报道。准确把握政协工作涵盖的范围，深入挖掘人民政协在资政建言、收集民意、汇聚民声、统战实践、文史研究等方面的资源优势，生动反映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以及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方面的典型事例，强化政协主流媒体的性质，讲好中国故事、政协故事、多党合作故事，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广泛汇聚积极向上、团结奋斗的正能量。

（二）突出特色，提高品牌影响力

新时代，政协新闻宣传报道需要以提高政协报道的品牌和影响力为目标，在新形势下着力创新。为此，需要紧密结合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独特优势和履职的特色亮点，在政协全会、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议、界别协商会议等活动中收集线索，关注政协委员的提案及调研，并从中寻找受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更好把握受众需求，体现政协新闻特色。要由此持续打造政协新闻报道的系列特色品牌，不断提升政协新闻品牌影响力。

在报道中不仅要做好会议和活动方面的宣传报道，还应将关注点向两头延伸，掌握丰富的背景材料，抓住细节，发现线索，注重相关会议和调研活动的社会效果，做好跟踪采访，才能写出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的特色报道和深度报道，增强新闻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融入互联网，创新政协新闻传播方式

融入普及移动互联网是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既是严峻挑战也是重大机遇。当前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在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要跟进到哪里，政协宣传工作要不断适应政协新闻宣传的传播、语言表达和叙事方式的发展变化形势，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推动政协新闻宣传工作的最大增量，不断更新升级和探索画好画大网上“同心圆”的新路径。做好政协新闻宣传工作，不但要依托平面媒体，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新闻客户端等新的传播平台，不断扩大政协新闻宣传的辐射力。特别是自身宣传能力和平台资源有限的基层政协，要注重和各级新闻媒体融合互动，主动争取与各级新闻媒体单位围绕当地政协特色共同策划相关主题栏目或活动，报道当地政协亮点工作、对外宣传推介当地人文风俗和特色文化，以政协视角更好地讲述当地故事，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助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例如，昆明市五华区政协2022年借助云南政协报抖音、五华区融媒体中心微博开展的“协商在基层网络直播活动，有11万人在线收看。深圳市罗湖区政协积极借助深圳市政协平台，承办“委员议事厅”活动，组织相关专业委员围绕深圳如何打造国际创意之都开展网络议政，直播收看人数超过102万人次。通过对该案例分析思考可知：

一是融合发展关键在于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不能停留在“+互联网”，仅仅把线下新闻搬到线上，而是要真正实现“互联网+”，从相“加”进化为相“融”。可以探索建立政协新闻“中央厨房”，由前方记者提供新闻“食材”，后方编辑担任“大厨”，根据微博、微信、抖音等不同媒体受众，加工成不同的新闻产品，丰富、创新新闻的传播形式和渠道，推动新闻宣传跨越式发展、实现效能倍增。

二是要不断探索创新传播方式。例如，通过在政协专题协商、提案督办、调研视察等经常性工作中，选取老百姓关心的民生热点问题，尝试直播履职，邀请有影响力的政协委员担任主播等方式开展宣传，提高政协工作影响力，让群众切实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就在身边。要探索借力新闻平台，加强与主流新闻平台和知名平台深度合作，推动公众通过QQ、微信等便捷方式参与民主协商、民意征集和民情互动，比如在打造“委员会客厅”“委员工作室”中，建立与网上群众工作平台、网上民情通道联动机制，打通与职能部门网络问政的连接渠道，通过与新闻平台的合作创造更多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形成更大的舆论磁场。

三是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是媒体工具，新闻的本质没有变，新闻价值是新闻的核心。在内容为王、新闻找人的时代，政协新闻宣传若不善于捕获高质量的履职素材，再好的新闻平台和新媒体技术也无济于事，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打造适应互联网传播的履职品牌，综合运用多种新媒体技术，奏响融合报道的“交响乐”，让政协履职“飞入寻常百姓家”。

（四）打造联系广泛的政协新闻宣传队伍

人民政协的新闻宣传工作是团队作战，不是孤军奋战。新闻宣传工作作为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需要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政协的履职风采，可以通过媒体来展现；政协的职能优势，可以通过媒体来表达；政协的履职故事，可以通过媒体来讲述。因此，从事新闻宣传的政协工作人员要在提高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要注重与媒体单位的协作配合，使媒体充分参与到政协履职的日常工作中，聚焦热点、挖掘亮点，突出优点，互相促进、互相成就。特别是政协机关干部要不断提升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充分认识媒体的新变化、熟悉媒体融合的传播规律，善用媒体、善待媒体，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和配合，共同做好重要新闻报道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工作，热忱为新闻媒体加强政协宣传搞好服务、提供条件，诚心求教、认真听取新闻单位对改进政协宣传工作的意见，继而正确有效引导舆论。

政协报刊与党报党刊和都市传媒相比，在资源收集、新闻时效上都不占优势，因此政协媒体必须加强与基层的联系，建立稳定、长期的通讯员队伍，还要加强与当地党委和政府的联系，与地方新闻媒体加强沟通，提升新闻来源的横向张力和纵向深度。以云南政协报社为例，在省政协机关、专委会，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地市政协建立了一支通讯员队伍，这支近300人的通讯员队伍，就是政协宣传工作的主力军。有了通讯员队伍，加强对他们的新闻业务培训就至关重要。通过以学带训、交流座谈、专家授课等方式，注重从宣传视角、写作水平、协调沟通等方面增强政协新闻宣传通讯员队伍的能力水平。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工作机制，探索性地把政协机关干部在媒体上发表的信息，作为年终评先评优和干部提拔重用的重要依据，倒逼政协干部主动参与宣传工作。在政协机关内部采取开展好新闻评选、浏览量评比活动等，给予突出贡献人员嘉奖和鼓励，通过内部良性竞争激发新闻宣传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内生动力，从而提升政协新闻宣传工作的活力。此外，还可以采取选派人员到上级政协新闻宣传部门挂职、到新闻媒体单位实习、开展高层次能力培训等形式，提升宣传工作骨干业务能力，切实满足新时代政协宣传工作的发展和需要。

五、结论

新时代政协新闻宣传工作是政协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意义不仅在于提高政协的品牌形象，更在于宣传政协的工作成果和委员的履职尽责和担当作为，让政协的工作成果得到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为此，政协需要加强宣传工作管理，着力提升新闻质量，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报道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唯有如此，政协才能更好地为履行专门协商机构的职能，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汇聚起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当前，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政协新闻宣传工作的形式和内容也需要与时俱进，为促进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做出贡献。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应当注重新闻宣传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其在信息采集加工、传播、引导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以应对一个更开放、更多元化的社会传媒环境，让更多的人了解政协、认识政协、支持政协，更好地推动人民政协这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要事业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罗 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边疆治理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董国菊

(德宏州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芒市 67840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释放的强大动能可以有效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提供重要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同时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又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和实现路径。以党的边疆治理思想为指引,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实践为参照进行研究,发现边疆治理中存在:特殊地域环境的影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人口素质相对偏低;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有待厚植;绿色发展推进不足,生态文化认同意识亟待增强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因素。针对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路,建议加强党对治理工作的领导,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推进经济发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推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涵;提升治理能力,厚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环境;推进绿色发展实践,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态环境。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边疆治理; 实践路径; 德宏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4-0032-09

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边疆民族地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边疆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笔者以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中缅边境上的典型沿边地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旨在绘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相得益彰的生动画卷。

基金项目: 2023年全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协作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基于德宏州典型村寨民族互嵌式社会建设的调查”(2023KYYZB52)。

作者简介: 董国菊,德宏州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民族宗教。

^① 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30页。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的逻辑关系

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进一步推动理论深度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宏观上指引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边疆治理的有效推进则从实践层面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边疆治理提供重要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地缘关系和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等现实出发，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整体发展。我们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得出只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统一思想认识，才能最广泛地团结各民族群众共同致力于边疆建设，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思想统一的前提是各民族树立起国家意识，而国家意识树立的基础则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经过不断探索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从理论构建到实施运用全面向纵深推进，构建起了深入人心的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牢固树立”到“积极培育”再到“铸牢”，已深化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二）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和实现路径

中国是一个经过漫长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且与多个国家接壤。辽阔的边疆，地域差异性大，远离国家政治中心。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地域辽阔的东北、西北与西南的陆路边疆地区，这三大边疆地区也因此被统称为边疆民族地区，呈现出地缘政治多元性、民族多样性、文化交融性等特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央政府一贯重视边疆治理。边疆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在边疆治理实践中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实现了稳边固边强边的边疆治理目标。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边疆各民族逐步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因此，可以说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有效推进，从实践层面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治理实践和成效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认识十分深刻，强调中国只有唤醒民众，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起来，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国家，才能改变旧中国混乱的局面。^①经过长期艰难的实践探索，我国创造性地建立起一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有别于内地的，依靠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治理边疆的治理体系，在确保各民族平等和促进边疆地区发展的同时，强化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构建，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新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制度基础。边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也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治理政策的支持下逐步提升。

一是为维护边疆的安全与社会稳定，中央政府着力解决边疆传统安全问题，陆续勘定了陆地边界，与14个陆地邻国中除印度和不丹以外的12个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

^① 人民网：《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年08月25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825/c40531-25531621.html>，2023年12月29日。

体的疆域安全保障。中缅两国于1956年开始进行边界问题磋商,经过3年多的谈判,“德宏段中缅两国标定从5~105号,共101棵桩号、154棵界桩,其中,单号桩58棵、同号三立桩18棵、附桩4棵。至此,中缅两国政府联合勘界结束。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1961年,中缅两国政府签订了边界议定书,最终顺利而圆满地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①如今,德宏州503.8公里的国境线被确定下来了。

二是为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自1950年起到1983年,由中央及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成民族工作队,分三个阶段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民族识别工作,彻底明晰了我国民族基本构成,最终确定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实现了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结构。德宏州的5个主体民族中,傣族、傈僳族、景颇族在第一个阶段(1950—1954年)被确认,阿昌族和崩龙族(后改为德昂族)在第二个阶段(1954—1978年底)被确认。同时中央政府倡导民族团结,1990年9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是逐步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治理体系。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民族工作实践中,把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总结党的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决策。1952年2月22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以下简称《实施纲要》)。同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实施纲要》,次日公布施行。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将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各种决策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实现民族自治,确保了各民族政治平等、享有自治权,进一步深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自治法》)出台,以法律的形式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坚实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熟提供了可靠的遵循。1987年5月20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自治条例》,1987年7月14日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执行。随着《自治法》的落地生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德宏各族人民心中如春雨润物般日益得到深化。此后,在党的政策恩泽下,德宏各族人民积极参与边疆治理实践,过上了充满希望的日子。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时期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尽快缩小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我国在治理方向上明确了以国家认同为指南,以提升中华民族认同感为依归,以各民族利益平衡为目标,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支持下,国家在民族地区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教育、脱贫攻坚等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与历史上边疆治理有重大区别的治理措施。通过推进党政军警民协同治理,我国走出了一条有目共睹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道路。

以德宏州为例,多年来,德宏各族人民积极参与国家对边疆的全面治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

^① 《中缅联合勘界》,2013年12月4日,<https://www.dehong.gov.cn/dehong/ls/content-31-70-1.html>,2023年12月29日。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2021年12月29日,http://ylzx.yuelu.gov.cn/1886676/gwzl/zdhh/202112/t20211229_10419887.html,2023年9月27日。

的共同体意识得到自觉主动的认同，形成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安宁的社会治理良好局面。

一是德宏州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州地区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2653万元跃升到2022年的587.12亿元，增长268.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2年的2226元增加至33329元，增长14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87元增加至13175元，增长150.4倍。”^①现如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通过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对口帮扶、易地搬迁、劳动力转移扶贫、农村社会保障扶贫、特殊困难区域开发等，实现了州内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口较少民族整族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和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乡村振兴成效显著，人民生活水平已实现从“缺衣少食”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二是创新了以党建引领边疆治理的方式。在边疆治理工作中，德宏“抓住党组织书记这个‘关键少数’，通过年初‘建清单’、年中‘勤督导’、年底‘真考核’，以及强化培训、现场调度、挂图作战等方式，构建州一县一乡一村一组五级书记大抓基层党建全链条”，“健全党组织领导的群众自治、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机制，探索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党支部和村民小组‘双公章’管理村务制度，推行‘一村一公约’‘汉语+民族语’村规民约，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开展‘背着国徽去审判’现场调解会、‘送法律进村’行动，持续通过‘面对面’召开群众会、干部‘送学下乡’等‘土办法’，综合运用农村‘小喇叭’、文艺‘大舞台’等‘老办法’，灵活运用微信群等‘新办法’”^②，治理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三是教育卫生得到保障。全州中小学学校从解放前基本为空白的状况发展到今天拥有300多所，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入学率达99.6%，民族干部的培养得到重视，民族整体素质得到了提升，建成了覆盖州、县、乡、村四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四是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人心作用得以发挥。生活在德宏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治理及民族团结氛围的浸润下，手足相亲、互相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交融的互嵌式文化格局，创造了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目前，德宏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4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1项，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97项；将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与弘扬中华文化相结合、共同体意识与以滇西抗战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相融合，赓续历史文化，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爱国主义、红色革命等文化元素融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各族群众文化生活中，建成了一大批“中华民族一家亲”群众教育馆、“红石榴”主题街区、60多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或广场、40多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后推出一批彰显民族文化魅力的精品力作，如原创傣剧《刀安仁》、景颇族歌舞乐诗《目瑙纵歌》等；傣族泼水节、景颇族目瑙纵歌节、德昂族浇花节、阿昌族阿露窝罗节等民族节庆活动已成为各民族文化互鉴交融的载体和平台，传统文化凝聚人心的作用得以发挥。

三、边疆治理中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

随着我国全面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短期内不会消失，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民族沿边地州，德宏在边疆治理中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的挑战，新旧因素叠加，成为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因素。

^① 《70年，德宏逐梦开新篇！》，2023年9月21日，https://www.dh.gov.cn/Web/mobile/_F4RLZXQXBFA9F210F5887451B83_0_51WRUKUEFF479DFDA37B4225BA.htm，2023年10月13日。

^② 《云南德宏：以党建引领边疆基层治理》，2020年9月9日，<http://yn.people.com.cn/n2/2020/0909/c212289-34281853.html>，2023年9月27日。

（一）特殊地域环境的影响

德宏州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三面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 503.8 公里，是我国中缅边境线最长的地州。全州辖两市（芒市、瑞丽市）三县（陇川县、盈江县、梁河县），除梁河县以外均属边境县（市）；全州共有 23 个抵边乡镇（农场）、62 个抵边行政村、约 54 万群众抵边居住，抵边人口大约占全州总人口的 41%；^① 边境线犬牙交错、街道相连、沟渠相通，城连城、寨挨寨，形成了一坝两国、一江（河）两国、一寨两国，甚至一院两国、一井两国的奇观，边防管控的难度较大；邻国缅甸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复杂、社会发展水平不高，近年来局势持续动荡，疫情暴发、缅北地区武装冲突不断，使中缅边境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反分裂、反西化、反渗透的任务和压力较重，成为边疆治理的难点。一是跨境民族的族群认同潜在地影响着他们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占全州总人口数 45.63% 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傈僳族 5 个世居少数民族，与缅甸的掸族、克钦族、崩龙族、迈达族、傈僳族同族同宗，在农耕、互市、通婚、节庆、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共同的地域、族群语言、民族活动、宗教信仰等，使彼此间存在着较高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境外思想容易传入境内。二是跨境民族受外来宗教信仰的影响客观存在。境外宗教势力非法传教、封建迷信及邪教组织活动在一些边远村寨时有出现，防不胜防。同时，本土宗教教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解经说法的能力有限，有的未能对信教群众进行正确引导。三是跨境婚姻的普遍存在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给边疆民族村寨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如此种种，使得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面临诸多挑战，加大了治理难度，加重了反分裂反西化反渗透的任务，直接影响边疆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度。

（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

由于受政治、文化、民族、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德宏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直到今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德宏经济发展与内地相比显得滞后、传统、单一，投资增长乏力，产业发展动能不足，营商环境亟待优化，富边兴边强边要求更加迫切。多年来，德宏州 GDP 总量在云南省 16 个地州中排名靠后，财政自给率不高，“造血功能”较弱。尤其是 2021 年，受疫情影响，全州 GDP 增速为 -3.37%，是全省唯一的负增长地州。德宏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产业结构不平衡。2022 年德宏州“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587.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26.02 亿元，增长 5.0%；第二产业增加值 121.23 亿元，增长 4.5%；第三产业增加值 339.87 亿元，增长 3.2%。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22.2:20.2:57.6 调为 21.5:20.6:57.9。”^② 产业结构不平衡，经济总量小，产业支撑能力弱，创新能力不足，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困难；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短板多，产、供、销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盲目投入的风险较大；工业生产结构不够合理，分散程度较高、集中度较低、高消耗、高成本；服务业仍以传统领域为主，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等新兴产业发育不足。

二是需求动力的不平衡不充分。一方面生产需求严重不足，2021 年德宏州因受疫情影响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下降 35.6%。2022 年虽有所回升，但仍然乏力，“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 13.7%。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 39.8%；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69.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0.7%。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13.4%，占全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30.9%。”^③ 另一

^① 云南日报记者管毓树：《谱写边疆富乡村美的新篇章》，《云南日报》2021 年 5 月 26 日，第 6 版。

^② 《德宏州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 7 月 5 日，https://www.dh.gov.cn/tjj/Web/_F0_0_5FTMRFB8ADAC339A528A4A058D.htm，2023 年 10 月 5 日。

^③ 《德宏州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 7 月 5 日，https://www.dh.gov.cn/tjj/Web/_F0_0_5FTMRFB8ADAC339A528A4A058D.htm，2023 年 10 月 5 日。

方面从消费需求来看,2022年德宏州“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6.28亿元,比上年下降4.3%。分经营地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33.63亿元,下降4.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2.57亿元,下降4.9%。”^①

三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呈现出纵向上的历史阶段性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又呈现出横向上的多层次性发展的不平衡,制约着全州的整体协调发展。目前来看,芒市和瑞丽市各方面发展相对良好,盈江县、陇川县、梁河县有很大差距;各县(市)的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并已辐射到山区和坝区之间、不同民族之间、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直接体现在贫富差距的分化上,乡村振兴任务艰巨。

(三) 人口素质相对偏低

文化建设的内容不仅仅在于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活动的开展,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质即人的思想、文化、身体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以此构建起被社会和公民普遍认同和遵守的价值观,提高国家治理的水平、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德宏州人口素质总体偏低,从人口的文化素质上看,“德宏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州总人口(常住人口)为1315709人。其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37019人,占比10.41%;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35942人,占比10.33%;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80709人,占比28.94%;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42925人,占比33.66%。^②均低于云南全省平均水平(云南省上述各项占比分别为11.6%、10.34%、29.24%、35.67%)。究其原因,历史起点低,社会发育程度不足,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突出;乡村校舍改善明显,但受经济制约教育投入不足,部分家长对教育的认识存在局限,教育质量提升难度大,虽然已经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在一些边境村寨,辍学现象时有发生;文化建设上存在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虽然建设了许多文化教育设施,但因为建设中还存在重短期、轻长期,重政绩、轻实效,重形象、轻内涵,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现象,设施功能的拓展和使用难以满足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存在脱节的地方,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把握。

(四) 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有待厚植

一是治理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治理方式创新不足。按照中央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德宏州不断完善和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但在落实过程中,面对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城市社区管理、农村空心化后遗症、涉外婚姻、外籍务工人员、信教群众等问题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短板便显现出来。治理落实不到位,治理方式创新不足,治理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把治理当管理、行政干预过多、缺乏服务意识、政府与自治组织职责不清,群众没能充分享受到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甚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得不到有效保护,有可能陷入“政府做得越多,群众的信任度越低”的治理“塔西佗陷阱”,无形中削弱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二是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从德宏州2021年村级组织换届情况看,新当选的村(社区)“两委”成员中,平均年龄37.9岁,初中及以下学历占26.59%,高中(中专)学历占25.38%,大专及本科学历占48%,研究生学历仅有1人。虽然从数据上看,“两委”成员的平均

^① 《德宏州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7月5日, https://www.dh.gov.cn/tjj/Web/_F0_0_5FTMRFB8ADAC339A528A4A058D.htm, 2023年10月5日。

^② 《德宏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21年6月11日, https://www.dh.gov.cn/tjj/Web/_F0_0_04K66UIFKB4LW2KESNQS0DJ4J.htm, 2023年9月27日。

年龄正值青壮年,大专及本科学历占比也不算低,但实际上队伍专业知识储备不足、阅历“短板”明显,政策解读、领导艺术、沟通技巧和实践阅历等能力缺乏历练,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履职能力的发挥。同时一些领导干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甘于“躺平”,“四风”问题时有发生,也侵蚀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五) 绿色发展推进不足,生态文化认同意识亟待增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基础,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得以永续发展的保证。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两难”矛盾,二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德宏在美好家园建设中正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

美丽德宏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较为完好,森林覆盖率达71.84%,是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最富集、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已知野生动物1000余种,“拥有我国北回归线以北面积最大、以龙脑香科树种为主的热带雨林及其生态系统,被誉为‘植物王国’‘物种基因库’‘活着的鸟类博物馆’。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早在1992年就被原国家林业部、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我国最具保护价值的40处A级保护区之一。德宏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等级10年来全部为‘优’,连续稳居全省16个州(市)年度排名首位。”^①“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花开四季、果结终年,风光秀美、生态宜居,民族团结进步,边关风情浓郁,奇石美玉荟萃,素有‘孔雀之乡’‘歌舞之乡’等美称,有‘中华榕树王’‘东方珠宝城’‘葫芦丝之乡’‘中国最美乡村’等美景美名。”^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德宏各族人民守着“绿水青山”却不善于实现保护与开发利用双向奔赴,与全国、全省相比经济发展滞后,长期依靠财政补贴。

众所周知,生态系统是极其脆弱的,一旦破坏,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弱。十多年来,为建设美好家园,德宏各族人民借助国家各种政策,努力抓住机遇,“靠山吃山”寻求发展,比如利用水利资源和矿产资源带动经济,在11526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修建并已投入使用的水电站有114座,引进资金开采铅锌矿、锡矿、金矿、硅石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导致了水土流失、自然植被破坏、生物和水环境改变,以及可能造成整个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破坏;也曾凭借土地资源、口岸优势,引进生产制造企业,憧憬着开德宏制造的汽车、摩托,用德宏生产的手机、电视等,但由于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较低,产业开发没有形成规模化、集团化,依然存在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值的粗放型生产企业和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绿色生态经济发展缓慢。在不断试错中,德宏各族人民深刻经历了美好家园建设面临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困境带来的切肤之痛,逐渐意识到由于对生态环境缺乏足够的认识,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重开发、轻保护的盲目做法得不偿失。脆弱的生态环境难以承载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环境一旦被破坏,要想恢复,付出的代价必远远高于破坏带来的收益,唯有增强各民族的生态文化认同意识,不断推进绿色发展,德宏才有可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进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应从实际情况出发,与全国一盘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以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① 姚敏:《云南这十年,数个“第一”解读德宏砥砺前行这十年》,2022年8月3日, http://union.china.com.cn/txt/2022-08/03/content_42058222.html, 2023年9月23日。

^② 《十年砥砺铸辉煌 笃行不怠谱新篇——看德宏这十年》,《德宏团结报》2022年8月4日,第2版。

（一）加强党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工作的领导，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①党的领导是做好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一方面，务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到落实边疆治理的方方面面，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前进方向，引导边疆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另一方面，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在边疆地区治边、稳边、固边的坚强战斗堡垒，以党建引领边疆社会治理，确保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在基层有人懂、民族工作在基层有人抓，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各族人民的主心骨，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从根本上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二）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发展条件、比较优势等实际，找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②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如今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在云南交汇、在德宏叠加，国内产业加速转移、区域开放合作加速深化、绿色低碳加速发展，德宏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开放的优势更加凸显，南亚热带生态的优势更加彰显。加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德宏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持续加大倾斜支持力度，德宏迎来了发展的重大机遇。德宏各族人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握机遇、直面风险挑战、勇挑使命重任，创新发展动力、协调发展布局，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地区经济发展，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自豪感。

（三）推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涵

文化是各民族血脉相连的纽带，是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③通过文化建设推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一是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德宏州而言，要充分挖掘革命文化，用好德宏“抗战”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通过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边疆各民族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三是通过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良好氛围，同时充分发挥各民族能歌善舞的特点，宣传利用好各民族节日，唱响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讲好民族团结进步好故事，传播民族团结进步正能量；四要从德宏州民族文化多元、宗教种类齐全的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宗教信仰，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五是立足德宏地缘优势，提炼德宏民族文化精髓，“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④。德宏与缅甸山水相连，跨境而居的各民族能够成为信息

^① 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5页。

^②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021年8月28日，<https://www.neac.gov.cn/seac/c103253/202108/1152266.shtml>，2023年9月18日。

^③ 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33页。

^④ 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34页。

传播的载体,更生动、更真实、更接地气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民心相通,巩固两国长期友好的民意基础,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不断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周边环境。在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不断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涵。

(四)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厚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①针对德宏实际,要在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一是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发各族群众参与民主实践的内生动力。发挥基层协商在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解决民生问题等方面的作用,通过基层民主建设,分析群众意见大、干部工作难的主要原因,实行村务公开,清集体“家底”,亮干部“箱底”,明群众“心底”,保障基层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全程参与,有意识地引导群众摒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从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参与治理,自主、广泛、真实地参与民主实践,逐步培养起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真正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人。二是要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依法健全公共权力规范运作机制,明确政府的职能范围与活动边界,通过协商合作、确立共同目标,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解决好行政干预过多、“凡事政府说了算”的治理“行政化”问题。三是要推进善治乡村建设,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农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创新力;发挥村民自治的基础作用,引导村民提高自治水平;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纽带作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农民增收,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掉队,推进民生保障事业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 推进绿色发展实践,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②坚持绿色发展,坚守生态红线与底线,推进绿色发展实践,保护和建设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态环境。

一是要充分发挥生态优势、政策优势、区位优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展中处理好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中,统筹生态功能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使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各民族美好生活的增长点,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二是要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弘扬民族生态文化。强调不同民族在同一生态系统内的共存和共生关系,挖掘德宏各世居少数民族相沿成习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动植物资源,与各种动植物融洽相处、和谐相交、共生共荣的原始朴素的民族生态伦理文化。比如傣族与孔雀、大象等动物的相融相生、景颇族目瑙示栋中展示的对鸟类的崇拜、阿昌族关于动植物和山水的生产生活方面的禁忌、古老茶农德昂族原生态伦理观、傈僳族狩猎禁忌对动物的保护等,找到这些生态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并将其发扬光大,目的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各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态环境。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本书编写组编著:《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41页。

^②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来源:《求是》2020年第21期,2020年11月1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0-10/31/c_1126680390.htm, 2023年11月3日。

藏羌彝走廊： 中华民族共同体要素、特质、共同性的具现

王 芬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是历史性的、渐进性的、具体性的、实践性的，必然贯穿过去、现在、未来，必然历经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的阶段。以此观照，藏羌彝走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阶段、一种方法和一条路径。藏羌彝走廊所内含的亲密血缘与族源、共同的文化地理、交融的生计方式、同源的语言体系、统合的文化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要素。藏羌彝走廊交往、交流、交融、互动、互助、互惠的样态具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质。藏羌彝走廊以共生的生态生命走廊、同心同德的精神文化纽带、共享的文化经济带、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等方式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

关键词：藏羌彝走廊；区域整体性；区域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3)04-0041-06

位于“六江流域”地区（横断山脉），地理空间呈现为带状、廊道特征的藏羌彝走廊，其中并非只有“藏羌彝”三个民族，还存在其他多个民族。从民族和国家的范畴、历史整体的维度理解藏羌彝走廊，有助于彰显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互动、互助、互惠的特征，有助于体现其民族廊道、文化长廊、经济纽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与意义。

基于此，从历史连续性、区域整体性、文化实践性、经济宏观性等维度审视藏羌彝走廊，可知藏羌彝走廊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要素和整体性特质，相应地，持续深度交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藏羌彝走廊的进阶方向，换言之，藏羌彝走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种方法和一条路径。藏羌彝走廊的区域空间与民族实体已然历史地、现实地、持续地建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的血缘与族源、生态共生系统、生计方式、同属语系等特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系的内嵌表征和有机要素。

一、藏羌彝走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要素

（一）亲密的血缘与族源

血缘在中国人的情感之中具有特殊的纽带作用与亲近性，具有天然的文化认同与家国认同的基因。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血脉相连、相互交融，具有共同的族体渊源与血缘纽带关系。例如，“羌”部族众多，不是单一民族。^①“西南夷”多数部落属于氏羌民族系统，羌成了向多个民族输血的渊源性的民族。“佉族、阿昌族、回族、布朗族、德昂族、回族等曾融入

作者简介：王芬，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文化心理学。

^① 杨圣敏、丁宏：《中国民族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4页。

到傣族之中”“人们通常认为生活在怒江峡谷的独龙族、怒族、傈僳族、白族（勒墨人）是较为隔离的群体，但历史和民族学研究发现，即便是在这样封闭环境中，民族间也发生着文化和基因的交流”。^① 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不仅仅有历史记载的依据，还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来验证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例如，关于汉藏同源的论证。在2003年，云南大学依托自有的中国少数民族基因库，从遗传学的视角证明了“汉藏同源”，即汉、藏本来就是一家人，具有共同的生命渊源。^② 可见，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具有共同的血脉渊源与生命之源，毋庸置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二）共同的地理文化

地理环境既是民族生存的现实空间、生活的实存依托，也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石。藏羌彝走廊的空间范围包括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六江流域”的横断山脉，在基本类似的地理环境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心智、心理反应乃至基本的价值观念，这是各民族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基石。藏羌彝走廊为各民族频繁迁徙、文化交流、商贸活动提供了便利通道，促进了不同社会结构类型和文化差异的民族进行社会交往和经贸交换。历史上，这种南北通道为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吸收中原地区悠久灿烂的文化，经济社会文化向着中原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便利。在固定的地域空间中，大杂居小聚居的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逐渐强化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认知，成为具有共同精神文化追求和内在凝聚力的地域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走廊，呈现出地理、生命、文化、生态的多元一体。

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保持与延续生命的关键在于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并创造出了特定环境的生存法则与生活方式，形成了民族文化区。这是各民族主动适应自然环境的积极结果，体现了人类生命体所具有的伸缩性与坚韧性。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处在一个共同的地理、气候、地貌空间，彼此亲和、互补。^③ 民族群体的存在赋予了“六江流域”人文气息与生态灵性，人与山河之间形成了良性与韧性的互动关系，人、山河、动植物并存于此，共同构建了人与自然的生命纽带。

（三）交融的生计方式

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的迁徙过程既是探索生计方式的过程，又是民族群体根据与生态环境资源、社会联系、经济活动等外在要素不断调适自身的过程，从而探索出相对合理的生产组织形态、行为方式和生产模式，为该民族群体的生产行为、精神追求、生活习惯、文化心理奠定物质基础，进而以物质的力量和经济的相关融入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通过经济文化的交往，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互相依存、互通有无，关系更加紧密，相互认同度逐渐提高，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奠定了经济基础。

藏羌彝走廊通过生计方式的交织与统合，逐渐演变为“民族经济走廊”。藏羌彝走廊内含的经济与文化互动联系的经济文化类型，反映了共时的、静态的生态环境与空间分布，折射了历史的、动态的社会文化与发展历程。藏羌彝走廊以民族的范畴表达了文化经济空间，表明了走廊的统一性与民族的统合性，既是对现有民族迁徙史、融合史的过程描述，也是对民族迁徙与社会发展的结果阐释。

（四）同源的语言体系

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渊源。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交心，依赖于语言。语言沟通既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各民族之间增进情感与思想文化的载体，能够促进各民族交往，承继民族文化内涵，传递风土人情，体现民族统一性与群体性。

① 苍铭：《民族迁徙与云南边地民族涵化——兼谈遗传学的民族关系研究》，《2002 现代人类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第20—23页。

② 高发元：《以全新的观念推动学校跨越式发展》，《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第8期，第33页。

③ 赵洋：《守候与亲和：藏羌彝走廊文化生态美意蕴解读》，《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第91页。

鉴于语言规则的相似性与对应性，以及民族语言之间的亲近特征和谱系关系，藏羌彝走廊既是“藏缅语民族起源、发展、融合和分化演变的最重要的历史区域”^①，又是其他一些民族或族群起源、发展、融合、迁徙和分化演变的重要通道和历史区域。“汉语和藏语的亲近关系支持了费孝通所提出的‘羌人是汉藏之间的联结环节的假设’”。^②彝语也与藏语同样亲近，彝语系统的民族是从北方迁入的，即西南民族大部分与北方民族具有历史渊源关系。^③由此可见，西南民族、氏羌民族、藏羌彝民族、北方民族之间具有相互交织的语言渊源，实证了“各民族是一家”口号的真实性，培育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民族交流日益加深，人口流动频繁的现代，语言的相互借用和吸收逐渐增多，也促进了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之间彼此了解，尤其是普通话的推广与流行，在更加广阔的藏羌彝走廊和民族区域中促使彼此的关系更亲近，情感联系更密切。

（五）统合的文化内容

藏羌彝走廊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是有共性的，文化要素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关系，少有清晰的厘定边界。藏羌彝走廊各民族文化被高山峡谷的天然同质性地理地貌所统合，体现了社会文化整合水平，体现了相对较高层面的趋同态势。藏羌彝走廊各民族文化或呈现集体叠加样态，或呈现为具有交融性的一体化样态，和谐交融共存的局面是长期民族交融的结果。各民族文化区块的整合、统一是在国家层面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石。

生命的存在需要精神文化支撑，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在“六江流域”的共同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大体相似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社会风貌、价值观念等文化符号，根源于这些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相似的文化基因，具有“以崇拜祖先为核心的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民间信仰理念，以及藏缅语族中很多民族共同的思想文化特征”^④。藏羌彝各民族的交叉交往与密切交流，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而言，形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紧密相连的交织网，加强了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与融合。藏羌彝走廊正是特定文化时空中众多民族在迁徙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情感纽带与文化纽带。

二、藏羌彝走廊具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特质

藏羌彝走廊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有机要素，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藏羌彝走廊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交错杂居、文化兼收并蓄、经济相互依存、情感相互亲近等特点；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历史演进特点。

（一）相互交往与互动互惠

藏羌彝走廊是历史上的迁徙走廊，是当代的大流动廊道。无论迁徙，还是流动，都意味着民族之间、个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无论是经济交换、社会交往，还是语言交流、文化交融，都是各民族在相处的重要方式。尽管各民族在相处中有部分问题的存在，但藏羌彝走廊的民族迁徙、人口流动意味着各民族逐渐突破自然限制，趋向于在更加广阔的地域空间中实现整合，趋向于在更宏观的整体结构中交融于中华民族。

唐蕃古道、松茂古道、滇楚古道、茶马古道等多条经济文化交流的古道与藏羌彝走廊重叠或交汇，形成了纵横交织的经济文化交通枢纽。各民族之间的科技文化传播、和亲、纳贡、贸易、交流等方面的物流和人流乃至信息流，经过藏羌彝走廊流向了西南大部分区域，散播于中国

① 石硕：《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期，第17页。

②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③ 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④ 普忠良：《藏彝走廊文化域中的羌文化自议》，《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9页。

大地。

民族交往的常见方式是通婚。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之间的联姻事例不胜枚举,各民族之间通婚,加深了民族交往,促进了彼此认同,强化了民族团结。族际婚姻强化了不同民族的血缘联系,姻缘、血缘成为民族关系紧密结合的纽带。“56个民族一家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也成了“各民族是兄弟姐妹”的生动解说,反映在民族文化上是相互之间的文化认同程度逐渐提高,反映在民族心理上则是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心理特质和内心感触,反映在精神上则是各民族共建共有精神家园。

民族交往通常是双向的、多向的。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促进民族间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文化形态的传播和交融。于是,民族文化在互动、互助、互惠的基础上不断交流和融合。

(二) 文化交融日益加强

从生计方式、生态经济的维度来看,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创造了自身的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都有其文化特质,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形态和交融样态。从历史文化的维度看,游牧文化、山地文化、农耕文化、民族文化等事象以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记忆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展现了民族文化交流史。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多样性既是历史上社会发展差异的结果,也是“六江流域”高山峡谷地理生态环境的造化,还是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化所形成的,这些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质。

多姿多彩的文化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居住方式上体现为互嵌式社区结构、“交错杂居”式村寨社会,形成了各民族比邻而居的和谐样态。藏羌彝走廊中同村同寨共同欢度不同民族节日,各民族生活习惯逐渐趋同,各民族语言相互交叉、借用频繁,民族之间高度认同、彼此团结一致。由此可见,藏羌彝走廊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民族认同的多向性,民族文化多样化并不必然导致民族区域发展的趋异与分散;相反,居住在横断山脉高山峡谷之中看似不同与多样的民族,因为民族之间相互交往频繁,相互交流交融,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自发浸润与自然统合,而多民族交错杂居与文化认同恰恰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

不可否认,藏羌彝走廊各民族有其特定的文化习惯,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但是,多民族、多元化既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按照群众工作路线,要尊重各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但这并不是固化差异、强化多元,而是在保护多样性中增强共同性、包容性。按照民族工作主线,要以“自然的、渐进的、包容的”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容不得任何急躁、盲动、强制;要相信随着“大流动、大融居”态势的自动加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频率和力度必然加快加强;要“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和建构互嵌式社会结构,以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①。

(三) 民族的统合与交融

政治的统合促进了民族的形成与交融。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与区域民族政权在藏羌彝走廊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统合。秦朝以降,大部分中原王朝统摄着藏羌彝走廊中的大部分区域,促进了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即便是历史上藏羌彝走廊所涌现的割据政权和民族政权也在局部上促进了其辖区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藏羌彝走廊各民族无论属于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时期,抑或处于民族政权的分裂时期,各民族在特定区域与政治制度的统合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融状态。

藏羌彝走廊各民族被统合的直接因素是中央王朝因地因族因势实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策略。

^① 莫代山、黄大勇、吴冬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旅游发展路径》,《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100页。

西汉先后设置的陇西郡、张掖郡、越嵩郡、汶山郡、武都郡等归属在藏羌彝走廊区域，也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区域，同时设立流官系统、土官系统，既保持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又保证了历史形成的少数民族头领自主权，还能打通民族区域中各族人民与中原地区人民之间的交融通道。唐朝实行的羁縻府州制度，促使少数民族头领负责的地域融入中央王朝统辖范围。针对吐蕃、南诏等政权，唐代中央王朝通过通使、和亲、册封、互市等策略，建立了甥舅、兄弟的“大家庭”关系。元明清时期，在藏羌彝走廊实施土司制度、流官制度，实现了有效的直接管辖。新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符合藏羌彝走廊发展，更加精细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情感认同与文化认同。藏羌彝走廊历史发展的传承性与统合性，提升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祖国的统一。藏羌彝走廊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和不断加强的团聚和统合的过程，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民族间的自然交融。

三、藏羌彝走廊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

“六江流域”与横断山脉叠加形成了藏羌彝走廊共同体的特定地理环境，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中国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特色文化产业走廊等战略举措聚合了藏羌彝走廊文化经济带，藏羌彝走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为各族群众创造了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它们共同形成了藏羌彝走廊这一各民族共生的生态生命走廊、同心同德的精神文化纽带、共享的文化经济带、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一）各民族共生的生态生命走廊

藏羌彝走廊中各民族处于共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态圈之中，共同的动植物资源和自然生态造就了各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文化图式，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智慧，各民族通过自身的传统文化认知生态资源和获取生存物质。民族、生物、文化、地质等多样性因素，在藏羌彝走廊中不同程度地呈现为同一生境中不同族群的生命与生存状态，也形成了青海水塔、四川九寨沟、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等生态文明范例。“六江流域”与横断山脉的良好生态环境是各族人民的命脉保障，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各民族文化要素有效反作用于这里的生态环境，形成了人、地理、生态、文化共同构造的生命走廊。

（二）同心同德的精神文化纽带

一般而言，在地理生态环境相同的条件下可能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每一个文化圈都具有一系列的物质文化特征。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的“文化亲缘关系”和相似程度，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同质性和情感同理性。如果把文化区、文化圈的范围扩展，那么，藏羌彝走廊各民族文化事实上是中华文化在不同区域中的文化留存，其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①折射了中华民族的演变历程，由此展现了藏羌彝走廊文化区和中华民族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形成具有辐射区与核心区的文化地理关系。同时，藏羌彝走廊各族人民经过通婚、联姻、文化交流、经济交换等方式，逐渐消解语言的障碍、习俗的差异、心理的隔阂，加强了社会交往、血缘关联和情感联系。同心同德的精神文化纽带成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源动力。

（三）共享的文化经济带

藏羌彝走廊文化资源丰富，历史文化积淀厚重，民族文化交融共存，自然风光独特，生态资源多姿多彩，民族关系和谐，为藏羌彝走廊发展文化产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国家为藏羌彝走廊制定了新时代宏观发展战略与规划，如《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

^① 罗勇、卢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西藏文化和旅游发展策略研究》，《西藏科技》2023年1期，第31页。

升和市场运作,向广阔的文化市场提供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服务,以促进演艺娱乐、文化旅游、节庆会展、工艺美术、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藏羌彝走廊以社会结合、资源配置、文化共享的方式,把公共文化服务共享、文化旅游综合共治、特色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内涵融合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中,促进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依托和共享经济优势,形成藏羌彝走廊共享型文化经济共同体。藏羌彝特色文化产业走廊在共享经济潮流中,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经济交换和产业集群的步伐,助推了各民族共享文化经济发展成果,提升了藏羌彝走廊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共享水平,促进了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共享发展、共同繁荣,强化了各族人民的“五个认同”。

(四)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历史上,藏羌彝走廊内建立过多个地方政权,政权割据以及相互争夺所引发的战争曾在一定时期内导致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反向证明了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性。近代,西方殖民侵略强化了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交融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紧迫性,表明了命运与共的民族情感更加可贵,肝胆相照的民族情谊更为关键,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更为重要。各民族在反抗封建统治与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增进了友谊,加强了团结。藏羌彝走廊的历史事实,已经反反复复地证明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这一真理。

同时,藏羌彝走廊既得益于历史上的多次民族大交融,又得益于各民族相互的社会文化认同,以及历朝历代对藏羌彝走廊区域的集体统合,这加速了藏羌彝走廊的国家化进程。藏羌彝走廊各民族恰似石榴籽一样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区域性民族共同体。尽管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具有各自的特质和文化差异,却在长期的民族交往、经济交换、生活交融中,形成了互惠互利的生产关系、互助互济的生活关系、互嵌互融的社会关系,达成了较强的包容性、认同性、交融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不让一个民族掉队,各民族感同身受,其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必将油然而生。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下营造出的平等相待、团结和睦、友好互助的社会环境中更加紧密地凝聚在一起,持续地强化着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

藏羌彝走廊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民族精神层面抑或制度层面,都认同中华文化中所倡导的“和合”“中庸”“仁慈”“真善美”“公平正义”等理念,都认同历史形成的“大一统”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地、持续地建设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藏羌彝走廊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国家认同,形成了共同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家园,齐心携手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群力群策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心同德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杨松禄

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研究

——以临沧市44个沿边行政村为例

唐伟

(中共临沧市委党校, 云南 临沧 677099)

摘要: 临沧市位于云南省西南边境, 跨境民族众多、宗教复杂、文化多元,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文化问题相互交织, 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面临严峻挑战。临沧市具有绚丽多彩、积淀厚重的边境文化、民族文化、特色文化。应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建设中华文化载体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传承发展, 用中华文化赋能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 着力在边境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助力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为临沧高质量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价值引领和文化基础。

关键词: 中华文化认同; 边境幸福村; 文化建设; 临沧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3) 04-0047-07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是政治认同的坚实基础, 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动力之源。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文化, 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 包含着丰富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 才能巩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 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促进文化认同的思想资源, 从中汲取认同的文化力量, 着力在边境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助力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为高质量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价值引领和文化基础。

一、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就没有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临沧市44个沿边行政村地处中缅边境, 跨境少数民族众多、宗教复杂、文化多元, 是抵御境外意识形态渗透的前沿阵地, 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 既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 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基金项目: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协作课题“以中华文化引领边境文化幸福村建设研究——以临沧市44个沿边行政村为例”(JDXZ202305)。

作者简介: 唐伟, 中共临沧市委党校(临沧市社会主义学院)决策资政研究中心副主任、编辑,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 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然要求

边境地区最显著的特征是,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宗教情况复杂、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诸多挑战。文化认同能够为不同民族寻求共识,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①。魂固才能神聚,我们要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的文化建设,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由各民族文化融合凝聚而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所认同、所归属的同一性文化,具体内容应主要包括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人文素养和思想积淀、共同的历史记忆等,它是中国数千年来维持统一团结的文化根基。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建设边境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各民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最深厚的内生动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发展提供目标指引和文化力量,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然要求。

(二) 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内在要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关乎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具有标识性的独特文明创造,是中华民族矗立于世界之林的深层力量。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强调,“5000年的历史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认清了5000年,我们就会自然地形成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化自信的底蕴、底气也是这么形成的”^②。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之前,从公元前841年西周时期开始,中国的信史记录就没有中断过。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3个文明古国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华文化则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姜尚、姬昌、老子、孔子、庄子、列子、关尹子、孟子、孙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经历近30多个朝代,开创了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领先世界之繁荣盛世。中华文化也是包括边境各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可以从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自觉延续文化基因,增强边境村各族群众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 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是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现实要求

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和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形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支撑着中华民族历经5000余年的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③。临沧44个边境行政村是面向缅甸的前沿窗口、重要通道,对于讲好临沧故事、云南故事、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意义重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延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流互鉴的历史取向以及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

^①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第1页。

^② 《从首次提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感受这些力量》,2023年10月10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9338674722270543&wfr=spider&for=pc>, 2023年10月30日。

^③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①我们要充分发挥窗口、重要通道对于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作用，立足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文化，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深入阐释中国的天下观、文明观、世界观等重要理念，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缅命运共同体，充分展示新时代中国为解决全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二、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

临沧市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有镇康、耿马、沧源3个边境县，10个边境乡（镇），44个沿边行政村，320个自然村。临沧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立足“推窗向洋，家国临沧”的城市品牌定位，依托处处焕发生机、绚丽多彩、积淀厚重的远古文化、民族文化、特色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华文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在边境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效地凝聚了人心，维护了民族团结，树立了正确的价值导向，维护了国家文化安全、主权安全。

（一）具体实践

近年来，临沧市创新实施“1336”工程，即围绕一个核心，以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核心；聚焦三大任务，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树牢三个心向，心向总书记、心向党、心向国家；实现六化目标，基础设施智慧化、乡村产品商品化、人居环境生态化、日常生活健康化、社会治理信息化、群众工作组织化。临沧边境村的文化建设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展开，不断树牢国家意识、国土意识、国门意识、中华民族意识，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探索出了一条边境幸福村文化繁荣发展的新路径。

1. 以党建文化凝聚沿边行政村的之魂。党建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自身建设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类文化观念的总和，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近年来，临沧深入开展“边疆党建长廊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把红色基因注入各个项目建设中，以党建文化之魂凝聚边境文化之魂。同时，开创“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守边、稳边模式，形成“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村民就是一个哨所”，让守护在临沧边境线上的各级党组织成为“固边卫国”的战斗堡垒。临沧25个抵边村寨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插着五星红旗，在正堂悬挂领袖画像，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对党、对祖国的感恩之情，不断筑牢边疆民族地区“红色屏障”，实现了以党建文化凝聚沿边行政村的之魂。

2. 以民族文化彰显沿边行政村的民族特色。临沧44个沿边行政村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众多，居住着佤族、傣族、拉祜族、布朗族、德昂族、彝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化绚丽多彩、焕发生机。临沧沿边行政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为特色的边地人文，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还拓展了中华文化的外延，推动民族特色文化传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乡村文化凋零的局面。

3. 以边境文化彰显沿边行政村的边地风情。临沧与缅甸相连的是南滚河国家公园，至今还保留着完整的原始植物自然景观。沿边一线，由于奇异的山川河谷和复杂多样的气候环境，形成了无数的天造自然奇观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具有优美的边境风光。同时，跨境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迷人的边地风情和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众多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成为发展文化旅游经济的独特资源优势。近年来，临沧着力打造以边地民族风情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旅游经济，不仅彰显了沿边行政村的的地域文化风情，也发展了当地的旅游事业。

^①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021年6月1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373014.html>，2023年10月30日。

（二）基本经验

临沧市44个沿边行政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传承发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提高边境地区群众文明素质、社会文明程度和维护文化安全为目标，以“我们都是收信人”的责任担当和时代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牢“心向总书记、心向党、心向国家”的思想共识，为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1. 发挥政治建设的统领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① 政治统领是文化建设的总方向。临沧在边境地区的文化建设中，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同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起来，让边境村的文化建设转化为党的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支撑和智慧源泉，使文化建设更加生动、更加具体、更加有效。

2. 批判地吸收借鉴外来文化。边境地区是抵御“文化渗透”的前沿阵地，边境地区的“文化安全”是边境安全的重要内容，在边境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限于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边境各族人民共同维护祖国统一、共同抵御分裂的必然要求。临沧边境地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树立文化自信，批判地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筑牢了民族之根魂；挂牌成立了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临沧市分中心，服务对外开放的作用和能力更加凸显，不断讲好临沧故事、云南故事、中国故事，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谱写好临沧篇章，增强了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3. 建立健全边境村规章制度。临沧边境地区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修法规划、村规民约制定等，完成940个村（社区）、6580个自然村（组）村规民约的修订工作，尤其是临沧市44个沿边行政村，根据边境地区实际，在村规民约中强化了守土尽责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通过教育、践行、制度、执行、监督、评价等机制的良性运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

（三）存在问题

临沧市4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320个自然村在文化传承、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发挥了在塑造乡村灵魂、价值引领和道德支撑方面的作用，但与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的文化建设要求相对照，还存在以下问题。

1. 文化认同引领作用不充分。中华文化的传承载体建设不足，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目前，临沧44个沿边行政村的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缺乏创新，仍停留在逢年过节时的唱唱歌、跳跳舞等传统模式，有些乡村甚至连这些简单的文化活动也难以坚持。劳作之余，农民的消遣活动大多集中在走亲访友、串门、闲聊、看电视、聚众喝酒，甚至打牌赌博和从事封建迷信活动，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 民族文化的精髓提炼不足。面对纷繁复杂的民族文化，如何提炼、传承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还比较滞后，尤其是在系统性研究民族文化的历史形成、时代价值等方面还有差距。边境村文化建设只有突显民族文化应有的核心价值，才能寻找到源头活水，从中找到滋养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精神力量和智慧源泉。

^①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5—36页。

3. 边境文化的内涵不够丰富。边境文化的挖掘整理，多局限于对边境地区的民风民俗、自然风光等进行浅层次的宣传阐释、旅游观光等，对民风民俗的历史形成、风俗变迁、核心价值等挖掘得还不够，对自然风光的整体开发、规划解析不够深入、系统、全面。

三、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

临沧市44个沿边行政村的文化建设是“国门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载体。云南省“国门文化”创建项目包括国门文化交流中心、国门文化友谊广场、国门书社、国门文化传习馆、边境文化幸福村。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的文化建设，既是边境村文化振兴的基础，也是讲好临沧故事、云南故事、中国故事，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必然要求。临沧边境村的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从建设中华文化载体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传承发展、用中华文化赋能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三个方面，着力推进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为边境村的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

（一）建设中华文化载体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文化载体，是指文化的记录、记载、标识、传承和表现的物化形式。文化总能以无形的状态、无形的观念，作用于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历经千载绵绵不绝、生生不息，以丰富多样的形态和稳定厚重的载体，延续着中华民族的品质和精神。因此，建设中华文化载体，是赓续中华文化基因，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方式。

1. 以中华文化引领村史室建设。目前，临沧结合各村地域特色、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产业发展等文化底蕴和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建设了1591个村史室。村史室通过用文字阐述发展历程、用物品承载历史底蕴、用图片记录进程、用对比展现发展变化、用实景浓缩发展记忆等方式呈现了乡村的变迁、历史传统以及独特的乡村价值理念，较好地发挥了“存史、资政、为民、育人”的作用，真正让村史室成为群众忆往思今、自我教育、凝心励志的“精神家园”。但村史室在建设过程中，以中华文化价值理念引领不够，没有充分彰显出中华文化深厚独特的文化底蕴。建议对各沿边行政村的村史室进行提质升级，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要求，以中华文化价值理念引领村史室的建设，充分彰显中华文化革故鼎新、与时俱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尊时守位、知常达变等方面的思想理念，精忠报国、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方面的传统美德，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俭约自守等方面的人文精神。

2. 建设中华文化活动场所。临沧市各沿边行政村大多属于民族村寨，都建有文化活动现场，但目前的文化活动场所大多用于村民们休闲娱乐，且文化活动现场的设计形式大同小异、同质化严重。建议将临沧市沿边行政村的文化活动场所，按照中华文化的审美特点，提质升级为中华文化活动场所，以整个文化活动现场全面展示中华文化的核心标识和文化精髓，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同时，文化活动现场也要充分展示村寨基本概况、风土人情、民族服饰等方面的内容，扩大中华文化的外延和内涵，让群众在休闲娱乐的同时，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沉浸式感受民族团结一家亲氛围，实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契合，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

3. 保护利用乡村文化遗产。传统乡村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乡村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尤其是保留下来的历史记忆、村规民约、家风家训、民风民俗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活方式等，虽然未必都能正式列入非遗名册，但都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临沧沿边行政村分布着茂隆银厂遗址、老水井山军事设施、岔沟碉堡等众多文化遗址，要全面梳理、保护临沧边境村的文化遗产。一是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重视村史、村志的修撰，深挖文化

遗产, 凸显边境村的文化底蕴; 二是传承农耕文化, 展示乡村地区丰富的历史和传统, 使乡村形象更加有深度和韵味; 三是按照“取其精华、舍弃糟粕”的原则, 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时代文化进行深度融合, 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特征又有现代文化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时, 在做好传承、保护的前提下, 对边境村的文化进行合理开发利用, 打造一批农旅融合、边旅融合、文旅融合、康旅融合的边境文明村寨。

(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传承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 “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升华”^② “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 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中, 深刻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深厚的文化基因、精神纽带、价值源泉, 边境村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制定村规民约, 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村规民约是村民共同价值观的凝聚, 是倡导文明新风、推动移风易俗的有效载体, 是搞好乡村治理的“助推器”。为有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保障作用, 临沧市各沿边行政村要根据实际, 以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 深化乡风文明建设,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思想融入村规民约,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使村规民约去繁化简、推陈出新, 接地气、重传统、得民心、崇时尚、简易行, 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各村“生根发芽”,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不断焕发生机、不断深入人心。

2. 坚定文化自信,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文化特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基本的精神力量, 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也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孕育形成的深厚土壤。临沧边境村作为多民族、多宗教和多元文化的聚集地,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临沧市沿边行政村的民族文化五彩缤纷, 在文化建设中, 既要坚守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 保持民族特色, 也要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结合各民族优秀文化贯彻传承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文化特色。同时, 正确认识边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关系,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各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 凝聚民心、提气鼓劲, 结合时代和实践要求加以贯彻, 赋予其当代内涵和表达形式, 增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涵养乡村好风尚。

3. 立足中华文化, 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文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 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④ 树高千尺有根, 水流万里有源。中华文化解决的是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精神世界的根本问题。认同的前提是理解和认知, 我们要让边疆少数民族正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71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3页。

④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第1页。

确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源流、核心价值、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是引领一个国家和民族砥砺前行的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成为植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肥沃土壤，边境村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书香村寨建设”等活动，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文基础。

（三）用中华文化赋能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①用中华文化赋能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不仅可以为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可以为不断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与力量。

1. 用中华文化夯实边境村的思想文化。文化是边境幸福村建设的灵魂。当前，临沧市沿边行政村的思想文化建设仍面临许多挑战。一方面，受物质利益的影响，一些不良的传统乡村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们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在信息化的冲击下，加上境外文化时有渗透，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存在被边缘化、空心化的情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脉”与“魂魄”，以中华文化认同引领边境幸福村建设，可以为边境幸福村的思想文化正本清源。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故事、乡间音乐、风俗习惯等文化资源，包含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不断进取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宽厚精神等，是培育边境村民思想文化的思想源泉。

2. 用中华文化培育边境村的文明乡风。乡风民风既是特定区域内乡村居民的集体行为倾向、思维模式与情感道德，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本封闭的乡村社会环境被打破，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与文化侵蚀着传统乡土伦理的社会基础，使乡村社会或多或少产生了金钱至上、极端利己等不良倾向，追名逐利、酒桌文化、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不良风气时有盛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边境村民移风易俗的重要文化载体，其赋予了乡风民风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方面的价值标准，能够引导边境村民形成积极向上、健康有趣的生活方式，从而提升边境村民的道德水准与文明素养，使边境村民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

3. 用中华文化净化边境村的精神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厚植边境村民的精神沃土。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客观上村民的财富意识受到刺激，乡村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盲目攀比、不思进取等风气在一些地方有所抬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守孝悌、重品行等精神文化特质，是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与生活哲学的智慧体现，其能够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有效衔接，并通过口口相传，使村民耳濡目染，以此弥补乡村精神文化缺陷，矫正乡村不良精神文化现象，解决边境村精神文化缺失问题，净化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增强边境村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42页。

演进·热点·展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探析

——基于 VOSviewer 的 CNKI 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李俊余¹，安敏²

(1. 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499；

2. 西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以 2017—2023 年 CNKI 期刊库中篇名包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 CNKI 和 VOSviewer 1.6.18 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文献特征和热点议题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探索、深化发展和持续热度化三个阶段，时政性较为明显；核心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合作较为分散，核心团队和科研共同体尚未形成；热点议题主要集中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依据和基础、机遇和挑战、实践路径五个方面，研究视角呈多样化特征。未来，要继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重视学科交叉和方法融合、深化实践经验提炼，以不断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质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VOSviewer；可视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3)04-0054-10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术界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依据和基础、机遇和挑战、实践路径展开多维度研究，并取得诸多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相关成果，发文量呈明显的规律性增长趋势。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基础上透彻把握研究现状，对于我们增强问题意识、把握热点议题和明晰研究方向，加快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进而构建系统完整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进入 CNKI 期刊库高级检索页面，以篇名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献为检索对象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 2022 年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铸牢云南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022Y650)。

作者简介：李俊余，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计量与管理；安敏，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统计分析方法、应用经济学。

(数据采集时间为2023年3月6日)，匹配方式为“精确”，来源为“中英文扩展”，共检索到文献1716篇，剔除会议通知、征稿启事和学习体会等非学术文献后得到1685篇，以Refworks格式导出并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除使用CNKI自带的可视化工具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发文规律、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和期刊来源进行计量分析外，还运用VOSviewer 1.6.18对所选期刊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VOSviewer 1.6.18是由荷兰莱顿大学技术研究中心的Van Eck和Waltman开发的一款基于Java的计量分析软件，关键词和作者共现是该软件分析CNKI期刊文献的两大方法，它以频率为核心指标，对期刊文献所包含的关键词进行网络分析和降序排列，并对无效字段和同义关键词进行剔除与合并，从而将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以科学知识图谱的形式直观呈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率的高低，线段的粗细代表关键词之间联系的强弱，而距图谱中心的远近则代表关键词中心性的强弱。

二、文献特征分析

(一) 发文规律分析

运用CNKI可视化分析工具，以年份为横坐标、发文量为纵坐标，绘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发文趋势图(如图1)。同时，借助SPSSAU对该领域的累积发文量进行回归分析， R^2 值为0.893，这说明年份能够解释累积发文量89.3%的变化原因。通过对模型进行 F 检验发现， F 值为41.592， P 值为0.001，这说明该模型的构建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此条件下，进行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年份回归系数值为320.286， t 值为6.449， P 值为0.001，这说明年份会对累积发文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建立模型公式为 $Y = -610.286 + 320.286X$ ，该模型能够为学术界判断该领域研究成熟度提供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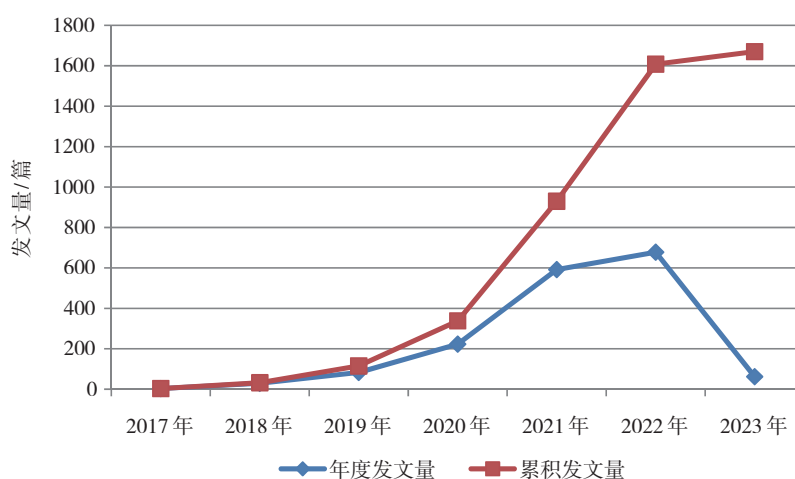


图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发文趋势图

如图1所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发文趋势总体符合普赖斯文献增长规律^①，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 2017—2018年，该阶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起步探索阶段，发文量分别为3篇和29篇，研究成果相对匮乏，该阶段的研究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重大命题密不可分；(2) 2019—2021年，该阶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深化发展阶段，发文量分别为83篇、223篇和592

① 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4页。

篇,文献数量增长迅速,该阶段的研究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加强民族领域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的要求密切相关;(3)2022—2023年3月,该阶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持续热度化阶段,发文量分别为678篇和62篇,特别是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之后,学术界继续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总之,目前国内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保持稳定态势,仍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二) 核心作者分析

刘敏等人认为,作者发文的定量分析能够反映出某一研究主题的核心作者与科学研究共同体的形成状况。^①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发文量 $M=0.749(N_{\max})^{1/2}$, N_{\max} 代表发文数最多作者的发文量。通过CNKI计量分析可知, $N_{\max}=12$;经计算, $M\approx 2.6$,故选择发文量 ≥ 3 篇的作者作为统计对象。如表1所示,发文量最多的是高永久(12篇),其余依次为纳日碧力戈(11篇)、詹小美(10篇)、陈立鹏(9篇)、李静(8篇)、沈桂萍(7篇)、杨胜才(6篇)、武永江(5篇)、马伟华(4篇)。然而,这9位作者的发文量仅占总发文量的4.27%,这说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领域的作者合作较为分散,核心团队尚未形成。

表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作者统计表

作者姓名	发文篇数	所属单位
高永久	12	南开大学
纳日碧力戈	11	内蒙古师范大学
詹小美	10	中山大学
陈立鹏	9	中国人民大学
李静	8	西北师范大学
沈桂萍	7	浙江大学
杨胜才	6	中南民族大学
武永江	5	长安大学
马伟华	4	南开大学

(三) 研究机构分析

陈宝国等人认为,研究机构是科研共同体的主要载体,核心研究机构是该领域科研共同体的主要“孵化器”。^②根据普赖斯定律,研究机构发文量 $M=0.749(N_{\max})^{1/2}$, N_{\max} 代表发文数最多机构的发文量。通过CNKI计量分析可知, $N_{\max}=139$;经计算, $M\approx 8.8$,故选择发文量 ≥ 9 篇的机构作为统计对象。如图2所示,发文量最多的是中央民族大学(139篇),其余依次为西南民族大学(55篇)、新疆大学(53篇)、中南民族大学(45篇)、云南大学(41篇)、广西民族大学(40篇)、南开大学(39篇)、贵州民族大学(31篇)、中国人民大学(29篇)。然而,这9个机构的发文量仅占总发文量的28.01%,这说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领域的机构合作较为分散,科研共同体尚未形成。

① 刘敏、李兴保:《移动学习领域的可视化引文分析》,《电化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第44—49页。

② 陈宝国、殷海涛:《基于CSSCI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可视化分析》,《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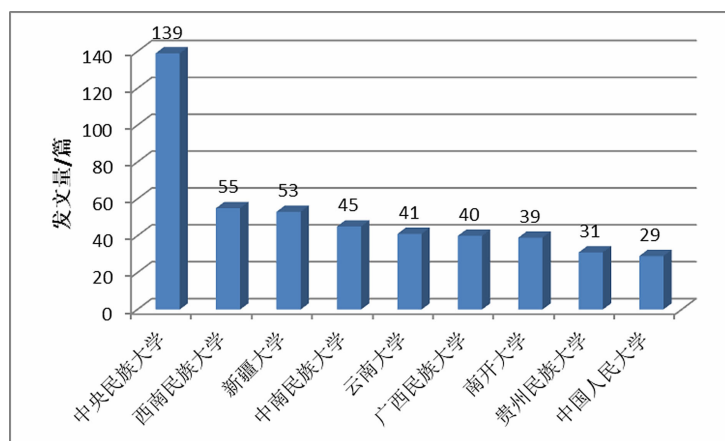


图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机构分布图

(四) 期刊来源分析

李俊余等人认为，期刊是作者学术成果的集成，对于推动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① 根据普赖斯定律，期刊发文量 $M = 0.749 (N_{\max})^{1/2}$ ， N_{\max} 代表刊载数最多期刊的刊载量。通过 CNKI 计量分析可知， $N_{\max} = 71$ ；经计算， $M \approx 6.3$ ，故选择刊载量 ≥ 7 篇的期刊作为统计对象。如表 2 所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以刊载 71 篇位居第一，《贵州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分别刊载 45 篇、44 篇、22 篇、15 篇、11 篇、9 篇。然而，这 7 个刊物的刊载量仅占总发文量的 12.88%，这说明国内顶尖刊物对该主题文献的刊载量较少，该主题的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表 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期刊统计表

期刊名称	刊载篇数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71
贵州民族研究	45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4
民族研究	22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5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1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

三、热点分析

在 VOSviewer 1.6.18 中分别选择分析单位和方法为关键词和全面计数，设置关键词最低出现频率为 10 次，在合并同义词和剔除无效字段后进行共现分析并绘制共现知识图谱。如图 3 所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出现 1132 次，是中心性最强的关键词。从分布形式上看，这些关键词呈现

^① 李俊余、刘会柏：《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第 22—29 页。

出关联性强和覆盖面广的显著特征,因而可以将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热点议题概括为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依据和基础、机遇和挑战、实践路径五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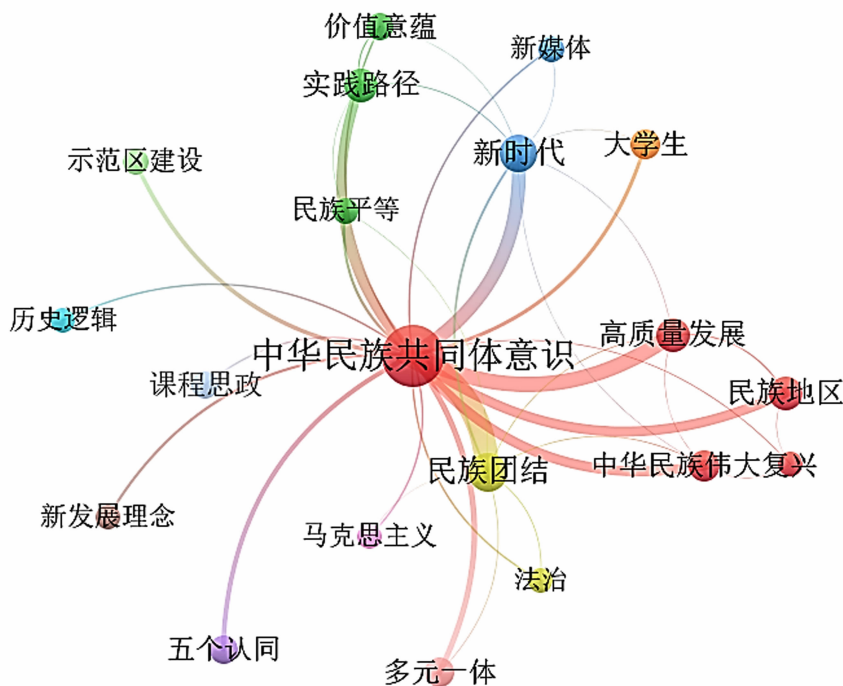


图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关键词共线图

(一) 科学内涵

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性工作。董慧等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社会意识,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产生并得以延续的精神存在,具体包含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三重内涵。^①李曼莉等人则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历史生成和实践交互的产物,是客观心理认知与主观行为取向相统一的社会意识,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集体认同。^②高承海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复杂心理过程,既是全体人民对民族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亦是全体人民对中华民族国家的精神归属与情感依附。^③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进行深入剖析。辛玉玲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铸牢各民族的大一统意识、命运与共意识、团结互助意识、共有精神家园意识以及同心共圆中国梦的意识。^④武永江等人从民族信任角度入手,把铸牢

① 董慧、王晓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现实挑战及铸牢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21—30页。

② 李曼莉、蔡旺:《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基本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19页。

③ 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2期,第24—30页。

④ 辛玉玲:《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内涵》,《中国新通信》2019年第16期,第237—238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为各民族信任关系的培养、信任情感的接续和信任文化的创建。^①此外，武永江还以民族情感心理为视角，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不断铸牢各民族的生命意识、思维意识和文化意识。^②已有研究表明，目前学术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尚未达成统一性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个不断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自身身份“本民族”和共有身份“中华民族”之间共同性和一致性的长期性过程，涵盖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五个维度。

（二）价值意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具有现实必要性，也具有长远的根本性意义。杨欢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义归纳为四点：一是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二是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整体意识与情感联系，使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取长补短，从而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三是有利于增强各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包容性与多样性，激发各民族文艺工作者的文化创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弘扬注入新活力；四是有利于增强各民族的主旋律意识，共同抵制境外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思想保障。^③

李昊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其次，有利于帮助各民族深刻理解“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后，有利于唤醒各民族荣辱与共的意识，促进各民族自由而全面发展。^④平维彬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能提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应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综合能力，又能为增强各民族大团结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⑤笔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两重价值：从国内范围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有利于健全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境界；从世界范围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理论的有力回应，也是对苏联民族理论、政策和制度的反思与超越，为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协调族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依据和基础

近年来，学术界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三个维度探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依据和基础。刘云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和基础归纳为五点：一是各民族共同开创了祖国的辽阔疆域；二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构筑了紧密的经济网络；三是各民族都以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与要素；四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均致力于抵御外来侵略和压迫；五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⑥项梅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的

① 武永江、邓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任内涵、价值及其策略》，《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31—37页。

② 武永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内涵、诉求及其策略》，《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60—67页。

③ 杨欢：《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南方论刊》2019年第8期，第18—20页。

④ 李昊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价值意蕴》，《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年第4期，第18—21页。

⑤ 平维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与价值》，《实践（思想理论版）》2020年第10期，第26—27页。

⑥ 刘云：《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理论观察》2020年第5期，第33—36页。

成果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依据和基础。^①

李静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依据和基础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政治基础；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经济基础；再次，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提高和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文化基础；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其践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自然需要法治来为其保驾护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立法体系的渐趋完备为新时代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四）机遇和挑战

党的十九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利条件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增多。马福运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大有利条件。^③邹丽娟等人从三个维度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利条件：从情感表达看，各民族都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倍感自豪，均有对党和国家的感恩意识；从文化发展看，各民族在长期文化创建过程中塑造了绚丽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民族关系看，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开创了和谐共存的新局面。^④邹雷等人以“互联网+”为视角，认为新媒体的产生、发展和运用为中华文化资源的整合、民族平等理念的贯彻和民族力量的凝聚带来了无限可能。^⑤“微时代”教育资源的高速共享、教学空间的加速重构和教学平台的不断交互为民族地区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我们还要准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唯有如此，方能化挑战为机遇，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高进以民族地区为例，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归纳为三点：一是民族地区的部分成员怀有民族本位意识，一定程度阻碍了民族团结创建工作的推进；二是部分民族地区的语言交往仍存在困难，一定程度阻碍了各民族的言语沟通和情感表达；三是不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一定程度阻碍了民族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⑥商爱玲等人把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三股势力”和境外反动势力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大障碍。^⑦包国祥等人认为，如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维护各民族文化特色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⑧新媒体时代网民身份的复杂性、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网络舆论的隐匿性为网络民粹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条件，不可避免地对人

① 项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攀枝花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14—18页。

② 李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与现实基础》，《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4—20页。

③ 马福运：《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若干思考》，《中州学刊》2019年第7期，第9—15页。

④ 邹丽娟、伍佳：《新时代云南跨境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略》，《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11期，第36—43页。

⑤ 邹雷、霍苗、李婷婷等：《“互联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应用研究》，《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101—105页。

⑥ 高进：《铸牢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疆社科论坛》2020年第4期，第11—14页。

⑦ 商爱玲、朱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底蕴和思想方略》，《重庆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第27—34页。

⑧ 包国祥、白佳琦：《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26—31页。

们的身份认同和行为倾向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五）实践路径

实践路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价值依归与逻辑结果。孔亭着重从制度层面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维路径：首先，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贯穿于民族事务治理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其次，要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化为维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和提高各民族政治参与水平的实际效能；再次，要建立健全民族工作法治体系，培养和提高各民族依法处理民族事务的法治思维与能力，依法打击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最后，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破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困境和难题，补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板，不断增进各民族民生福祉。^①

周平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增强国民意识统一起来，更应在国家政策帮扶下充分整合中华文化的资源与力量。^② 陈立鹏以心理学为视角，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归纳为四点：一是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唤醒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正确看待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需求差异；二是要在主流价值观指引下矫正民族认知偏差，拉近各民族的心理距离；三是要重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推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四是要在尊重各民族语言的前提下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率，打破各民族间的沟通壁垒，着力构建各民族互嵌式交往的社会结构。^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有形、有感和有效上出实招：就有形而言，要以能看见和可触碰的方式推进民族团结创建工作，发掘和塑造各民族的文化符号和精神气质；就有感而言，要以有力度和有温度的方式唤起各民族情感共鸣，切实增强各民族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就有效而言，要时刻防范和化解民族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逐步实现民族工作制度之“制”向民族事务治理之“治”转化。

四、未来展望

近年来，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并趋于体系化，为新时代我国协调民族关系和处理民族事务提供了大量指导性意见。然而，目前相关成果在基础理论研究、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方法融合和实践经验提炼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唯有在总结经验基础上补齐研究短板，方能推动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随着核心作者群和学术共同体的加快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研究日益成熟，但原理发掘和概念界定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一方面，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文本分析和政策解读基础之上，相关理论依据的探讨较为薄弱，研究的学理性有待增强。因此，未来要注重从原理层面进行深度剖析，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历史合力理论、“大一统”理论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等有机融入理论研究、思辨分析和规律阐释的各个环节，以不断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历史性、逻辑性和规律性，从而为构建系统完整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另一方面，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概念，这导致近年来学术界对

^① 孔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化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29—37页。

^② 周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进路》，《学术界》2020年第8期，第5—16页。

^③ 陈立鹏、薛璐璐：《民族心理距离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34—40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界定难以形成统一认识，也由此造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积累和研究深度不匹配，研究体系缺乏共同概念支撑。因此，未来要将抽象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有机结合起来，廓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外延、特征和基本结构，不断弥合概念界定分歧。就概念操作化而言，应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划分为知、情、意、信、行五个维度，将其细化为若干指标并设定相应问题，设计出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问卷和量表，为实证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工具辅助。

（二）重视学科交叉与方法融合

就学科视角而言，学科发文量是作者发文量的间接表现形式。因此，结合普赖斯定律，学科发文量 $M = 0.749 (N_{\max})^{1/2}$ ，其中 N_{\max} 表示发文量最多的学科。通过 CNKI 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可知， $N_{\max} = 1341$ ；经计算， $M \approx 27.42$ ，故选择发文量 ≥ 28 的学科作为统计对象并绘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学科分布图。如图 4 所示，近年来学术界主要从行政学及国家管理、高等教育、文化、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国语言文字、民族学、思想政治教育、新闻与传媒、体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等学科入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学科交叉与融合正蒸蒸日上。值得注意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项系统、长远的战略性工程，仅凭单学科之力难以取得重大创新与突破。因此，未来要打破学科壁垒，加强跨学科研究，着力塑造 $1+1>2$ 的学科动能新优势，争取产出更多创新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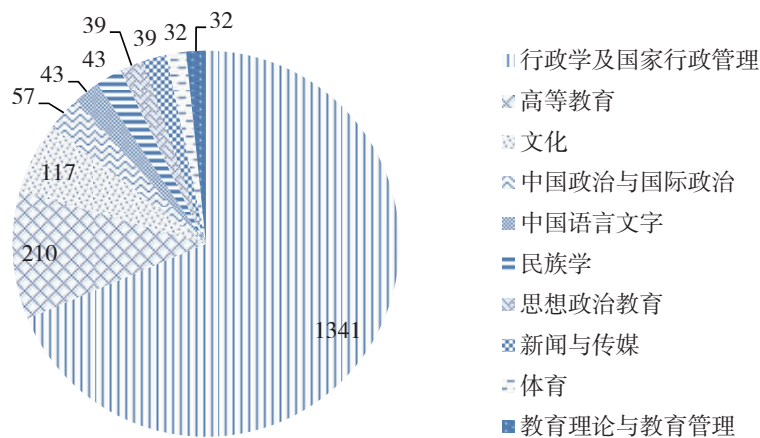


图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学科分布图

就研究方法而言，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定性研究法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严谨使用定量研究和思辨研究方法的文献较少。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部分学者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分析与路径探讨趋于主观化，一定程度阻碍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深入推进。未来，要加强研究方法的融合与迁移，特别是要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方法，不断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范式的转换，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同时，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状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要特别注重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结合，全面把握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从而为学术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借鉴。

（三）深化实践经验提炼

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我国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意见。然而，目前相关研究在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实践路径具体化、如何把中国特色民族工作制度优势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际效能以及如何推进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实践经验有待进一步提炼。

首先，目前学术界大多从“五位一体”层面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相关对策建议过于宏观且缺乏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未来，要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分析和把握不同民族地区存在的特殊问题及成因，并提出符合其民族工作发展的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从而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由宏观性向具体化转变。其次，目前基于制度之维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颇丰，但就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实际效能的研究较为缺乏。未来，要强化制度优势研究，特别是要将中国特色民族工作制度的显著优势贯穿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逐步构建起国家、民族和民族成员共同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联动机制，广泛调动各民族参与民族事务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中国特色民族工作制度优势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际效能的有机转化。最后，目前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衔接性不强，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机制尚未成熟。未来，大中小学要在各级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坚持主导性与主体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灌输性与启发性、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制定符合各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目标，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好地进头脑、润心灵、化践行，从而不断健全、完善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一体化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之间必将达成良性互动，必将唤醒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责任编辑：杨松禄

历史与文化

缘水而起：一个彝族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互动关系研究

钟瑞华¹，许姝钰²

(1.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2.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水也是研究基层村社政治秩序变迁的一项重要维度。文章以子君村这一彝族村社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治水视角切入，通过分析子君人治水格局的变化，探讨并呈现其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从初创直至最终衰落转型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性变迁。在农业社会中，水是构成村社政治秩序的关键性要素，亦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基于原有治水秩序所衍生的村社秩序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关键词：彝族村社；村社政治秩序；治水秩序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3) 04-0064-08

基于生产生活用水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一种基层社会水利自治的横向治理，直接构成了村社生活中治水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核心和关键所在。治水秩序与村社政治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对于少数民族村社而言亦是如此。从“水”着手，以治水格局的变迁，探讨民族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发展和演变，挖掘二者的内在逻辑和联动，能够为民族政治学和田野调查研究提供一种趣味性的视角。故本文选取子君村这一彝族村社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在政治学的视野之下，从“治水”这一视角切入，以子君人不同历史时期的治水实践呈现其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发展与变化，以此探讨并回答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背后的深层逻辑。

一、问题的缘起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传统大国，实现对水的有效治理，不仅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行使的一大职能，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以国家为主导的治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主要集中在对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上；以基层社会为

基金项目：中央社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新时代云南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政治取向与社会心态研究”（ZK20200111）；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返贫防范协同推进研究”（YB2019018）。

作者简介：钟瑞华，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学、统战理论等；许姝钰，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

主导的治水，是一种为克服传统家户制的固有弊端而自发形成的、精细化程度较高的横向治理，主要集中在小沟、小渠的治理上。在村社生活中，围绕生产生活用水这一公共事件，多个当事人自愿联合、协商，开展了服务于集体生产生活的有组织性的治水活动，相继形成了“过水不带水”“下肥不过水”“缺水带水”“沟田置换”“田土互换”等过水规则，确立了“先远后近”“先高后低”等分水习惯^①，其中又交织着复杂的生产关系、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治水秩序直接构成了社会自治的核心秩序，是实现村社政治有效运转的关键纽带。

“水创世，水生人母”^②的创世纪传说在众多民族起源的神话故事中均有所体现，神秘的水崇拜习俗在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中也有迹可循。各民族的祖先在不断开疆扩土、向外迁徙的过程中，往往是逐水而徙、靠水而居，充足的水资源不仅是他们从事农耕、畜牧等生产活动的重要条件，亦是推动其民族不断发展与壮大的有利因素。在少数民族村社中，各式各样的治水活动是各族群众智慧的有效凝结，他们在抵水而居、修井挖渠、刻木分水、车水灌溉等治水过程中开展的不同的治水实践所确立的治水秩序和约定俗成的治水惯例，直接构成了其村社政治秩序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在少数民族村社中，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水着手，以治水方式的变迁，探讨并呈现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互动关系，也正是本文问题意识的缘起和所在。

二、案例引介：子君人村社的基本概况

子君人，自称“撒摩都”（“梦莫徒”），他称为“子君”“自杞”“子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彝族的一个支系被识别出来。子君人的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的“徒莫祗蛮”，他们最初居住于“傍、望、览、丘、求五州”^③——大致位于今天云南的楚雄和玉溪境内，是一支人口众多、分布较广的部族。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的过程中，到清朝时只剩居住在滇池东岸的子君人还保存着自身的民族特质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子君人主要集中居住在昆明市官渡区矣六街道下辖的子君社区中。

子君人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以前叫作“弥诏卡”。“弥诏”在子君语中有“头人”和“族长”的含义，所以“弥诏卡”又有“凤凰村”的意思。因为村落轮廓形似大耳，子君人所居住的地方又曾被称为“大耳村”。大耳村附近有雾南山、老青山、凤凰山三座山，村落中有专门供子君人生产生活使用的六个水塘，村子外围环绕着流入滇池的水沟，水沟上又建有七座形状各异的圆拱桥，构成了“三山六塘桥七座”的地理环境；子君人曾经有专门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叫作凤凰阁，村子中还有十三个姓氏共同组成的十三个祠堂，凤凰阁和十三祠以及同有民族传统和文化特质而联系在一起的跑马坡、接佛坡、炮楼坡、延光坡等地名一道构成了“一阁四坡祠十三”的社会秩序。子君人因水而兴，“水”贯穿着子君人政治现代化的始终，是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

首先，在子君人发展的初期，“水”是推动其群体不断壮大的重要力量。大理国在封赏打天下的功臣时，将“徒莫祗蛮”中的一支“梦莫徒”部分封到了河阳郡^④，也就是今天的澄江，使部落首领成为世袭的封建领主。经学者考证，“徒莫祗”与“梦莫徒”为同音异字，二者确为一

① 徐勇、郝亚光：《中国的社会治水与国家治水》，《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8月13日，第7版。

② 黄龙光：《少数民族水文化概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47—156页。

③ 《新唐书·南蛮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15页。

④ 《彝族简史》编写组、《彝族简史》修订编写组：《彝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体^①。步莫徒因水而兴。澄江抚仙湖畔，物产资源十分丰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充足的用水，为步莫徒部势力日益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步莫徒持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逐渐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阳宗、江川、玉溪和弥勒等地，并在其领地内实行进一步的分封，发展成为空前的“强宗四部”（强宗部、休制部、步雄部、罗伽部）和“弥勒部”，最终在南宋的广西路和大理国之间建立了本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自杞国”^②。

其次，在子君人村社政治秩序的变迁中，“水”始终是实现这一秩序变迁的核心要素。自杞国灭亡之后，在大一统王朝的治理下，大量移民持续入滇，加之重重地方行政区划的限制，步莫徒内部不断出现分化。时至今日，只剩下昆明子君人还保留着“撒摩都”，即步莫徒的自称。仅从昆明子君人的实践来看，他们背靠滇池，环绕滇池这一固有的水系场域，建立了自身的生产生活公共空间，围绕用水、运水、分水、治水等特定事件，在治水秩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村社政治秩序。

三、围塘治水：子君人治水秩序与村社政治秩序的初步建立

世居于滇池东岸的子君人，认为自己为“黑彝”，长期以来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除粮食外，他们还种植茭瓜、黄豆、苕麻、荸荠等经济作物。对于勤劳耕作的子君人而言，遇早求雨、遇涝保收构成了他们生产实践的重要内容，“水”在子君人的传说故事和民谣中均有所体现，其中既有“阿咋哩”智取龙王为各地百姓消灾造福从此风调雨顺的故事，又有放牛娃“莽山”为村民寻水感动滇池金角龙王的故事，还有专门祈祷求雨的歌曲《布啦里》……和绝大部分农村一样，子君人村社政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与其自身对水的治理是密不可分的。在治水的过程中，子君人所建立的治水秩序，逐渐成为其村社政治秩序的关键内涵。

元代以前，子君人主要依靠马料河的河水来进行灌溉。马料河发源于昆明官渡白水塘附近的黄龙潭，河水自东北流向西南，最后汇入滇池。马料河曾经是沿线村庄生产灌溉用水的重要来源，沿河水草丰茂，然而，随着上游集雨区植被的破坏，马料河河水持续减少，并最终沦为一条季节性河流，只有雨季时才有河水，对沿线村落的生产灌溉形成了极大挑战。但是农业生产活动并不会因此停滞，河流沿线村庄的用水纷争随之不断加剧，村落之间经常为了放田水而发生激烈的斗殴。河水日益减少，对河流沿线的村落来说，如何与其他村落争夺水资源、如何就有限的水资源进行分配显得至关重要。

子君人中的长老认为水是天赐之物，与其他村庄争斗、抢水，不仅抢不到水，反而会伤了和气，为此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重开水源。于是，子君人在村子外围找了一块地势较为低洼的田地，并围绕这一田地在周围筑起一米多高的土埂，形成一个人工修筑的小池塘，雨季时积漏沟水于池塘中，用于来年的栽秧灌溉用水。最初，子君人的“围塘治水”确实缓解了燃眉之急，不仅解决了第二年的用水问题，甚至还能用池水养鱼，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增产创收。

但是这样一种治水模式，与其说是“围塘治水”，倒不如说是“靠天等水”，受自然因素和气候因素支配的不确定性较强，积水时多时少，积水的不稳定性加剧了用水的不确定性，农业生产

^① 街顺宝：《徙莫祇考》，《思想战线》1991年第2期，第66—71页。

^② 得益于分裂割据的大环境和大理国统治的日益衰落，步莫徒的势力得以持续壮大，陆续兼并了邻近的各部，并最终在南宋广西路和大理国之间，以弥勒、师宗一带为核心建立了本民族的割据政权“自杞国”。据学者考证，自杞国国力强盛之际，其势力范围“东起今贵州省兴义市，西至今云南省路南、宜良二县，北起今云南省曲靖市，南迄今弥勒、邱北二县”。

所得也势必会大打折扣。与此同时，烧香敬神、祭祀龙王等求雨活动也日渐频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求雨祈雨的活动，是一场关乎子君人生计与发展的重要活动，故需要调动整个村社的力量来参与。在求雨活动中，如何确定祭祀日程、祭祀人员，安排仪式过程，获取祭祀所需的财物，以及怎样组织与协调都十分关键。总的说来，子君人求雨祈雨的祭祀活动，源于用水的矛盾，出于用水的需要，在子君人自发“争水”“寻水”“求雨”的治水过程中，他们的村社政治秩序伴随着治水活动的组织与协调应运而生。

四、因水而治：子君人治水秩序与村社政治秩序的基本形成

“靠天等水”始终不是长久之计，子君人村外的池塘没过多久就成了“干塘子”，村社政治秩序也因此面临极大的挑战，如何开源再次成为子君人面临的一大难题。在治水的过程中，子君人的治水秩序与村社政治秩序也基本成形，这一时期二者的互动关系表现为村社政治秩序在治水秩序的基础之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一）以“十三会”为基础的水利自治秩序

子君人的建筑群落“十三巷”^①，沿子君人的十三个宗祠“十三祠”^②而分布，每条巷子设有自己的议事场所，称为“十三会”。“十三会”是子君人基层水利自治秩序的核心所在。在每个会中，无论居住的人有多少，他们都会选举出自己的巷主，也就是“水头”；而在十三个“水头”之上又有全村人共同选举出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为“管水老爹”，十三个“水头”共同协助“管水老爹”对引水、灌溉、沟渠建设事宜进行管理。在“管水老爹”的带领下，子君人外出寻水，重新找到了水源，最终决定将宝象河^③的河水作为他们新的灌溉水源，实现了由“靠天等水”向“主动找水”的自主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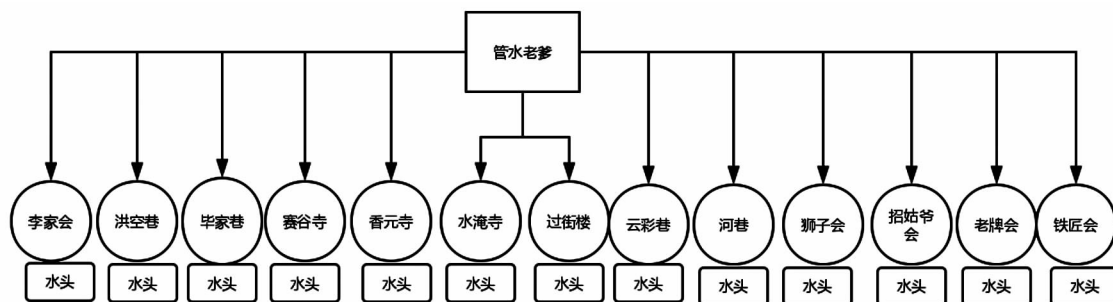


图1 子君人以“十三会”为基础的水利自治秩序

水源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引水、如何分水又被纳入“十三会”的议事日程中。在“管水老爹”的牵头和“十三会”的共同推动下，“水头”们动员和组织其会内各家各户参与水渠建设，将宝象河的水沿水渠引入到村子外围的池塘中。为了保险起见，子君人在引水渠的上游又筑起了

① “十三会”指李家会、洪空巷、毕家巷、赛谷寺、香元寺、水淹寺、过街楼、云彩巷、河巷、狮子会、招姑爷会、老牌会、铁匠会。

② 十三个祠堂意味着十三个宗族，十三个宗族有各自的家族谱系和公共财产。子君人中的李、郭、毕、非、那、洪、康、莫、杨、张、陆、柯、邹，这十三个姓氏的宗族祠堂共同组成了“十三祠”，每一个宗祠都会定期举行各自的祭祀活动，作为维系家族情感和宗族认同的关键纽带。“十三祠”作为乡村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在子君人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③ 宝象河发源于官渡老爷山，自东北向西南流动，最终汇入滇池，水流量较为稳定，时至今日仍然是昆明的主要河流之一。

两道水坝，立夏筑坝，塘满拆坝，积雨水、拦河水，从而实现对水源的最大程度利用。外在的水源来源解决之后，在子君人内部仍然存在着“治水”和“分水”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十三会”之间的放水顺序、水渠的修缮建设等事宜，都需要十三个“水头”互相博弈，争取各会之间的最优“过水”顺序^①，组织水渠的修缮和维护工作。由此，子君人基本上形成了一套以“十三会”为基础的水利自治秩序。

（二）由水利自治秩序所衍生的村社政治秩序

“十三会”源于用水的需要产生，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功能被赋予了更多新的内涵。首先，“十三会”具有维护和谐稳定乡村秩序的功能。除去协调各家各户的“过水”先后次序之外，“十三会”还会协调各家各户的社会关系，调解各户之间的矛盾。“十三会”拥有各自的“会产”，包括田地、池塘、房屋等公共设施，除去各会成立之初划定的内容外，因故死亡的家庭的土地和房屋、因故被没收的成员财产持续不断地充实着“会产”，成为保障子君人基层村社政治秩序正常运转的有效经济来源，是子君人从事祭祀活动、举办民族节日和宗教活动的经济保障。在必要时，“十三会”各会也会对需要帮助的家庭实施救助，对维护子君人和谐稳定的乡村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十三会”还具有维护民族传统和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功能。在“十三巷”中，有的巷子中画有壁画，有插秧收割的场景，有天公、地母披蓑戴笠的图画……这些与子君人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图像凝结为独特的文化符号，成为其维护传统和增强凝聚力的重要载体。子君人有自己的民族节日，比如说正月十六要举行极具特色的佛教节日“跑佛节”，五月初六要举办祈祷耕牛健壮的“牛王会”，六月二十四、二十五不仅要举行“火把节”，还要举办“跑马节”^②。民族节庆活动的举办同样离不开“十三会”的组织，以“跑佛节”为例，“跑佛节”于正月十三到十六举行，活动由“管水老爹”主持，“十三会”的各“水头”负责协助并筹备各会的具体事宜，“接佛”^③“供佛”^④“跑佛”^⑤“归佛”^⑥ 这四项议程都是建立在“十三会”的密切配合基础上。“十三会”通过公共活动的有效组织，有效构筑群体自我认同，对维护民族传统和凝聚群体力量、保障村社秩序的有序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① 子君人用水也有严格规定，塘内根据田块分布、水位高低，修建涵闸三个，从塘底往上依次称低涵洞、二涵洞、三涵洞。小满三天开始放水，首先开启三涵洞，待塘水低于三涵洞时，再放二涵洞，直至全村栽插完毕，开始控制放水，放水量减少，立冬三日关水。

② 跑马节与火把节同一天举办，为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是子君人举办赛马的节日。沈从文所著的《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对这一节日的盛况做了十分生动的描述。过去，子君人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先到马王庙祭拜，采一束青松插到马笼头上，然后才开始赛马。民国二十四年所举办的跑马节，是近代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跑马节，省主席龙云到访，共有超过30万人前来参加。

③ “接佛”又称“偷佛”，是“跑佛节”的第一项议程，从正月十三开始，由各会“水头”组织从宗教场所“护国寺”的墙头偷偷将佛像接走。

④ 护国寺院墙外的接佛人员接到“偷来”的佛像之后，要尽快抱着佛像回到自己巷内并供到供桌之上，每一会只能抱一尊佛像，供奉一夜之后，第二天早上就由其他还没供奉过佛像的会的接佛人员接走，在自己巷内供奉一天一夜之后再传下去，如此轮流，确保在正月十五日正式“跑佛”之前十三会的每一会都能供上佛爷，此一阶段就是“供佛”。

⑤ “跑佛”是最隆重的一项议程，需要从“十三会”中挑选出当年结婚的八位年轻男子，前往供奉佛像的会中接佛，待“管水老爹”指挥铜锣鞭炮奏鸣，经过每一个会之后将佛像送回护国寺，其间，在路过各巷时每一个会的“水头”都要组织群众阻碍“跑佛”的人的行动。

⑥ “跑佛”结束以后，由“管水老爹”宣布停止，又从护国寺的围墙将佛像护送回寺内。待第二天清晨，“管水老爹”还要组织为佛像“招魂”，一路走完十三巷。“招魂”结束之后，子君人会在护国寺内进行祭祀活动。

概而言之，在找水、治水和分水的过程中，子君人逐渐确立了以“十三会”为基础的水利自治秩序。为满足村社日常管理需要，“十三会”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子君人也顺利实现了因水而治。子君人村社政治秩序在水利自治秩序的基础之上产生，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巩固，成为子君人日常生活中行之有效的的重要制度框架。

五、秩序重构：子君人治水秩序与村社政治秩序的重塑

以“十三会”为基础的水利自治秩序，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村社政治秩序，成为子君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秩序的核心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子君人在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与发展中，在国家基层政权的建设中，其治水秩序和村社政治秩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新的变化，二者呈现出新型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由村社政治秩序的重构所衍生的治水秩序的变革。

（一）村社政治秩序的重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基层制度的重构、组织结构的变化、权力和权威来源的变迁，子君人村社政治秩序在新的历史时期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是基层制度的重构。昆明解放以后，在国家力量的持续介入过程中，子君人所确立的传统制度结构和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子君人所聚居生活的村落被纳入昆明县第二区护国乡^①，率先被列入昆明市第一批土地改革的名单中，于1950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土地的再分配。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子君人被纳入国家最为基层的制度框架中，完成了国家在最基层的制度建设。

二是组织结构的变化。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子君人先是被并入昆明市第二国营农场（成立于1958年12月），后来又划归为矣六人民公社（成立于1962年9月）。通过农业集体化的整合，子君人一共被划分为四个生产小队，共同组成了一个生产大队，他们共同劳作、共同生活，还陆续在村中建立了砖瓦厂、农机修造厂、饮食店、米线加工厂，以及碾米、面条加工等村社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以集体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秩序构成了这一时期子君人村社秩序的核心，打破了以往以家庭单位为生产的基本方式，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子君人村社政治秩序的基础。

三是权力和权威来源的变迁。在第一次民族识别中，子君人作为彝族的一个支系被识别出来，获取了相应的民族身份，并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给予的优待政策。在子君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不断强化的同时，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持续介入，其村社内部权力和权威的来源亦实现了显著变化，实现了从魅力型权威到法理型权威的转向，具体表现为由以往的“十三会”之上的组织权威、“水老头”之上的长老权威，彻底转向为依赖国家制度与机制所产生的法理性权威。

（二）传统治水秩序的变革

在国家力量的持续介入过程中，村社政治秩序的变化也相应引起了治水秩序的变化，而基于国家力量主导的治水秩序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灌溉水源，又成为实现子君人基层村社正常运转的有效保障。

一是治水主体与治水格局的变化。在国家力量的高效组织和整合下，生产大队作为子君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理应承载着子君人对于其集体生活至关重要的治水职能，围绕水资源的使用

^① 护国乡次年便更名为子君彝族乡，受特定时间条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其行政区划和名称有过多次调整，如有需要将特别说明。

和分配等治水事务形成有效管理。相应地,在以子君大队为核心所展开的治水实践中,由于子君人传统习惯形成的治水活动,逐渐被制度化和程序化的规范性治水活动所取代。故而,子君人的治水主体从以往的“十三会”“水头”变为国家力量所主导,治水格局亦实现了从多头到单一的转变。

二是治水方式的日趋多样化。在本地政府的推动下,子君人陆续开展了河道整治、沟渠建设和排灌系统建设的长期持续性工程,引滇池水入农田,确保了子君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灌溉用水需要。随着宝象河与滇池的水体污染日趋严重,在基层政府的推动下,子君人村社内修建了机井和蓄水净化塔,铺设了自来水管,用水安全与卫生得到了有效保障。在子君人的日常治水实践中,国家力量成为确保子君人治水秩序的关键所在,反过来又为子君人村社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转提供持续不断的合法性源泉。

六、发展转型:子君人治水秩序的衰落与村社政治秩序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以后,昆明市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城市化带来的“多样性”与民族村社持续发生互动的同时,子君人传统的治水秩序和基层村社政治秩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一) 传统治水秩序与村社政治秩序的解构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子君人无论是在生产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些变化无形之中也在加速着其传统秩序的解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水利设施的现代化。在基础设施的持续配套过程中,包括生活用水、人畜饮水、污水处理等水利设施建设也得到了持续完善。水利设施的现代化,使得子君人不再像以往一样依赖于专门的治水组织,而这极大方便子君人日常生活需要的同时,无形之中也在形成一股张力,不断加速着其传统秩序的解构。

二是行政建制的城市化。在昆明市不断向外扩展和延伸的过程中,子君人一直以来居住的地方由郊区变成了“城中村”,子君村也随之转变为子君社区,设立了4个居民小组,基层组织体系亦逐步完备,完成了自身行政建制的城市化。子君社区的转变,不仅是子君人城市化的重要体现,同样也是其传统村社秩序解体的重要标志。

三是传统生活空间的不断萎缩。子君人传统的居住空间,陆续被新修建的马路、商品房小区、商业设施所取代,主要是新建的彩云北路、广福路、新亚洲体育城、新螺蛳湾国际商贸城、子君村经济适用房等。子君人传统的“三山六塘桥七座”的居住环境也再难寻踪迹。无可置疑,在子君人传统生活空间不断萎缩之际,其传统的村社秩序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

四是社会角色的多元化。20世纪末,子君人逐步开创花卉种植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花,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昆明最大的鲜切花市场。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与城市化的持续互动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子君人前往城市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其生计方式也日渐多元,有的人当起了“包租婆”,靠房屋租赁为生;有的人做起了司机,靠运营车辆补贴家用;有的人到附近的公司和企业中就业……随着收入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子君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生产方式和社会角色的日渐多元,对其传统秩序的解构无疑是必然的。

(二) 村社政治秩序的再建与转型

子君人村社政治秩序的重构,主要是在两种力量推动下进行的。首先是在与城市互动的过程中,在子君人精英人士的推动下展开,子君人的传统秩序得到重视和恢复。例如,子君人曾经聘请了本民族的教师对小学生开展每周两个课时的彝族日常用语教学,但因学生厌学,成效不彰,

最终不了了之；对象征其群体凝聚力的建筑“护国寺”^①进行了多次的修缮，在护国寺的内部和新建的民族文化广场中设置了如彝族文字、民族绘画等多种类型的民族符号；邀请省内的专家和学者为其编撰民族志和乡村志；前往其他民族村社考察学习民族文化抢救和保护的经验……为了恢复传统和村社政治秩序，子君人做了种种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和尝试更像是一种具有乡土味的情怀和寄托。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性的逐渐增强，与其他社群互动的日渐频繁，社会角色的逐步多元化，子君人很难再像从前一样围绕“治水”这一生产生活的核心事件而产生凝结整个群体的村社秩序。

所以，子君人基层村社政治秩序的再建和重塑，最终还是要依赖国家力量来进行。在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子君人居住的村社完成了社区的建制，基层党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亦随之不断发展和完善，社区共设立了4个居民小组，基层组织体系也逐步完备。子君人现在居住的社区，已被列入云南省“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创建的规划中，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创建工作。在创建活动中围绕民族工作、环境整治、土地违建、流动人口管控等问题治理，国家力量势必会予以社区更多支持，投入相应的政策资源和经济资源，子君人村社政治秩序在得到再建和重塑的同时，也将会迎来质的飞跃和发展。

结论与反思

村社政治秩序的变迁可从包括制度、文化、社会在内等多重维度来进行考量，但是这些维度较之于“水”而言，都没有从“水”这一视角来得生动和透彻，也都没有像“水”一样自始至终一以贯之。治水秩序与基层村社政治秩序二者密切相关、彼此互动。从子君人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水”始终相伴而行，是推进其自身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构成其村社政治秩序的关键因素。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必须要确立一定的治水秩序，实现有效的水利自治，以适应农业生产灌溉用水的需要，基层村社政治秩序由此进一步衍生；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大型水利设施，对于水利自治的需要显得不那么迫切，基于治水需要所产生的基层村社政治秩序也将随之衰落，亟待转型，国家力量的介入也将成为必然，并在推动构建新的社区秩序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护国寺相传建于汉代，最初名叫“凤凰阁”，为毕摩祭祀的场所；到了宋代，凤凰阁原址上重建了“竺国寺”，留上殿为毕摩西波专用，主奉道教三清，其余几个殿为佛教场所；明代洪武七年更名为“护国寺”。

逻辑、困境和路径： 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的多维思考

郭 路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99)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折射出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革故鼎新的发展逻辑、文化认同的功能逻辑、海纳百川的共生逻辑、美美与共的政治逻辑。当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面临着价值多元与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待完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国际舆论格局仍是西强我弱的多重现实困境。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以中华文化为根，做好“两个结合”；注重文化“道”与“术”，强健人民精神世界；概括提炼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个结合”；逻辑；困境；路径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3)04-0072-07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①。他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一、基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五重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精准提炼和系统总结，这五个特性折射出中华文明的五个逻辑。

(一) 连续性：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

作者简介：郭路，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刊图书资料部编辑，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与中华文化。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8月3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2023年11月3日。

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证实，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而未断绝的文明，“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至今仍充满蓬勃生机与旺盛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三大轴心文明之一的中国先秦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涌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书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章。随后的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隋唐文明，直至明清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文化始终处于世界文化方阵的前列；革命文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革命精神，是伟大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其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钢筋铁骨，所形成的信仰力量成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创新的历史辉煌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源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进行时的、创造性的文化。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滋养中发展，并吸收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文化精华，具有科学性、历史性和开放包容性。连续的、稳定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又不断丰富发展，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

（二）创新性：革故鼎新的发展逻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文化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推动了古代中国的发展、带动了整个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也对当今世界产生深刻影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周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中华文明内含创新发展的基因，正是一代代创新发展赋予中华文明新的生命力，也将勇于创新的精神印刻在国人的血脉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②。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精神土壤，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突出优势。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最根本的就是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义，加持新媒体传播渠道和现代化，激活其生命力。

（三）统一性：文化认同的功能逻辑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水乳交融的统一文化空间，各民族文化相互嵌入、融为一体，其重要基础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8月3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2023年11月3日。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8月31日，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2023年11月3日。

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①。在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曾历经磨难而不倒,靠的是中华文明具有的高度文化认同,靠的是中华文明具有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②,守护好、继承好、使用好中华文化这一宝贵文化资源,既是我们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凝聚人心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化优势。

(四) 包容性:海纳百川的共生逻辑

中华文明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明,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③,中华文明何以源远流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有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力。中华文明既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形成包容的多元统一体。中国文化秉持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理念,接受和吸收多民族文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不仅基于本国多元文化的互相影响,也源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交流、交往、交融。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不以其先进之处而傲慢地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不因其不足之处而自卑怯懦甘居他国文明之下,而是表现出海纳百川的共生逻辑,吸纳人类文明中的先进因素,也将自身独特的文明火种传播到其他国家。这种文明共生的逻辑在当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世界意义。

(五) 和平性:美美与共的政治逻辑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中华文化倡导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各国文明相互学习、相互尊重,都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追求“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境界。“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④。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⑥。基于宏阔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我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还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国于2021年、2022年、2023年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有力彰显了中华文明鲜明的自主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精神底色,反映了新时代中国鲜明的全球治理观和美美与共的政治逻辑。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格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8月31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 2023年11月3日。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8月31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 2023年11月3日。

③ 《礼记·中庸》,王国轩译注,上海:中华书局,2016年,第139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⑤ [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第2版。

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也呈现出东升西降、此消彼长的态势。这不仅是国家硬实力竞争的结果，更是软实力交锋的体现。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我国的文化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偏弱，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面临多重现实困境。

（一）价值多元与意识形态斗争加剧

当前我国社会多元化发展使人们思想多元化、复杂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价值多元与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与此同时，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①。特别是随着网络的深度普及，我国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较2022年12月提升0.8个百分点。^②网民规模庞大且增速飞快，网络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且网络中各种意识形态的交锋愈加频繁和隐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为遏制我国发展，明确将“互联网自由”“新媒体”纳入和平演变策略，在我国物色骨干和代理人，栽培个别所谓“公知”“大V”，并积极收买网络水军，夸大或炒作民生、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扭曲历史、诋毁英烈、否定文化，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面对诸多严峻挑战，亟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待完善

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应和解决社会实践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智慧结晶，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能映射和指引社会发展实践。我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40多年的改革实践创造了西方工业化国家200多年才有的经济奇迹，形成了很多独特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和方法。但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改革发展实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化、学理化、实践化方面效果不够明显，存在零碎松散、概括不全、转化低效的尴尬局面。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炼和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③，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⑤。

（三）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发展不匹配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软实力”里的“文化”应是广义的，既指文化资源意义上的“文化”，同时还包含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古往今来，任何一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3年8月28日，<https://www.cnnic.net.cn/6/index.html>，2023年11月19日。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9日，第2版。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05月19日，第2版。

⑤ 习近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2版。

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①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据全球品牌估值咨询公司 Brand Finance，就 11 个软实力指数排名的影响因素进行的排名^②，中国软实力综合排名第 4，上升 8 个名次，但从得分上看，中国的分值是 64.2，与第一名美国 70.7 的分值还存在不小差距^③。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截至 2022 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虽然我国软实力得到很大提升，但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论在体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还不匹配，“软实力”支撑“硬实力”方面相对不足。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更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文化力量。

（四）国际舆论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

当前，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较量和国际舆论斗争更趋激烈。西方政党不断攻讦我国的民主和民族等问题，西方媒体也持续对我国进行抹黑、扭曲、污蔑。因历史原因，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建设滞后于中国发展的速度，整体国际话语权偏弱，在国际舆论中处于被动地位，很多国外民众对中国的了解仅是通过本国的媒体和社交平台信息，很多人被不实信息误导产生负面刻板印象，有的甚至盲目厌恶、抵触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事物，使得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愈发严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④。2023 年 7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实施，这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次被写入国家法律，也意味着我国开启了“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⑤的新征程，对于扭转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格局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将我国的发展优势和文化优势转化为话语权和话语力，形成与国家体量相符的国家音量。

三、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的实践路径

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们要以实践为指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守护好、继承好、使用好中华文化资源，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这既是我们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不断探索文化强国之路的价值意蕴。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以中华文化为根，做好“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建设文化强国，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以中华文化为根，确定本和根，就有了“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08 页。

② 软实力指数排名的 11 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熟悉度、影响、声誉、商业与贸易、治理、国际关系、文化与遗产、媒体与传播、教育与科学、人与价值观以及 Covid-19 响应。

③ 数据来源：Brand Finance：《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2》，London，2023。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222 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2023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gov.cn/govweb/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8929.htm，2023 年 10 月 29 日。

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实践中的问题；“第二个结合”植根中国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实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将两种思想和文化体系进行简单组合、生硬拼接，更不是此消彼长、谁取代谁，而是双向汲取、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既让马克思主义根深叶茂、历久弥新，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机，在世界文化激荡的时代大潮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讲好中国故事。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形成本国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占据这个时代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二）注重文化“道”与“术”，强健人民精神世界，呼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底蕴深厚，可以从“道”与“术”的维度思考和认识中华文化。“道”究其本质而言是“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是事物宏观的、根本的规律，它是精练的高维度的思想结晶；“术”从其本意而言是技艺，“方术”“术数”“技术”等充分体现了文化外化形式问题，它是文明发展的具象化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内在的神，轻视外在的形，“重道轻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明发展的速度。中华五千多年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智慧之源，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常青的光荣与梦想，是新时代中国思想、文化及艺术创新弥足珍贵的财富与资源。当前互联网娱乐产业越来越发达，人们逐渐沉迷于短、平、快的刺激，在算法的配合下，信息茧房效应更加凸显，娱乐至死成为社会顽疾，使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每进一步都很艰难，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精神力量，清醒的理性思考和判断，以及清晰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知。产业重利，文化重道，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注重并强调中华文化的“道”与“术”，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仅迎合、满足人民的需要，更要引领人民的文化需求往更高的方向走，从思想层面引导人民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文化认知架构，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强健人民精神世界，呼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三）厘清文化结构脉络，概括提炼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②。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有利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征程中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增强斗志。要以历史的视角，审视、厘清我国五千多年文化的结构和脉络，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入思考、概括和提炼；以现代的视角，分析和把握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思考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别是注意挖掘凝结在中国文化基因里的独特民族精神、价值观念和力量源泉，传承和丰盈中华民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使民族和国家魂有定所、行有依归，形成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从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到仁孝礼义、尊师重教、犯者必诛，从红船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到抗洪精神、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厚重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熔铸出既有筋骨又有韧劲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增强文化自信自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力量。

^① 林海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浙江日报》2023年2月27日，第7版。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借助新媒体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立足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鲜活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话语表达，增强中国话语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①。相较于正式媒介机构，西方短视频社交媒体政治色彩和管制相对弱化，这是我们打通跨文化传播渠道，有效传播中华文明，进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利“窗口”。短视频社交平台也是西方青年一代活跃的集中地，是迭代观念、重塑形象的重要战略据点。在国际交流交往中，只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潜移默化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才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我们要借力数字化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和新媒体优势，延伸触角、精准传递，努力建构起完整高效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特别注重借助国际短视频社交平台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内扩散、内外联通的四个渠道，多维度全方位深层次传播中华文明：一是通过官方外宣社交平台推进自上而下的宣传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二是借助短视频社交媒体推动自下而上的民间交流，以客观事实消解西方媒体对我国的扭曲、抹黑；三是注重发挥海外留学生群体由内扩散的传播优势，利用社交媒体传播中华文明；四是强化华侨华人、海外团体内外联通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密切海内外情感交流。在对外交流交往中，展现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以及安定和谐的社会氛围。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引领媒体融合发展新作为》，《人民日报》2019年1月27日，第1版。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局部执政的治理秩序建构

陈 静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一般认为, 井冈山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的开端, 军事意义重大。但从治理秩序建构视野考量, 中国共产党作为积极能动的治理者,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局部执政开创了新的治理框架。这一法治模型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线, 强调在工农联合下的依法治理, 以保证工农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为价值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中, 法治社会的建设与依法治理意义重大,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法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历史起点, 其基层组织建设和工农权益保障亦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井冈山; 工农民主法治, 社会治理; 局部执政

中图分类号: D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4-0079-08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由毛泽东领导创建的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它的建立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井冈山斗争时期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形成了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当前学界有关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研究业已产出大量学术成果, 但仍缺少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分析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法治建设, 故本文立足于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实践, 从治理秩序建构的视野考量井冈山的工农民主法治。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治理中, 中国共产党及工农兵政府、红军司令部颁布《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从法治国家的层面实现了民主政权组织的建构, 建设了依法行政的工农兵政府, 还规定一系列根据地民生保障措施, 从而建立了工农民主的法律体系, 实现了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特色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法治。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法治国家建设

1927年, 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标志着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 在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 通过一系列举措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巩固了党的纯洁性, 设置了苏维埃作为民主政权机关, 通过制度赋予工农阶级政治权利, 在法治国家建设层面, 从政体、制度设计和组织上实现了工农民主法治的要求。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湖湘法治文化转型与发展”(20BFX024)。

作者简介: 陈静,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一）党与军队的依法联动

1927年，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许多革命烈士惨遭屠戮。为了挽救危在旦夕的革命前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否定了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开展了“三湾改编”，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奠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组织原则和体系，使得党的工作真正扎根到基层。从10月3日晚到5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在古城联奎书院的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①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召开，从实践上解决了“思想建党”的问题，从而推动红四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27年底到1928年初，毛泽东制定和实行了军队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的方针，从部队中抽调部分对做思想工作比较有经验的党的干部去基层帮助革命根据地边区地方，协助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毛泽东还特别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当时边区的党组织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非常突出，还一度混入反动派分子。为提高党的纯洁性，党进行了九月“洗党”，同时开办党团训练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与军队的依法联动，使党与军队紧密联合，形成了党对整个根据地的领导，这是基于工农民主政权的制度明文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取得了对军队合法的支配调度权力，保障了党指挥军队的合法性。

（二）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制度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议决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②规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层革命组织，并通过制度规定这些组织并非经济的组织，而是暴动的组织，暴动胜利之时，农民协会转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规定了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1928年1月，《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③也规定督促工人们尽快组织联合会，通过这样的组织团体进行联合，最后组建总工会，农民也要组建农民协会，参与政权，还要组建自卫队保护革命，通过农民自卫机关收纳乡村中的可靠分子。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9日通过）提出，实现工人监督的口号意义非常重大，应当由一切有组织的劳动群众来实现，发动职工会、工厂委员会、手工业工人的工会等组织进行监督工作，同时设置国民经济部监督经济事宜，统计根据地一切可能的经济来源，包括工厂等，并号召工人对根据地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国民经济部办事员也由大工厂中工人选出担任，从组织、人员等各方面完善工农阶级内部的民主监督机制，实现以法律制度保障的工农民主。

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工农阶级的政权组织形式，成立了总工会、农民协会等组织，将工农阶级团结起来，为进一步维护阶级利益、打倒反革命分子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赋予工农政治权利

在井冈山根据地，关于政治方面的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的平民——省县政权属于省县人民委员会，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取消现有之省政府及各县政府。实行普遍选举制，

^① 会议确定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为工农革命军引兵井冈奠定了思想和政策基础。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在这里建立了后方留守处和红军医院，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②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71—73页。

^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71—73页。

选举工人、农民、士兵及一切革命平民作为省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同时以法律规定男女在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一律平等，赋予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平民基本的政治自由权——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①倘有破坏工农兵政府及其他反动嫌疑者，则剥夺此种自由权对于剥削工农利益和危害本政府地位的反革命派剥夺此种自由”。^②颁布选举法，赋予工农阶级参与苏维埃选举的权利，针对许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办事脱离群众、很少开会、遇事总是由主席和秘书几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强调制定《苏维埃组织法》，健全工农兵政府的办事制度，厉行“民主集中主义”，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工作，把“民主集中主义”广泛运用于政权机构，使其“显示效力”，成为工农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③

这段时期，农村民众的基本权利意识并不强，尤其是偏远山区，包括许多革命根据地地区。虽然民众并不能马上意识到自己获得的政治权利的意义，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通俗易懂的口号和法令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民众的认可和支 持，通过法律的形式对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予以保障，这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地法律建设的进步，也是开创井冈山法治模式的第一步。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法治政府建设

井冈山的工农民主法治不仅通过法律在政治方面进行民主选举，组建工农阶级的民主组织，还规定了严厉的措施保障工农阶级的利益，实现工农内部的民主、外部的专政。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的手段，革除井冈山原有的封建秩序，以适合贫民的利益，重新分配生产资料，同时鼓励农民消灭反革命分子，解除商团、流氓和土匪的武装，解散地方的、绅士的、大商人的、地主的团体，自下而上实现社会秩序的重构。

（一）工农民主的工农兵政府组织

依据苏维埃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工农兵政府由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形式上是工农民主的政府组织。1927年11月《江西苏维埃组织法》明文规定，一切政府机关交由工农群众管理，1930年《信江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法》也规定了由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人员和选举方式上都是民主的。在井冈山根据地 进行革命斗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颁布了革命政纲，如1927年8月3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鼓励农民运动；1927年11月，发布《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1928年1月发布《遂州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等。这些纲领规定了工农阶级的政治权利，剥夺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要求组建工会联合会、农民协会，组建工农革命军与赤色游击队保护工农阶级，还规定了一系列优待工农的福利政策，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劳动等各个方面。工农兵政府不仅是由工农阶级组成、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还以保障工农阶级的权益为行政的纲领，这是由党和苏维埃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受到工农民主法律保障的。

（二）通过法律鼓励无产阶级斗争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布法律制度，引导最广泛的农民运动，摧毁封建落后的社会关系。《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④提出，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要求以农会为中心，积极实施暴动，夺取政权，甚至直接提出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议决《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⑤，到《遂川

① 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61页。

②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71—73页。

③ 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0—61页。

④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40—243页。

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374—376页。

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①，明确规定可以对一切反革命派进行斗争、处罚，其中的措施包括就地自由捕捉，烧毁房屋，夺取家用器具、食物、砖瓦等。可见当时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法律的推动下取得了合法地位，激化了当地农民与土豪劣绅的斗争，由理论上的政治斗争上升到了武装斗争和资源的争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主豪绅的猛烈反扑，对革命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是整体上也使得革命取得了广大农民阶级的信任与拥护。

1929年红四军党部发布“十大政纲”，其中提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②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的一条基本策略，即没收反动派如地主、军阀及资本家之一切财产，分配给工农阶级，对于所有生产资料实行工农内部的民主分配。主要措施包括：将大资本家的资本没收，转为国有，交给一般工人进行管理，如大厂、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小厂主如果对经营工厂十分懈怠致使工厂关闭，也将其工厂没收；另外，改良贫民的生活，为他们建设住宅；^③没收富豪的住室、衣服，分给工人及一般贫苦群众；没收地主土地及一切耕种工具，交由农民协会无偿地分与无地贫农及退伍兵士耕种经营，候政府派员调查测量后重新分配；没收庙产、祠产及一切地方公产，如山林、川泽园田、荒场，交由农民协会无偿地分与无地贫农及退伍兵士耕种经营，候政府正式派员调查测量后，重新分配；没收一万元以上的工厂、作坊或商店，由当地与总工会共同管理；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归工农兵政府处理，分配给贫苦农民及退伍士兵使用；没收私人一切大企业及大生产机关，如银行、工厂、矿山、大公司等，归地方苏维埃与各该工会共同管理之，候苏维埃政权巩固后，即交全省或全国苏维埃与各该工会共同管理^④。没收教堂、寺庙、祭祀、祠堂等土地及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及退伍士兵使用；一切公共官荒，或无主荒地或沙田，概由工农兵政府处理，也都分配给农民使用。^⑤为巩固财源，银行收归国有，以新政府之信用制度代替旧银行之信用券。这一阶段，共产党领导工农阶级打倒反动派，没收其生产资料，依法将大的工厂、企业、生产机关、土地、财产等分配给工农阶级，既依法依规，满足了合法性的要求，又实现了内部的民主分配，扶持了贫苦的工人、农民。

（三）依法领导土地革命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中的土地纲领》规定，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⑥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茅坪专题讨论了边界的土地革命问题，作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决定，从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全面、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设立土地部，在边界各县政府设立土地委员会。

1928年5月至7月，在湘赣边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各个区域都展开了土地革命运动，各县、区、乡工农兵政府都设立了土地委员会，这一场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即打土豪、分田地，通过没收地主阶级、土豪劣绅的土地，将他们手中的地权转移到工农阶级、苏维埃的手中，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根据地内普遍实行了分田，在分田制度实施以后，农民土地所有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依法取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正式颁布，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工农兵政府所有，分配农民

^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71—73页。

^②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45页。

^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374—376页。

^④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2—14页。

^⑤ 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0—61页。

^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7—208页。

个别耕种。^①除用三种方法分配土地之外^②，还规定了除非是弱势群体强制劳动，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以劳动力为标准，乡村手工业工人也可以分田，但是比起农民数量减半；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公共服务者可以分配土地，而且政府还负责雇人帮其耕种。

《井冈山土地法》是1927年到1928年土地革命经验的总结，存在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如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但这些原则错误后来都得到了改正。^③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法律的手段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通过制定法规，实行工农民主法治，改变了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成了工农民主性质的土地占有关系。在井冈山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的土地法治建设也取得了一些创新的成就，从没收土地到分配土地，工农兵政府都给出了合理的法律方案，尤其是在土地分配的过程中，规定天灾等情形可免除土地税，体现了工农兵政府执政的人道主义关怀，男女老幼平等分配也体现了进步的男女平等思想，在分配过程之中以劳动力而非人头作为分配的标准，在井冈山这种相对落后的山区、边区，与井冈山的固有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井冈山根据地法治特色的法律文化。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法治社会建设

为了巩固根据地，打破敌军的经济封锁，需要摧毁旧有的剥削人民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不仅是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法治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也是为了提高根据地的工农生活水平。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井冈山的工人、农民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经济，为保证军需供应，创建了井冈山地区的军事工业，鼓励边界贸易，发行新的货币，摧毁旧的债务关系，重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金融秩序。

（一）发展根据地经济

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是根据地治理的基础，只有经济基础跟上革命运动的步伐，工农兵政府才能维系。这就要求根据地不仅要做到粮食自给自足，能够防住敌人的封锁围剿，要生产军备，帮助军队发展壮大，也要建立独立的货币和金融体系。这对于相对落后的山区根据地来说，困难很大。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通过发动妇女参与生产缓解了劳动力的不足，同时通过发布法令布告，积极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工农业生产，通过废除旧社会的苛捐杂税，增加工农凝聚力。

1. 发展边区农业

“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毛泽东在作出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科学判断之后，把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放在了首要位置，领导边区人民制定并落实了一系列发展边区农业的措施，保障了边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农业需求。一方面，边界各级政府根据边界特委的指示，加强了对土地经营、发展农业生产的领导，颁布布告，予以督促、检查。不仅组织工农红军加入农业生产工作，还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进一步充实了劳动力。边界党和政府还组织耕田队，有计划地调剂余缺互助农作。另一方面，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修建了许多牛路，还兴建水利，使得边区农业实现了大规模的增产，改变了边区的落后面貌，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2. 创建战时军事工业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工业方面主要做出的努力：一是创办军需工业。包括创建桃寮被服厂，为苏维埃的军队制造军需棉服，创办修械所和军械处造枪炮武备，还自办印刷厂和造

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11页。

② 分配农民个别耕种、分配农民共同耕种、由工农兵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③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37页。

币厂。通过这些工厂，既解决了工农就业的问题，也补足了军需用品，为革命斗争提供了物质支持^①。二是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边界政府积极组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将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发展经济。此外，还组建了各种手工业工会，为增加工钱、减少工时，向不法业主作斗争提供组织保证。

3. 保护工商业，促进边界贸易

1928年1月，《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开办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使工农贫民免受商人、资本家、地主的盘剥，统一全县的斗尺秤。同年，边界工农兵政府在红色区域内成立了竹木委员会，输出根据地盛产的竹、木、油、茶等，用此换回一些急需的食盐、药品、布匹等物资。对于中小商人，采取保护政策，不罚款、不抽税，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同时建立和发展公营商业和集体性质的商业，设立公卖处，兴办公营商店、药店，开辟红色圩场，由大陇区工农兵政府管理。^②

(二) 调整金融制度

井冈山根据地废除了原有的税收制度，取消了苛捐杂税，通过制定《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③《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④《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⑤《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政纲》^⑥等多个法律文件形成了新的税收秩序。规定实行统一财政，摧毁剥削民众的税收机关，如厘金局、杂税局等，并焚毁粮册及地主的田契借券，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规定适当的土地税和资本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如各种附加税、兵折兵加等），并禁止预征钱粮，同时禁止奸商高抬物价、操纵金融及垄断粮食等。关于土地税征收，《井冈山土地法》规定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5%、10%、5%。关于农业税问题，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暴动大纲》中指出，自耕农民及凡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对其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规定，从而通过工农阶级控制税额征收、进行税务管理，实现工农民主法治。

苏维埃通过发布法律文件否定原有的剥削农民的债务关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⑦提出铲除对贫民的高利贷，并取消一切债务；《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⑧宣布过去一切高利贷借约概作无效，以后借贷年利不得超过一分五厘，以防对贫民的高利盘剥；《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政纲》则销毁了一切田契，以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包括书面的契约）和所有当约。同时为打破湘赣边敌军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办上井造币厂，区别于官办“鹰洋”打造了“工”字银圆，形成了全新的货币秩序。

(三) 保障工农社会福利

1. 社会保障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苏维埃发布法令，规定革命政府应筹划救济农村贫民失业的基金并予以工作（如合作社等），救济为革命逃难的群众，救济老弱残废。^⑨同时，释放反动政府牢狱中之被诬囚犯，救济失业工农，收容逃亡民众；关于军队则增加兵饷，规定官长士兵薪金平

① 左峰：《井冈山根据地经济活力探源：制度变迁视角》，《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80—85页。

②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71—73页。

③ 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7—159页。

④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3页。

⑤ 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0—61页。

⑥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3页。

⑦ 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第157—159页。

⑧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3页。

⑨ 江西省档案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60—61页。

等，改善士兵生活，优待投诚来归的敌军官兵及俘虏士兵，并给退伍士兵以相当的土地和工作，抚恤革命死难烈士的家属。

2. 教育

法律规定在井冈山根据地实行普及教育及职业教育，提高革命文化，实行工农成年补习教育及职业教育，以及免费的、强迫的、普遍的和工艺的教育，开办校外的教育机关，建立一般未达入学年龄的机关（如儿童养育院、幼稚园等）。^① 为了提升根据地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在革命活动中发挥个人才智，中国共产党也在革命根据地积极创办红色学校、成人补习班，还允许失业工农兵及贫民子弟免费入学，由不同的主体创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形成了包括工人学校、农民学校以及政府办理的相对高级的工农学校的学校教育体系，从而增加工农人民的劳动知识，提升他们的劳动和革命智慧。

3. 劳动

井冈山根据地落实《劳动法大纲》，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仅为工人提供了包括工资、失业救济等一系列的劳动保险制度；还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同时将保护女性工人、童工规定入法，使相对弱势的工人团体能够获得法律的保障。^② 还规定了对童工和女工的特别保护^③，通过法律保障农民、工人的劳动、教育和福利待遇，维护了工农阶级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益，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不仅组织妇女出门劳动，并且女子与男子同工同酬，有助于改良当地落后的社会风气，巩固党在井冈山地区的群众基础。

4. 开展根据地公共设施建设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疏通河道、修筑堤防，兴修水利、改良农田；积极进行各种公众卫生事业的建设，建立免费的医院，并设立养老院、育婴院、残废院等相关扶助弱势群体的机构设施，以养育并医治老弱、儿童及残疾者。

工农红军、共产党不仅以身作则，带头帮助人民群众修建各种公共设施，积极将社会事业纳入井冈山工农民主法治的规制范围。对于一个新生的革命根据地而言，这种相对完善的福利保障机制在理论上是相对进步的，在落实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许多阻碍，但是法律法规的完善为井冈山工农民主法治的实践提供了依法执政的基础，也加大了根据地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四、井冈山斗争时期法治建设评价

井冈山工农民主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阶级探索新的法治模式的开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实践的开端，实现了苏联经验和本土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设，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虽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践行工农民主法治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共产党人发挥集体智慧与优良传统，为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一）井冈山法治建设的成就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之前，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成分复杂，地方矛盾频生，封建的小农经济也没有受到外界革命氛围的影响，属于典型的封建社会秩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后，工农群众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建立工农武装，打击旧地主和宗族势力，废除原有的税收制度和债务关系，取消了苛捐杂税，发行“工”字货币，建立法律体系，形成了新的服务于革命斗争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社会秩序。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工农兵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形成了工

^①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3页。

^② 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第157—159页。

^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71—73页。

农民政权组织——苏维埃，建立了根据地的工农兵政府，带领群众依法夺取根据地治权和生产资料，打倒反动派，大力发展根据地农业，促进农田增产，调动了可以调动的劳动力，为井冈山斗争甚至是整个革命活动提供了稳固的粮食基础。

（二）井冈山法治建设的历史局限

出于历史局限性，井冈山法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权公信力。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工农兵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不足，虽然存在政策执行效率较高的优势，但整体经济绩效不高，政权不够稳固，曾几度失去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管控，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稳定性较差，更难以稳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福利。其次法律体系不够健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两年内，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布了《遂川县苏维埃政府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不仅在法律文化相对落后的边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也为未来的法科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形成了各个法科门类的雏形，更为民主专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石^①，但法律体系不成熟，存在一些漏洞。

（三）井冈山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重“围剿”之下，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结合”的斗争经验，党的建设也取得很大成绩。井冈山的工农民主法治建设为治党治军积累了以下经验：一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二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原则，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建设原则；四是强调纪律建设，要求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

五、结语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日趋完备，红色基因始终蕴藏于我国的法治进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不可剥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的工农民主法治已经成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执政的思想理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提供了丰厚营养。同时，井冈山苏维埃政权保障工农民主权益、发展政权、提高法律体系认可的法治经验也提醒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黄惠运、欧阳杰：《党在井冈山时期的执政经验及其启示》，《党史文苑》2010年第10期，第46—48页。

非遗保护传承应用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基于云龙“耳子歌”个案的思考

叶莹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中最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塑造着人们共同的价值情感与文化认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龙“耳子歌”, 在传统保护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中从“自娱自乐”走向“共识共荣”,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了强化民族共同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联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耳子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同性; 交往交流交融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3) 04-0087-06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 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 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地考察调研时, 多次考察非遗项目、与传承人亲切交流, 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 为做好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云龙“耳子歌”与强化民族共同性

在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 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耳子歌”, 留存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一种具有傩文化特征的传统舞蹈艺术,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①“耳子歌”具有人物、对白、简单的情节和一定表演程式, 兼具“原始性、仪式性、戏剧性、舞蹈性”等特质, 是驱邪逐疫、祈求生殖繁衍、表达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愿望的一种自娱自乐的具有古傩文化特性的民间艺术。“耳子歌”是目前国内所发现的最早的傩仪之一, 有着极深的民族文化

本文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文化建设——‘弄染结盟’”的时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征文二等奖。

作者简介: 叶莹,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助教, 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文化。

^①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 2014年11月11日, https://www.gov.cn/govweb/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792636.htm, 2023年9月20日。

底蕴,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舞蹈艺术的活化石”或被专家形容为“刚出土的民俗活化石”。

“耳子歌”原名叫“装饰红”(zuaf si hup)。“耳子歌”是在白语音译和意译的基础上翻译过来的,“耳子”代表憨厚,其白语意为憨子,“歌”意为舞,“耳子歌”在白语中是憨包、哑巴、不太聪明的人打闹、跳跃的行为,意为“哑巴跳的舞蹈”。“耳子”打扮,全身用棕皮裹身,不露真面目;参加演出人员全部为男性,男扮女装;所用道具都是原始、古老的生产、生活用具。整个活动过程中有舞蹈表演、台词对白、白族山歌演唱等内容。“耳子歌”属于白族民间婚俗表演艺术,现如今它是白族婚礼中祈求吉庆、祥和,以伦理道德传承教育为主题的民俗活动。“耳子歌”目的在于借舞寓教于乐,祈祷人丁兴旺、五谷丰登,这种农耕文化展现了人类繁衍生息,体现了人之初的道理。

“耳子歌”仪式活动与该区域的民族发展历史及民族融合有密切关系。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均存在地方民族政权,大理国统一西南疆土后,吐蕃羌族部分南迁,后裔分支成傈僳族游牧,顺云岭而下,其中部分进云南。其中有一支涉足兰州界栖居马椒地。几年后进入师里(今检槽)落住,起初游居在师井、炼登、大工厂、文兴、清朗半山腰至山顶一带,以放牧狩猎为主,因交通不便,难与外界交往,发展缓慢。^①从民间传说到墓碑、祖先堂、家谱来看,检槽白族不是土著民族,多为元末明初之时随傅友德、蓝玉以及沐英征西入滇的军士及移民之后裔。下清朗杨成宝墓碑记载:“洪武前一甲子,成宝携杨、沈、董、尹、白五姓百余人丁,由内地游至清朗,见山清水秀,地灵人杰,认为日后必为发祥之地”而落籍居住。明朝洪武年间开发师井盐矿,朝廷在师井设盐课司。随着盐业的不断兴旺,内地移民大量涌入师里。由于移民长期与本地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演变成了后来的白族。检槽河谷先民多为明初中原一带的移民,他们不仅带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屯田垦荒,促进地区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中原文化。^②正由于明代汉族对西南地区的管辖,使得汉族文化在西南地区广泛传播,“耳子歌”中尤为突出道家的宗教文化思想即为实证。白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早,生活中的节庆、民俗活动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当地彝族、傈僳族、白族和汉族均会白族话,仪式中的白族话歌词贴合地方生产生活,各族群众都能听懂、意会。表演展现了文化生活认同,是生活的产物。“耳子歌”的音乐由当地高山白族的音乐与汉族道家音乐相结合而成,歌曲、歌词风格简单轻快,颇具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旋律较为简单,易在当地传唱。在“耳子歌”表演中有白族话打诨的内容,展现了世俗性;有礼仪人伦教导,体现了儒家“礼”文化;有驱邪庇护仪式,祈求多子多福多健康。

文化活动彰显了民族共同性,“耳子歌”不单是白族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同时也在发展中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共同性。关于民族共同性的定义,见于谷苞在新疆调研期间发表的《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文,他认为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同时又有着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共同之点,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③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彝族、傈僳族、汉族与云龙的主体民族白族和谐共荣,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耳子歌”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汉族、彝族、白族等民族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当下“耳子歌”的表演形式与内容,展现了“耳子歌”在传承过程中的包容性。“耳子歌”仪式中不同道具的使用,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耳子”腰间悬挂的猪尿脬象征男性生殖器官,代表白族祖先在原始社会中的自然崇

① 检槽乡人民政府:《检槽乡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② 检槽乡人民政府:《检槽乡志》,第4页。

③ 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1页。

拜、性启蒙以及对繁衍子嗣的渴望；系在“耳子”腰间的马铃、牛铃原本是居住在山区的高山白族、彝族、傈僳族在放牧时挂于牲畜身上的，在仪式中体现了人畜之间的和谐关系；耳子手持的春棒、锄头、箢篱等都是最古老的生产工具，其出场顺序与道具的使用顺序是一致的，体现从播种、收割到打春的生产过程，是山地文化的体现；女性角色身上的竹筐，强调当地人民对女性生育的辛苦付出的肯定。在“耳子歌”一次次的表演过程中，群众一次次看到、感受到其代表、传递的民族文化，在集体欢娱中进一步增进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强化民族共同性。

“耳子歌”不是一成不变的表演，一方面保留着旧时的礼仪文化，同时在表演的内容上加入新的元素，表演形式结合人们的生产生活进行更新创作，更加贴合实际，能够引起共鸣。由于时代的变迁，现如今仪式中新娘着西式白色婚纱，新郎着一身黑色西服，其余角色则保留一定原始形态。“耳子”，穿戴一身由棕榈树皮制成的衣服，包括面部也被包裹严实。表演中无台词，只能发出“呃”“嗯”“哼”的声音，手上拿着工具，像是锄头、连枷、杵等，通过大而夸张的肢体动作塑造出一个憨憨傻傻却又十分老实，笨拙却又踏实肯干的形象，是一种朴素的农民形象，也是民众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盼。“耳子歌”告诫人们即使时代在发展，生活在向好，但是农民的传统美德不能丢，只要踏实肯干，生活就能蒸蒸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确立起来并不断巩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在保有和发展自身特色的同时，民族的共同性也在逐步增强。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步入新时代，各民族共同性不断增强，结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了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云南现象”，云龙县检槽乡也在时代的发展中彰显出民族的共同性，通过“耳子歌”在文化的欢娱中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共同性。

二、云龙“耳子歌”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中最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类的智慧、人类历史的文明与辉煌，塑造着人们共同的价值情感与文化认同，是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云龙“耳子歌”自1992年向外推介后，引起国内民俗、文学艺术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舞蹈的“活化石”。1996年，“耳子歌”被大理州白族学者谢道辛撰写介绍后，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艺能部长星野弘先生一行于1999年4月到云龙县进行田野调查。2002年，“耳子歌”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日本星野弘先生于2002年向我国提出邀请“耳子歌”到日本参加“国际民俗艺术节”即“日中交流民俗芸能祭”，进行民族文化交流。2009年10月，“耳子歌”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耳子歌”早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多个国家的民俗专家曾多次到云龙县做田野调查。2016年，云龙县挂牌成立三个保护传承基地，“耳子歌”的核心传播地检槽乡兴建了“耳子歌”主题文化广场。通过一系列的保护措施，“耳子歌”不断为人们所认知，诺邓、关坪等地的表演活动也逐步得到恢复；“耳子歌”又重新回到了民间，活态传承，健康发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云龙县文化馆获得“耳子歌”项目保护单位资格。在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耳子歌”的保护传承工作有序进行，这一“具有原始文化形态和深厚历史意蕴的遗产”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耳子歌”能够发展、存续至今，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并且能够成为该民族的文化标识，都是来

源于民族环境的滋养。历史上有许多的文化学者认为,某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对形成人们的衣着、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起着重要作用。^① 检槽乡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位于县城北部,距县城30公里,地处云岭山脉南端,滇西纵谷区,北缘山麓,民族居住分布为立体型,高山为彝族,半山腰为傈僳族,河谷为白族和汉族。在四个民族中,傈僳族是本地的土著民族,白族人口居多,为当地主体民族。各民族间“打老友”^②,促进民族间生活的交流。文化展现生活,文化亦进一步影响生活,通过生活中的交流交往进而增进文化认同。

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日益增多,民族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快,各民族间通婚现象亦日益增多。“耳子歌”将民俗文化的交融与民族之间的通婚联系在一起,强化了云龙县检槽乡与周边甚至更远地区之间的家庭关系、姻亲关系。在当地,逢喜事必会在家中开一场“耳子歌”狂欢,借此驱邪纳福,成为各族群众乐于接受的有效载体,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域。“耳子歌”作为一种婚俗仪式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在逐步现代化的婚礼中依旧保留着跳菜、春官审案、起五方等以娱神为主要目的的仪式过程。在表演开始之前,群众会就“耳子歌”的背景、形式、文化内涵、宗教信仰进行沟通交流,这为活动中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耳子歌”是白族的传统文化,但在当地不止白族观看“耳子歌”,不论是何种民族,只要在村内办喜事的家庭,有条件的都会请“耳子”前往家中造乐一场。“耳子歌”中有12个角色:跳菜人员1个、“耳子”3个、“耳子”媳妇3个、老妈1个、老倌1个、主人1个、判官1个、郎中1个,仪式中模糊了不同社会角色的边界和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出现“官民同乐”“人神共乐”“众人同乐”的现象。互动关系体现了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关系,通过仪式表演将脑海中的理想社会转化为舞台上短暂的现实,为人们建构出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关系,在其中体现出文化认同层面下的“礼乐”思想与人文情怀。

“耳子歌”通过“自娱自乐”的表演形式将多民族聚合起来,通过文化展演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前文说到,“耳子歌”仪式既包含汉族文化,亦含有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以白族文化为主。“耳子歌”是在中华文化“大传统”流动与传播的背景下,与地方性的“小传统”文化互动交融后,逐渐地方化而形成的具有区域与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耳子歌”仪式的开场借鉴了彝族跳菜文化,跳菜在彝族、白族婚俗仪式中的共性体现在其不仅可以克服饮食、舞蹈和音乐三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状态,还可以艺术性地、有机地将音乐、舞蹈、饮食融为一体,塑造广泛的地区认同、群众认同、文化认同。通过跳菜,人们把饮食从厨房到餐桌的过程夸张化、仪式化、戏剧化,这一环节有着鲜明的审美价值、自娱价值、文化价值。跳菜环节展示主人家做的传统八大碗——红肉酥、肉豆腐、彩蒸、花生等佳肴,这些菜在生产中象征着吉祥如意,借用白族话的谐音意指生活中现实存在的需求问题,既是当地特色美食又有象征性意义,代表了当地饮食文化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传统菜肴已经被替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地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在“耳子歌”仪式中,表演者的服饰有的时候仍然使用彝族跳菜服饰,这也从侧面体现了白族与彝族在相互尊重的同时,对本民族的文化充满自信,在相互交流中既保持本文化的特性也兼容其他文化。彝族跳菜出现在白族的“耳子歌”中,是当地白族在婚俗中的族群认同及与周边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表现。彝族与白族多有通婚现象,跳菜这种被认同的共通表演形式,成为族群内部成员、亲属关系联通的媒介。他们

^① 杨瑞华:《白族绕三灵起源考》,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② 即结交朋友。多为山地民族(彝族、傈僳族等)同坝区民族(白族、汉族)等自愿建立的类似亲属的特殊亲密关系。

在观赏跳菜时亦在交流各自属地文化事项，在文化交流和对比中明确民族的特殊性与共同性，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发展。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耳子歌”既是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也是民族文化，是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资源。“耳子歌”以白族文化为主，蕴含着生活在当地的汉族、彝族、傈僳族的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民族文化体系。“耳子歌”中蕴藏着当地的多民族文化基因、意识形态、心理结构、情感认知等要素的遗产财富，展现了当地的文化历史，体现各族群众的精神追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在“耳子歌”文化中不仅展现的是白族文化，更是当地群众的共同文化认知，各族群众在保持自身民族认同的同时，通过不断地交往交流活动，在生活生产中慢慢呈现出异源同质的发展趋向，当地各族群众之间始终坚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与艺术共享，是当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团结之根、和睦之魂。承载着民族记忆的“耳子歌”，是当地民众通过民族传承而流传下来的文化财富，在历史发展演进中，通过同当地民众的交往交流，在个性中寻找文化共性，不断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价值情感与文化认同，在不断增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中“耳子歌”得以保持原生性和完整性。

三、云龙“耳子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通

把握好民族文化关系，正确理解非遗保护传承应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通关系是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新理念，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民族文化，也蕴藏着解答民族现实问题的考证线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决策性部署，也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理论的民族性凝聚，更是非遗保护传承应用的历史性支撑。

“耳子歌”凸显中华民族凝聚力，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共同性，通过仪式化的叙事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耳子歌”有完整的叙事结构，如仪式中的“跳菜”“耳子抢红肉”“耳子闹婚”“点菜名”“春官审案”“起五方土”就有着十分严谨的叙事性，通过贴合实际的叙事给观看者传授人伦礼仪知识，通过诙谐有趣的对话和夸张的表演形式将平时难以启齿的话在公众中展演，民众在集体的欢娱中习得人伦道德、礼仪规范，也在集体的欢娱中加强交流，增进情感认同，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指引下，各民族人民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通过不断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耳子歌”在传承发展中融合各民族的文化，体现了民族共同性，通过集体记忆将民族联系在一起，通过一段段仪式化的叙事将当地民众的情感凝聚在一起，通过同喜同乐增进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进而构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通过云龙县有关部门的合力打造和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参与，“耳子歌”经历了从民族传统节目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到公共节目的发展转型，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各民族共享共创的文化节目。“耳子歌”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当地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交融，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持续深入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耳子歌”在当代的发展中基于“共同体意识”发挥教化功能，推动当地民族融合发展，走向“共识共荣”。“耳子歌”不单单是一种艺术活动，其还运用于当地群众生活之中，具有教育教

^① 闵言平：《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2020年第7期，第11—12页。

化、情感表达、仪式延续、强化沟通、文化认同等功能。从宏观来看，“耳子歌”最初是为了教化人们繁衍后代，继而与我国的婚俗结合。人们通过“耳子歌”仪式来加强双方的互动与了解，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学习繁衍生息知识。从微观层面来看，“耳子歌”仪式的表演结构展现出其多层次多角度的教化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繁衍生息。从仪式信仰来看其教化功能主要体现在：敬畏自然、传递性教育、维护村落秩序；从仪式表演的具体内容来看，其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驱邪除疫、增强族群认同、娱神到娱人的转变。从“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看，在社群中共享的文化符号能够唤醒社群成员的个体情感，进而产生身份、情感或文化认同。^①“耳子歌”不单是娱乐性的活动，还在群体性的表演中发挥着增进共识的凝聚作用，在互动中发挥着传递优秀文化和规范言行的教化功能。“耳子歌”不单是白族的传统活动，它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受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自身建构中又吸收了彝族、傈僳族、汉族的信仰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信仰文化，凝聚着当地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表演中体现出包容性、环境适应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又反作用于民族文化的交融，使得各民族在保持个体的同时又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断丰富自身文化内涵。“耳子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肯定其在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其作为构筑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和场域，积极发挥其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和凝聚功能，让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挥出巨大的功能和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文化共同体是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面，且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是实现文化交融的必要前提，更是体现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推进非遗保护传承应用工作，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有利于提高全民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金姚、林发钦：《粤剧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遗产》2022年第1期，第2—3页。

“西南联大精神”的多维赓续及其当代价值

余梦成, 李直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西南联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爱国主义、民主革命、科学教育、学术自由等内涵的独特的“西南联大精神”, 这对当代教育体系的发展、历史文化的传承、国民精神的建构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值得我们一直传承下去。随着科技发展和现代生活的转向, “西南联大精神”通过更具观赏性、可视性的视听艺术和文化建筑等方式展现出来, 契合时代文化需求, 这对讲好联大故事, 赓续联大精神,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西南联大精神; 文学作品; 视听艺术; 文化建筑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4-0093-07

西南联大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书写了教育传奇, 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革命性、爱国性、先进性, 并形成了包括爱国主义、民主革命、科学教育、学术自由等内涵独特的“西南联大精神”, 这种精神无疑对当下依然具有重大意义。随着科技发展和现代生活的转向, “西南联大精神”在更具观赏性、可视性的影视文学、歌舞乐曲和文化建筑等形式上得到延续和发展, 更直观地引起人们对西南联大历史文化的关注并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这对赓续西南联大精神,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学作品: 在回忆与虚构之间演绎联大

在人类文明史上, 在历史发展的演绎、时代文化的变迁中, 书籍都是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作为抗战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 西南联大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一直是文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数十年的历史传承中, 出现了丰富多样的承载着先辈们革命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学书籍, 它们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让文字带着“联大人”的“历史生命”, 从书页的缝隙中将深厚的“联大精神”传递下来, 在追思中丰富当下人们生命体验, 找寻意义旨归。

当代书写“西南联大”的文学书籍丰富多样, 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研究专著等多种文学形式。主要分为两类:

基金项目: 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专项“云南社会机制与西南联大文学形成研究”(YNWR-QNBJ-2019-095);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作者简介: 余梦成,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李直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一类是“联大人”亲历后的回忆性书写。汪曾祺的《在西南联大》，以日记体形式记录着关于西南联大的点点滴滴，从吃、喝、玩、学、乐等多个方面建构了其在昆明时的文化与生活，让“味道”“声音”“茶馆”“课堂”“警报”等成为记忆的载体，消解战争的压抑氛围，将独特的“联大文化”“联大精神”契合于当下人们的审美感知的形式传递下来，在生动丰富的文学传述中，将“个人回忆对象变为纪念机制里的集体记忆对象”^①，以个体的文化身份承载集体的历史记忆，在纪念中传承历史精神。许渊冲的《永远的西南联大》，以“追忆逝水年华”的文化心境，“重拾”学生身份，从远行前的“源头活水”讲到联大时期“往事如烟忆”，追忆着“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鲁迅的学生魏建功讲《狂人日记》，还有罗常培、唐兰等教授也都各展所长”^②，在寻常的历史叙事中，找寻抗战的青春记忆和灵魂，彰显着丰富的西南联大的文化精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师生们坚守文化阵地，传递文明火种，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传承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回忆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忆本身，而是“将私人情感的回忆文本，变为回忆序列中的关键文本，将个体的、具有时间框架的交往记忆推向集体的、更久远的民族文化记忆”^③，进而以更好的文化姿态走向美好的“明天”。

另一类是“现代人”的虚构性书写，即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想象和发散。岳南的《南渡北归》以线性的时间叙事，记述了抗战时期艰苦卓绝的文化历程，塑造了一群勇毅的知识分子在烽火中越挫越勇，积极以文化抗战，“以传道授业保存了文化血脉，用学术活动期许了民族生存姿态”^④。承担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良心，在战火中谱写慷慨悲歌，表现他们风骨与气质的同时，更彰显了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宗璞的《野葫芦引》以西南联大为背景，以孟家的变故为叙事脉络，刻画了一群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之际，勇于担当、忘我奋斗的心路历程，他们肩上承载的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复兴富强的重任，身上维系的是中华民族刚毅的斗争精神，表现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义与文化正义。杨杨的文化散文《大学之光——行走在云南深处的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地域为背景，讲述了罗常培、闻一多、费孝通、沈从文、邢公畹、曾昭抡等人的行旅经历和文化生活，记录他们在云南所进行的一系列考察，从“战前的彩云之南”讲到“战火中的‘文化之都’”，再到对“云南乡村的伟大发现”，最后回归到西南联大这座“闪烁在高原上的‘大学之光’”^⑤，将视角下沉至知识分子寻常而富有生趣的生活经历，解构历史的硝烟与压迫，展现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积极的文化心态和充满希望的民族国家情感；在“发现云南”的同时，展示了云南独特的风景体验，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与积极作为。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丰富的历史意识和生命关怀，重走在七十年前的路上，站在亲身体验的叙事视点，以“路”为精神纽带，开启两个世纪的文化沟通和意义传承。

除上述列举外，还有诸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文学记事和文化书写，如蒋梦麟的《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梅贻琦的《西南往事：梅贻琦西南联大时期日记》、赵瑞蕙的《离乱弦歌忆旧游：西南联大求学记》、冯友兰的《我与西南联大》、马识途的《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① 赵坤：《交往记忆、文体演进与功能转型——回忆性文本序列中的〈回忆鲁迅先生〉》，《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5期，第107—112页。

② 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2页。

③ 赵坤：《交往记忆、文体演进与功能转型——回忆性文本序列中的〈回忆鲁迅先生〉》，《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5期，第107—112页。

④ 杜颖莹：《聚散与沉潜：知识分子的生存变迁之路——以〈南渡北归〉〈夹边沟记事〉〈中国在梁庄〉为例》，《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8—15页。

⑤ 杨杨：《大学之光——行走在云南深处的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郑天挺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董易的《流星群》、海男的《梦书：西南联大》、鹿桥的《未央歌》、王蓝的《长夜》、张曼菱的《西南联大行思录》、岚枫的《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等等。它们多是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展开描写，以生活化的诗意叙事解构抗战纷乱的时代环境，深入书写个体复杂的生命体验，“在视野深处迸射着理想主义的微光”^①。阅读这些文学书籍的过程，就是体悟历史文化的过程，也是丰富自我生命体验的过程，更是传承时代精神文明的过程。

二、视听艺术：返回“历史现场”的当代文化空间

随着科技的变迁，在“现代性”的动力驱使下，现代技术发展衍生出多种艺术形式以承载丰富的文化精神。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最易于被接受的莫过于“视听艺术”，包括影视、音乐、戏剧等。不同于传统纸质阅读的枯燥感和间接性，“视听艺术”能最大限度地给人以直观思维的感受和体验，通过艺术的历史建构和审美开创，实现传统与现代跨世纪的文化空间的同频共振，进而引发现代人的精神共鸣，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心绪体验，从而实现对文化精神的艺术赓续。

（一）影视文学

“影视文学”基于真实的文本改编，使艺术在现代化的审美空间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部分影视文化落于流俗的窠臼，更好地发挥技术的作用，推动视听艺术与“党史学习教育的建党精神、家国情怀、尊师重教、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精神等内容相融合”^②，更好地传承文化精神。

当代不乏对西南联大进行视觉地历史建构的影视艺术，其中以西南联大博物馆联合其他影视文化公司推出的专题纪录片《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八年记》最具影响力。

2003年，由张曼菱编导的《西南联大启示录》作为新世纪第一部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纪录片，讲述了一代人“被迫南迁”，以天地为课堂，在战火中“弹雨弦歌”的历史故事，张扬的是时代虽远但“红烛不灭”的“西南联大精神”。

接着2005年，由中央电视台录制的《西南联大八年记》，通过采访数十位联大亲历者，以跨世纪的人物口述回忆方式，用七集系列片展现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成立与发展的过程，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艰难的时代环境中，如何求生存、谋发展、怀热忱、作贡献的心路历程，深刻表现了一代国人在战争中的“艰苦岁月”，在硝烟中不绝的“薪火相传”，以及他们“弦歌不绝”的文化传统和心灵史。

2018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中央新影集团联合打造的《西南联大》，是符合党的十九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文化书写，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③的艺术表现，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因素，表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纪录片从宏观上全面讲述了西南联大的发展史，是那一代学人深厚的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怀的艺术表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讲好西南联大故事、传播西南联大声音、赓续西南联大精神”^④具有重要的意义。2021年，作为《西南联大》姊妹篇的影片《九零后》拔地而起，这是一部较为独特的影片，它没有沿用

① 李海鹏：《代路而言（序一）》，杨潇著《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页。

② 杨畅：《论红色音乐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湖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150—158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④ 王德强、保跃平：《论西南联大红色资源的当代转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96—105页。

“分集纪录片”的形式，而是以“电影纪录片”的方式，让许渊冲、杨振宁、杨苾、马识途、巫宁坤等十六位年近百岁的世纪老人联袂出演、亲口讲述，打开一扇扇历史窗口，跨越时空距离，将七十多年前的文化记忆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现代科技和传统文化的完美交融，同时具有清新玩味的谐趣和古朴沉重气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作品的厚度与文化内涵，体现出文化意义上更为深刻的人类学价值。”^① 电影《无问西东》也涉及对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即将上映的由高翊浚和王鹏执导的《我们的西南联大》以电视剧的形式，讲述了特殊时期一群文化青年的铮铮铁骨和赤诚之心，深刻演绎了他们的成长过程，故事更加紧凑，更具可视性。

这些纪录片作为记录历史、铭记历史的重要媒介，承担着讲述历史、传递精神、观照现实的文化责任。同样的历史题材，不同的艺术处理，它们共同传达的都是那一时代的历史文化记忆中，彰显联大知识分子们的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在传递“西南联大精神”，重拾当下现代人正在失去或已经失去的勇气和毅力。

（二）音乐演唱

音乐不仅是一种声音艺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也发挥着特殊的艺术功能为社会现实服务。音乐由于其自身的鼓动性和传唱性，在抗战时期也是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为了响应全国“音乐抗战运动”，西南联大一些进步学生成立“群社”，以演讲、辩论、文艺讲习、音乐演唱等方式介绍革命理论、传播进步思想。在之后的文艺活动中，群社积极组织同学们演唱和教授抗日救亡歌曲，给联大师生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的心绪，积极鼓舞着师生们向着光明前进。可见，音乐作为声音艺术，在抗战时期就发挥着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在当代，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南联大精神”赓续的艺术途径。

最有影响力的当属由王晓玲等知名作曲家联合云南本土曲词作家联袂谱写的《西南联大组歌——天降大任》，这是云南师范大学为迎接西南联大在昆建校暨云南师范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打造的大型交响合唱声乐套曲，“由15首（包括《满江红》《南渡，南渡》《联大花开》《停课赏雨》《跑警报》《泡茶馆》《爱情故事》《得胜糕》《印在心上》《大师们》《新诗社》《野人山——森林之魅》《最后的演进》《天降大任》《我长大、你不老》）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但又具有相似思想主题的歌曲及情景讲述组成，其中涵盖了独唱、合唱、对唱、戏剧表演等多种形式。”^②从整体上看，歌曲按“南渡北归”的叙事脉络，讲述了抗战时期联大的成立发展史，颂扬了在困窘环境中联大师生的理想与追求，彰显了不屈不挠、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除此之外，歌曲《西南联大》《迢迢长路，联合大学》等，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西南联大人们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三）戏剧活动

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包括话剧、歌舞剧、音乐剧等多种类型。中国戏剧“从一开始就在‘为艺术’、‘做工具’和‘迎合观众’三重悖论中步履蹒跚地前行”^③。第一层是其本体的艺术追求，第二层是社会环境赋予的，第三层则是寻求发展进步的路径。因此，戏剧活动不仅表现了人民多姿的生活样貌，而且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就西南联大而言，抗战时期就已经成立戏剧社团，开展丰富的戏剧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话剧团”和“西南

① 李政：《从〈西南联大〉到〈九零后〉——试论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新表达与精神传承》，《电视研究》2021年第9期，第49—51页。

② 王俊健：《〈西南联大组歌——天降大任〉的音乐分析与演唱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21年，第8—13页。

③ 陈珂：《欧阳予倩与文明戏——兼论文明戏时代的观众及戏剧文化环境》，《戏剧艺术》2006年第4期，第74—81页。

联大剧艺社”。这两大剧社除了“艺术戏剧”的演出外，还积极以戏剧活动参与社会政治，将艺术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社会实貌，激发民众参战抗战。当代戏剧活动除了沿着先辈们开辟的文化道路进行艺术的自觉创造和创新外，还追求戏剧的“工具性”，以剧目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时代精神。

以西南联大为主题的戏剧活动类型多样且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在表现思想性的同时坚持艺术性。由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推出的舞台剧《到大西南去——我的青春在西南联大》，以抗战时期三校南迁为主线，采用“历史”和“现代”交错展开的表演形式，以“梦回西南联大”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小川、顾必德、林袖春、赵寒征、刘知悔五位知识分子为保存文化薪火，辗转寻找西南联大的过程，以及他们的奋起抗争史，展示了西南联大师生恪守“刚毅坚卓”的校训，共济时艰、传播薪火的精神^①。周龙导演的《联大往事》在追忆中展现了联大时期师生们特殊的文化生活，“求学之争”“跑警报”“投身军队”等片段彰显的是西南联大大学人们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以及在艰苦环境中的生活趣味。既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有幽微的细节表现，在高低起伏的情绪渲染中指涉诗意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赓续。此外，还有《我的闻先生》，反映知识分子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精神；《我的西南联大》重现历史传奇，以“一所学校肩负起民族兴亡、一段史诗铸造民族灵魂”^②，讲述了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们“文化长征”的抗争往事；也有《奋不顾身的爱情》缓缓诉说着联大大学人们战争时期坚韧的爱情，在爱情中汲取力量，满怀国家想象和社会期待。

综上所述，当代“西南联大精神”的赓续方式已经不再局限于书籍、演讲等形式。“影视文学”“音乐演唱”“戏剧活动”也成为“联大精神”的载体，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中，积极发挥艺术的“工具”作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三、文化建筑：物质与精神结合的西南联大传承

“去往当年的现场，看看那里的草木山川和历史遗存，借助这些，你得以重新想象一段历史。”^③从古至今，建筑从来都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也包含着精神性的因素，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说，“建筑是世界上包含文化内容最多、涵盖面最广、综合性最强的一种文明产物。它不仅涉及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方面，而且涉及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宗教意识、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它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全部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个时代的全部历史都可以从建筑上看到，而且比文字历史中所看到的更加直观、更真实”^④。借助于建筑的印记和散发的气息，可以抵达历史记忆的深处，感悟时代的文明和文化。

2020年1月20日，正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西南联大博物馆参观调研时强调：“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艰苦简陋的环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我们现在教育的

^① 新华网：《原创舞台剧〈我的青春在西南联大〉在京上演》，2018年11月3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8546089439028881&wfr=spider&for=pc>，2022年12月19日。

^② 南开大学新闻网：《现实主义经典话剧〈我的西南联大〉南开上演》，2009年4月26日，<http://news.nankai.edu.cn/zhxw/system/2009/04/26/000023266.shtml>，2022年12月9日。

^③ 易社强：《一次神游（序二）》，杨潇著《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6页。

^④ 柳肃：《营造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绪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①这一指示精神,高屋建瓴地阐释了“西南联大精神”的价值及其当代意义。正是因为对这些传统文化建筑的保护,才能让当代人有机会触摸历史的面孔,切身感受那一代知识分子艰辛的成长历程和卓绝的斗争精神,让建筑承载历史、承载文化,在雨打风吹的激流环境中,传递着刚毅不屈、昂扬向上时代精神。

以云南为例,当代以赓续“西南联大精神”为主题的文化建筑丰富多样,主要以昆明和蒙自两地为代表。昆明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西南联大博物馆”“闻一多纪念馆”等多个文化建筑,它们共同谱写了西南联大历史记忆、传承西南联大文化精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位于昆明市五华区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校区,校内有“‘12·1’纪念广场”,该建筑采用浮雕技术修复历史的面孔,纪念在“‘一二·一’运动”中为反内战奋起发声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辈,弘扬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校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记述着西南联大的建校史和校风校典,表现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艰难的发展历程以及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使命和文化担当。还有“三校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亭”“校训‘刚毅坚卓’碑”“国立西南联大教授名录”“民主草坪”“校长雕塑”,以及多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等历史文化建筑,它们是“西南联大精神”的载体,具有传承性和时代价值。

“西南联大博物馆”是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的基础上建成的,它的存在,不仅是为保存西南联大历史,而且还是传承文化精神,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具有特殊的价值,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②“西南联大博物馆”内设2个展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和“‘一二·一’运动纪念馆”,3个基本展览——“西南联大历史展”“‘一二·一’运动历史展”“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生平事迹展”,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梅园”等多个文化建筑,对赓续西南联大精神、传播西南联大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③“闻一多纪念馆”位于昆明市盘龙区,坐落于“闻一多公园”内,纪念馆“以‘烛’为意,以意找形”,整体框架采用“烛”字的篆书演化设计而成,深度展现了诗人“莫问收获,但问耕耘”^④的“红烛精神”,具有厚重的文化气息和时代内涵。

在蒙自,以“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这一红色文化建筑为代表。1938年4月,因昆明校舍不足,西南联大决定将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合并为“文法学院”,以陈寅恪、刘文典、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等教师带领200多名学生前往蒙自开设分校教学。同年9月,因国民政府航空学校由桂林迁往蒙自,在此办学培养航空人才,联大师生主动将校舍让出,而后迁回昆明。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虽然只存在了一个学期,但却为蒙自的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西南联大师生在蒙自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支持帮助地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广泛传播爱国主义、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对蒙自近现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⑤

“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是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分校旧址”的基础上,在时任中共中

① 新华网:《习近平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2020年1月21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6305543231192557&wfr=spider&for=pc>, 2022年12月9日。

② 新华网:《习近平向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致贺信》,2016年11月10日, <https://news.12371.cn/2016/11/10/VIDE1478779203268114.shtml>, 2022年12月19日。

③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2020年6月29日, <https://bwgk.ynnu.edu.cn/bwggk/bwggj.htm>, 2022年12月19日。

④ 闻一多:《红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⑤ 姚玲:《边陲小城蒙自与西南联大》,《档案春秋》2019年第1期,第59—61页。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关怀下建成的。“2010年5月31日，李克强副总理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旧址参观考察时，充分肯定了爱国、民主、独立的精神，要求云南各级政府保护好西南联大在蒙自的这段珍贵历史资源，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旧址建成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①纪念馆分为“联大历史记”“蒙自分校记”“联大人才记”“联大精神记”4个部分，一共8个展厅，从多维度详述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的成立史、发展史；有“三校墙”“联大教授墙”“联大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教室旧址”“联大师生生活展览区”等多个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可视、可触的西南联大分校文化史。

可见，这些文化建筑从来就不具备“使用的工具性”，而是以“纪念的工具性”“文化的工具性”存在，我们需要在情感维度的价值取向中，去体悟、感受它的意义。除云南外，其他地方也有诸多和西南联大相关的文化建筑，如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它们共同谱写了西南联大的华丽乐章。在追忆中，传承西南联大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基因，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结语

“文学书籍”作为古老的文化传承方式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价值，它能更客观、多侧面地反映一个时代的文明发展与文化进步。但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求我们以更丰富的形式去反映时代面貌，“视听艺术”将现代技术应用到文化传播中，能返回“历史现场”、倾听历史心声、洞悉历史真相，而“文化建筑”则能将“建筑本体转化为充满诗意的和具备认知功能的构造能力”^②，把时代的历史文化精神通过建筑构型传递给我们。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它的产生发展史与中华民族的抗敌复兴史同步亦趋，讲好联大故事、赓续联大精神与讲好中国故事、张扬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因此，如李克强总理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所指示的：“西南联大在国家危亡之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和最宝贵的品格，要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③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将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文化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勇于担当精神传递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现实使命。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张婷婷、杨绍军：《西南联大教育遗产保护与体系构建》，《学术探索》2021年第12期，第112—121页。

^② [美]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著，王骏阳译：《建筑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③ 中国政府网：《李克强“回”到西南联大：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2017年1月25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01/25/content_5163482.htm，2022年12月19日。

发展问题研究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钱仕英

(西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对共同富裕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索,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共享发展理念、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等新理论,取得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进行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实践,探索、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何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重大课题,贯穿着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以辩证法为基础的矛盾分析方法、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群众路线方法和以大历史观为基础的胸怀天下的历史担当。这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和实践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共同富裕; 共享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辩证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4-0100-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①,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提了出来。随着共同富裕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新理论、作出新论断,深入回答了“为什么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等问题”^②,同时在实践上力度空前,许多领域改革成效显著。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乘势而上,在现有基础上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共同富裕放到更重要更突出的位置进行总体谋划、顶层设计,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将共同富裕作为解决不平衡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城市‘富裕’人才走城市‘包围’农村之路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2022J0545);西南林业大学2022年度校级文科项目“云南涉农高校服务乡村乡村振兴现状及路径研究”(WKQN22007)。

作者简介: 钱仕英,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② 逢锦聚:《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共同富裕百年奋斗的理论与实践》,《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5期,第8—16页。

不充分的关键途径，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并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划定了时间表路线图。

（一）共同富裕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途径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共同富裕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其中有生产力的不平衡不充分，也有生产关系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是分配关系的不平衡、不合理，生产资料、财富占有的不均衡。”^①这种不均衡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处理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②解决分配领域的不平衡，是关键中的关键，是人们最关注最迫切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③，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解决会造成一些群体的获得感不强、社会活力不足，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将共同富裕作为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途径。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第一次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向世界宣告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党的重大责任。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提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⑤，这既是我们党百年来的成功经验，更是未来破解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新发展阶段，只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解决人们长期关心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使全体人民更加普及普惠地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人们充分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让人民共同享有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发展程度的整体跃升，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决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⑥。在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规划中，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就是说，共同富裕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和重要指标提出的，共同富裕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主要特征，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

① 王伟光：《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红旗文稿》2012年第1期，第4—7页。

② 顾海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红旗文稿》2021年第20期，第4—11页。

③ 罗楚亮、李实、岳希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第33—54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⑤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第66页。

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

⑦ 张雷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伟大创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5期，第39—45页。

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①，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对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②的积极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同时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能物质繁荣、精神空虚，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要在发展中学会驾驭资本，避免陷入资本逻辑的困境、资本驱动下的物质主义泛滥、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和现代化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兼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实现“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协调统一^③，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扭曲。这是中国共产党开辟出来的通往现代化的新道路，“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邃认识和准确把握”^④。

（三）共享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

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共享发展，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只有共享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前四个理念集中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最后都归结到共享，回答发展起来后成果分配的问题以及发展与人民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和原则，强调建设一个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共富型社会。“共享”是“以人民为中心”重要思想的实践，是真正体现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执政理念。

从内涵上，共享发展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多个层面，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质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的问题。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离开生产，孤立地谈论分配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在生产中谈分配，既解决生产力问题又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

（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安排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中央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战略安排，擘画了共同富裕“三步走”的战略蓝图。

第一步，“十四五”时期共同富裕方面的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第二步，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这个时候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国家规划的要求“进入了较为富裕国家的行列，伴随着

① 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第200页。

③ 薛丁辉、刘靖北：《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华日报》2021年3月23日，第11版。

④ 谢伏瞻：《如何理解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理论导报》2021年第10期，第41—42页。

贫富差距继续缩小，这个时期我国的共同富裕程度将比现在有显著提高”^①。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基尼系数降低到合理范围。

实现共同富裕是重要的时代课题，但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充分估计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短中长期规划，时间节点明确、目标清晰、路径可行，既有定性的标准又有定量的指标，并充分考虑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正确处理人民的期待和发展实际情况之间的关系，主动谋划，在目标、进度、速度和可承受度上作出适当的安排，区分具体目标和总目标、阶段性目标和长远目标，积小胜为大胜，一茬接着一茬干。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有力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分配秩序，选取浙江试点先行探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同富裕取得积极进展。

（一）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历史性任务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既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工程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作为着力点，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③。2013年以来，通过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兜底保障、靶向施策精准扶贫，使现行标准下9899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5万个贫困村出列^④，区域性整体性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近亿人口实现“吃不愁、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脱贫攻坚战的打赢标志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极大夯实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最薄弱的一环，填补了共同富裕最大的短板，使全国共同富裕水平大大提升，中华民族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从此，“党和国家的战略重心由实现全面小康走向促进共同富裕”^⑤。

我国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是系统的，措施是根本性的，对中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的、全方位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整体跃升，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最重要的是使人民群众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共同富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二）大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针对之策，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推进协调

① 辛向阳：《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观》，《新疆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7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第2版。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2021年4月6日，http://www.scio.gov.cn/gxzt/dtzt/2021/rljpdzgsjbps/zw_20426/202208/t20220802_290519.html，2022年12月10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2021年4月6日，http://www.scio.gov.cn/gxzt/dtzt/2021/rljpdzgsjbps/zw_20426/202208/t20220802_290519.html，2022年12月10日。

⑤ 厉以宁、黄奇帆等：《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367页。

发展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统一有效的国内大市场的要求,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党的十八大后,全国乡村在摆脱贫困的基础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村资源,加快农村土地确权和“三权分置”改革,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让6亿多农民分享土地红利,用制度保障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2014年以来,全国农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连续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至2021年,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高1.7个百分点^①。“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0年的3.2倍下降到2021年的2.5倍”^②,为多年来最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水平发展速度高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关系朝着更加合理方向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坚实步伐,广大农民更加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

为解决区域发展差距过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在加大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倾斜,鼓励东部发达地区发挥先富示范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尤其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脱贫地区,健全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推动东部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实施“携手奔小康”“百县千乡万村”“万企帮万村”等对口帮扶行动,重点实施了备受瞩目的三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多项举措之下,我国区域贫富差距逐渐缩小,经济布局持续优化。“2011—2020年,收入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逐年下降,收入比由2011年的4.62(上海与西藏居民收入之比)降低到2020年的3.55(上海与甘肃居民收入之比),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③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乡、地区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区域发展平衡性协调性明显增强,经济结构更加科学,分配更加合理,中西部地区发展后劲更足,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彰显。

(三) 大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有序。新时代,党中央更加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按照“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④的指导思想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其中最突出的举措就是“提低”和“调高”。

一方面,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施,增强农村内生动力是最有力的“提低”;另一方面,加大资本监管力度进行“调高”。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⑤围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2021年,国家出台了《国务

^① 《居民收入水平较快增长 生活质量取得显著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 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hd/lhfw/2023/fjxsd/202302/t20230227_1918904.html

^② 马建堂:《稳步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求是》2022年第10期,第24—29页。

^③ 宁吉喆:《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出席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就〈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有关情况答记者问》,2021年9月28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shipin/spfts/20210927/3634.htmshhtml>, 2022年12月8日。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13-11/15/content_5407874.htm, 2022年2月18日。

^⑤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4—9页。

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挂牌成立国家反垄断局，加大对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一些典型企业因此被相关部门约谈或罚款。诸多措施层层推进，促进互联网行业健康有序、持续繁荣。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平等的发展空间，更好回应民生关切、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果彰显。与此同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对娱乐明星、网络主播等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和行为规范力度空前，有效发挥了警示教育作用；积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加大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管理；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遏制权钱交易。通过大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劳动者勤劳守法致富的积极性，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创富，缩小收入差距，形成更合理更均衡的收入分配格局，让更多人体体会到公平正义，进一步完善了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四）试点先行为共同富裕探索经验

党中央选取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稳步推进全国共同富裕。浙江省在长期的改革过程中，进行了“八八战略”“千万工程”“最多跑一次”等有效探索，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成效显著。借助这些有利条件，中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利于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涵，有利于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有利于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①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浙江先行探索，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探路。

支持浙江靠创新驱动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打造“数字浙江”，打响“浙江制造”品牌，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在全国率先大力打击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在规范网络电商平台、数字经济领域作出示范；铁腕惩治贪污腐败，遏制权钱交易，取缔非法收入，构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营造良好社会舆论，发挥浙江企业众多的优势，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继续发挥浙江乡村经济优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探索土地确权改革；依托“美丽乡村”和“千万工程”建设基础，坚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打造新时代的宜居宜业“富春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打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江南特色的文化强省。浙江发挥宏观政策支持与人民创造性结合优势，“不断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其他地区分梯次推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贡献”^②。近年来，浙江高质量发展特征愈发凸显，共同富裕物质基础日臻厚实，收入分配格局持续优化，共同富裕制度机制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为全国作出了表率，正在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五）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党中央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在量上扩大供给，大幅度增加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年6月11日，第1版。

^② 徐晓明：《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人民日报》2021年6月23日，第5版。

领域的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党的十九大增加“幼有所育”“弱有所扶”,兜住一头一尾底线,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全面深化教育领域改革,推进义务教育免费就近入学,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试点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分布,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改革,整治教育领域多年来存在的“内卷化”积弊,回归教育的公平公益性;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高压态势稳房价,各地陆续出台包括公租房、廉租房、长租房在内的多种形式的住房供给政策,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大病保险实现全覆盖,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10亿人,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从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角度来重视生态环境,以史上最严格标准保护生态。二是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优化和调整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着重提高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高公共服务配置效率,使全体社会成员公平享有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其中在教育领域支出占GDP比重从2012年以来一直超过4%^①,并且教育经费进一步向中西部倾斜。基本公共服务是群众感受最直接、最深刻的民生事业,是人民获得感与幸福感最直接、最现实的来源。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全体人民享有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公平与结果相对均等,使人民群众普及普惠享受社会发展红利,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有利于缩小城乡、区域、人群之间的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差距,为人民消除后顾之忧,有效释放消费潜力,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深刻践行。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方法论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方面重大关系,坚持短中长期目标相贯通,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贯穿着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以辩证法为基础的矛盾分析方法、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群众路线方法、以大历史观为基础的胸怀天下的方法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自觉和政治智慧,为推进共同富裕事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一) 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②,在实现共同富裕伟大战略上同样需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的目标预设上科学务实,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而是分阶段地渐进富裕,既要照顾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期盼,又要充分考虑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我们既不能不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也不能复制“福利国家”模式,超出政府实力搞高福利,既给国家造成很大压力,又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生产积极性,最终造成社会发展停滞。在节奏规划上科学、理性,将长远目标划分为“十四五”、2035年、本世纪中叶,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向前迈进,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需要和可能,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在路径上,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举措,提出科学可行的方案、意见和考核评估办法。最重要的是在基础前提下,正确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把共同富裕建立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在对共同富裕事业的谋划布局上,从实际出发处理好各方关系,既不超前也不落后,实事求是、稳扎稳打。

^① 叶雨婷:《4%:这个数字,守望教育公平与质量》,《中国青年报》2022年5月18日,第3版。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页。

（二）以辩证法为基础的矛盾分析方法

党中央在诸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诸多问题中抓住薄弱环节，从薄弱环节着手牵住“牛鼻子”，有效推进共同富裕问题的解决。党中央敏锐抓住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区域间、阶层间的不平衡。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会演变成政治问题，成为不稳定、不和谐的诱因。党中央从薄弱环节着手，政策更加注重向西部、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突出工作重点，聚焦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把着力点放在统筹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关系民生、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上，推动“七有”持续取得新进展，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强的获得感。在管党治党中，以反腐败为切入口，整治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腐败问题不仅仅涉及党的形象问题，更关乎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关乎党的凝聚力领导力。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力度和深度全面从严治党，抓住领导干部等“关键少数”，进行了制度建设，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开公平，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公信力空前提高。

党中央在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同时，兼顾全局，统筹协调，把握平衡，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系统而不是零散、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解决问题。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多环节关系，科学运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处理东、中、西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理顺农业、工业、国防、教育等各领域关系，既有重点又兼顾两点，既有所侧重，又不偏废一隅，全面整体关照改革进程，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生动实践。

（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群众路线方法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建设共同富裕社会全过程。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人民是这一伟大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同富裕全过程都贯穿着高度的“人民性”。新时代的富裕，是全民富裕，是不落下一个地区、不落下一个民族、不落下一人的富裕。中国共产党提出共同富裕的初衷是为了人民，为满足全体中国人民建设更加公平富足社会的诉求。共同富裕一头连着人民一头连着党，这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夙愿，是激励人民的美好愿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的体现。共同富裕依靠的力量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建共享”，依靠全体人民做大蛋糕。党始终强调这一伟大征程需要靠人民团结一心、守望相助、贡献智慧才能实现。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一直是一条基本原则，既强调顶层设计，也强调各项政策都要靠群众来落实。幸福生活是人民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永远是人民群众，要靠提高人民自觉性、受教育程度、组织程度、增强发展能力、致富本领，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发展环境，高度重视人民的智慧和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的力量绘就宏伟蓝图。

（四）以大历史观为基础的胸怀天下的历史担当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人类胸怀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认识和处理“两个大局”之间的关系，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世界人民。共同富裕实践使近亿中国人摆脱绝对贫困，是世界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减贫事业、人类发展、共同进步提供了重要经验和启示。中国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仅发展了自己，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力

量。今天世界各地依然面临普遍的贫困、两极分化、中产陷落、发展停滞等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撕裂、世界动荡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难题都需要全人类作出解答。

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共同富裕实践的实质是发展，关键在共同，不是只要自身发展不要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和天下胸怀。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自觉，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现代化不是哪个国家的特权”，发展起来的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后发国家，将全世界共同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资本主义现代化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进步性，为世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模式和路径，这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世界性课题的历史主动和历史担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①，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实现路径上，进一步明确，当今世界要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解决“时代之问”“历史之问”，必须促进国与国之间共建共享、共同繁荣，必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同富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共同富裕所包含的发展、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和普遍关切，因而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这一理念和实践引领人类进步潮流，推动世界实现共同、共享的富，全面、均衡的强，向包容、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是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之钥，为各国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中所蕴含的胸怀天下的方法论原则，实现了历史使命与时代主题的统一、民族精神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中国行动与世界发展的统一，是中国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28页。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以云南省网约配送员为例

黄银秀, 陈思璇

(昆明理工大学 法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新业态经济的兴起凸显了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的窘境, 其中以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缺陷最为突出。调研数据显示, 现今新业态从业人员尤其是网约配送员的职业伤害风险形势严峻, 制度完善需求迫切。当前, 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存在极大的缺口。首先, 现行法律制度适用困境问题, 网约配送员难以纳入现行劳动关系范畴予以保障; 其次, 现有传统职业伤害救济机制保障不足, 新业态从业人员面临工伤保险适用存在壁垒、商业保险保障力度不足以及民事侵权救济困难等情形。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特点及所存在的困境, 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工伤保险模式与商业保险模式路径的现实性、可行性, 探索新型职业伤害保障的路径是迫切且必要的。

关键词: 新业态; 职业伤害; 网约配送员; 专门保险

中图分类号: 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2023)04-0109-10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互联网平台以其通信功能、社交功能、大数据功能和移动共享功能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并提供及时或约定服务, 从而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 新就业形态兴起。新业态用工模式不同于传统行业, 具有组织方式平台化、时间地点灵活化、就业契约去劳动化等特征。^①新业态从业人员面临极高的职业伤害风险, 却因不具备典型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而无法参与工伤保险, 长期处于劳动权益保障的“洼地”。

目前,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2019年, 国务院对平台用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政策展开研究并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②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维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平台经济从业人员职业伤害救济实证法律研究——以云南省为例”(2023Y0457)。

作者简介: 黄银秀,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经济法; 陈思璇,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① 袁朝辉:《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状况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75—84页。

^② 《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号),第5条第1款,2019年8月8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8/08/content_5419761.htm, 2023年12月7日。

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外卖、即时配送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①同时，正式将“网约配送员”，即通过互联网平台，从事接收客户订单并根据订单需求，按照平台智能规划路线，在一定时间内将订单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服务人员，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

目前，网约配送员这一新职业群体仍处于“劳而欠保”的状态。本文以云南省网约配送员作为调研对象，实地走访云南省内14个站点、线上联系7个站点，以发放电子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本次调研共收集样本321件，排除因填写不完全而无效的样本6件，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14件。通过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发现其中在工作过程中遭遇过意外伤害的占调查样本的半数以上，且84.72%的网约配送员认为自己面临较大职业伤害风险。同时，网约配送员在经济基础、职业风险、休息条件等方面较其他新业态从业人员呈现出更大的脆弱性。其频繁驾驶电动车，面临巨大的安全隐患，但因没有交强险等强制性保险作为致第三人损害时的风险转移手段，职业伤害形势较为严峻。在此情况下，选取群体最为庞大的网约配送员为例，研究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效果将更有针对性。

实践中，大多数平台企业都将网约配送员分为“专送”和“众包”两个类别。专送骑手通常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且有底薪，由平台派单，按照接单量、好评率、准时率等计酬，按月发放薪资。众包骑手则无固定上下班时间，无须接受站点考勤，注册后即可上岗，可自由抢单、拒单。按照送单量计酬，且发薪周期不固定。通常来说，专送骑手的用工形式符合标准劳动关系，应归属现行劳动法律调整。而众包骑手，平台和站点与其签订的协议多数为内容模糊的“劳务合同”“分包合作协议”等，在认定劳动关系上存在巨大障碍，因而在遭受职业伤害时无法享受相关保障。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为众包骑手，后文以“网约配送员”称之。

二、新业态从业人员面临的职业伤害保障困境

（一）新业态从业人员适用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存在障碍

1. 传统劳动关系以“从属性”为基本的认定标准

我国劳动立法目前未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作出规定，实践中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一条，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②具体而言，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满足主体资格的情况下，从规章制度、劳动管理、报酬给付及业务组成等方面来界定劳动关系。同时，《通知》还将身份证件、聘用意见、考勤记录等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辅助凭证。但由于对规定构成要素的具体适用尚未明确，司法实践中仍面临依据不明、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的困境。而传统的劳动关系理论正是以从属性为核心，以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作为体系构成展开。

人格从属性是从属性的核心认定标准。具体是指在特定期间内，负有劳动给付义务一方对其时间无法拥有自由支配权。用人单位享有监督权、指挥权及惩戒权。用人单位指挥劳动者进行相应工作内容并安排工作时间、地点，同时监督考察其是否听从指挥。劳动者若违反规章制度则有

^①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 应急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医保局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总工会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第2条第9款，2021年7月16日，http://www.mohrss.gov.cn/xgk2020/fdzdgnr/zcfg/gfxwj/ldgx/202107/t20210722_419091.html，2023年12月7日。

^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1条，2005年5月25日，<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LBX201912031.htm>，2023年12月7日。

义务接受扣减工资、处分等制裁，从而使用人单位得以实现对内部秩序的维护。劳动者的人格从属性则体现在利他性和亲自履行性方面。劳动者基于用人单位的需求，亲自为其提供劳动服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丧失了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自由。

经济从属性是指劳动者为用人单位工作，并将所获报酬作为主要或唯一的收入来源。一方面，劳动者具有“经济资源依赖性”，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加工的生产原料、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均为用人单位所有。这种基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而产生的经济从属性，也是目前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的一个难点。另一方面，劳动者“无需承担经营风险”，即在劳动者忠实提供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发生危机，经营风险也由用人单位承担。经济从属性一度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重要标准。但以经济从属性为中心的界定方式可能导致具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劳动者被排除在外，进而出现无法获得保护的情况。因此，目前从属性理论更倾向将经济从属性作为辅助认定标准，以发挥其对“类雇员”的甄别功能，打破现行劳动法的二元保障体制。

组织从属性通常是指劳动者加入单位组织，并作为其中一员与其他组织成员配合完成工作。同时，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是单位组织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中，已经建立相应的符号系统及管理系统，劳动者被纳入组织的一部分，其劳动行为也在组织运行规则的控制下。但随着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变迁，组织从属性的独立价值也在不断改变。事实上，组织从属性仅仅是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直接指令转变为组织内部的间接指令，其本质上可以被人格和经济从属性所涵盖。因而，在现今从属性体系下更多作为补充认定标准。

2. 新型用工形态对劳动关系认定的冲击

在“互联网+”的新经济模式下，平台企业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劳动力资源供需信息的传递范围，从而减少了劳动力资源的交易费用。随之而出现的网约配送员，其在用工形式、劳动方式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劳动者，从属性趋向弱化。

首先，新业态从业人员享有较高程度的劳动自由，其对用人单位的人格从属性弱化。网约配送员能自主决定接单时间、工作时长及完成工作的方式等。同时，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劳动过程中几乎不受新业态企业直接指挥干预，网约配送员仅通过平台受到有限的监督、检查，这也极大地削弱了人格从属性。此外，平台企业因信息技术的发展，能利用大数据算法提前预测与知悉劳动者的行为，并将记录的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评价与网约配送员的薪酬挂钩。由此可见，平台企业面对众多网约配送员，选择将对劳动结果的监督权部分转移至消费者，以数据监控记录的方式弱化指挥管理，从而进一步削弱人格从属性。

其次，从经济从属性的角度来看，传统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多由用人单位供给，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当然也应由用人单位来负担。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新业态从业人员更多的是使用自己的劳动工具进行劳动。最为典型的的就是网约配送员，参加工作须自行提供交通工具并负担损耗费用，且该劳动工具不要求覆盖任何公司标识。可以说，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经济资源依赖性”正在减弱。此外，新业态从业人员的收入并非直接来源于平台企业，而是来源于大量消费者，其通过为不同用户群体提供服务而获取收益。同时，大量网约配送员也并未将该工作作为获取收入的唯一来源，其可自主选择成为专职配送员或是有空闲时间才上岗的配送员。随着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单一收入来源”标准遭受巨大冲击，这使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经济从属性削弱，劳动关系的认定更加困难。

最后，对于组织从属性，由于平台企业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程序开发，已在极大程度上实现线上生产与“非实物办公”，从传统角度判断劳动者是否加入单位组织并不适宜。同时，新业态用工模式较传统模式，劳动组织方式分散化，组织成员因缺乏工作协作而使关系趋向疏离。具体而言，

平台企业在接到订单后,会将零散的工作任务分配至各网约配送员,并不需要组织成员相互配合,成员之间甚至存在业务竞争关系,进而导致其缺失对整体性利益的共识。现行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是以人格从属性为主、经济从属性为辅,组织从属性则被视作其内涵的延伸,体现出对二者更强的依附性。^①因而,在新业态经济模式下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削弱,组织从属性自然也难以避免。

3. 云南省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争议审判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难以完全适应新就业形态,这成为当前劳动争议审判面临的挑战之一。本文选取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关系纠纷案件为样本,仅能从中窥探近年来司法实践的大概缩影。将“威科先行”(中国大陆法律信息库)作为案例检索平台,以“劳动关系—骑手”“劳动关系—美团”为关键词进行筛选,按照“民事/判决书/云南省”的检索条件进行筛选,截至2023年10月14日,分别检索到26个和39个相关案例。在遴选样本时,本文排除了虽出现“美团”“骑手”等关键词但与劳动关系认定无关的案件,并剔除重复、雷同的案例,最终分别筛选出25份和19份判决书,作为本文的分析样本。

需要说明的是,所选取的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争议案件是不完全样本,其分析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不完全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其一,案件检索路径的限制。检索平台的路径无法精确识别并筛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仅通过展现关键词的命中次数体现关联性强弱,因此还需要结合“骑手”“美团”等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其二,案件来源的局限性。案例检索平台的裁判文书有限,存在滞后性和不完全性。因此,本文主要依托“威科先行”(中国大陆法律信息库)检索云南省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纠纷案件,难以完全涵盖和反映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全貌。

相关数据显示,以“劳动关系—骑手”为关键词检索,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平台劳动纠纷25件,且平台与新业态从业人员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往往是该类诉讼的核心争议焦点。其中,确认劳动关系的10件,否认的15件。而以“劳动关系—美团”为关键词共检索到相关案件19件,确认劳动关系的8件,否认的11件(见表1)。

表1 云南省互联网平台用工劳动关系纠纷案件情况

	确认劳动关系	占比	否认劳动关系	占比	共计
劳动关系—骑手	10件	40%	15件	60%	25件
劳动关系—美团	8件	42.1%	11件	57.9%	19件

通过对判决进行综合分析,笔者发现,实践中法院在处理互联网平台劳动纠纷时,基本上依据《通知》第1条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形辅以各种判断要素,最后依靠法官自行裁量,从而出现“同案异判”。从近年来出现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关系纠纷的判决中可以看出,对于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例,法院对当事人的请求一般不予支持。但如果案件涉及工伤认定与赔偿,则判决结果通常倾向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具体表现为:第一,法院否认平台与从业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例仍较多,还有部分案例将双方认定为劳务关系;第二,在处理结果方面,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第三,在致第三人损害的案件中,损害后果与劳动关系的认定具有强关联性。法院或依据侵权法规则,或选择回避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而倾向于判决平台承担赔偿责任。总体而言,目前新业态从业人员寻求劳动法律保护仍存在障碍。

^① 肖竹:《劳动关系从属性认定标准的理论解释与体系构成》,《法学》2021年第2期,第162页。

（二）现有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救济机制保障不足

当前职业伤害保障体系的构建是以工伤保险为基础，平台公司再引导员工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若发生第三方侵权则寻求损害赔偿，从而形成立体的保障结构。^①由此形成并行的工伤保险机制、商业保险机制和民事侵权三方救济机制。以网约配送员为例：第一，网络配送人员与平台间签订“合作协议”或者“劳务协议”，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若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可以诉请法院要求平台承担工伤保险责任。^②第二，平台要求网约配送员按日缴纳不低于三元的商业骑手险。当其受到人身损害时，平台协助其向商业公司申请赔偿，并按照保险额度报销轻微伤所需的医疗费用。第三，第三人对网约配送员所发生的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可按一般民事侵权路径要求第三人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赔偿责任。目前，实践中三种机制并行却并无衔接配合关系，无法弥补各自存在的缺陷端。

1. 适用工伤保险存在障碍

劳动法律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其制度设计的保护对象为传统产业工人。在传统生产模式下，符合从属性标准即被认定为劳动关系，进而获得劳动权益保障。在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框架下，对劳动者权益保护采取二元制，即将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内，给予较全面的保护。反之则被排除在外，劳动者无法在最低工资、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劳动基准权利方面获得保障。这表明，劳动权益保障制度与劳动关系存在强有力的“绑定关系”。

工伤保险制度正是基于这种稳定的劳动关系而建立。但新业态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形态和就业方式进行了深度改造，传统工业生产所衍生出的工伤保险制度与数字时代灵活用工模式难以契合。大量新业态从业人员难以与平台企业直接确认劳动关系，从属性判断标准无法完全匹配适用，进而导致网约配送员在遭受职业伤害后申请工伤保险赔偿困难重重。具体而言，工伤保险要求确定劳动者身份，只有在劳动关系成立的基础上，才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责任。但网约配送员在请求确认劳动关系的过程中须经历繁琐的程序且耗费大量时间，往往既申请劳动仲裁后又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司法实践对于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纠纷审理标准不一，法官自由裁量幅度大，也加大了职业伤害发生时其申请适用工伤保险制度的难度。工伤保险这一救济路径是否适用取决于劳动关系是否确立，若否定，则只能寻求商业保险和民事侵权的救济。

2. 商业保险保障不足

在促进新业态经济良性发展，保障平台从业者人身权益的政策号召下，大多数平台企业都采用了商业保险的方式为网约配送员提供职业安全保障。具体而言，平台通常采取按日收取一定额度佣金的方式来购买商业保险。在此情况下，投保人为网约配送员，其直接与保险公司建立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种方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非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救济的有效途径。第一，商业保险保障水平低。商业保险具有“多投多保，少投少保”的经济属性，投保人所享受的保险待遇与其所缴纳的保费金额直接关联。网约配送员所缴纳的低额保费使其在遭受意外伤害时得到的赔付金额较低，亲属抚恤、后期康复等待遇缺失。第二，商业保险覆盖范围窄。通常仅包括意外伤害医疗费用、猝死补偿等，而遭受严重伤害产生的高额医药费并未被商业保险所涵盖。同时，在医疗期内还存在从业人员收入中断等问题，也无法通过商业保险得到有效解决。第三，商业保险理赔困难。商业保险设有诸多免赔条款，并设置严格的理赔条件和程序，网约配

^① 王天玉：《从身份险到行为险：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研究》，《保险研究》2022年第6期，第116页。

^② 详见《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工伤保险条例》，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第139页。

送员申请理赔困难重重。同时,依据举证规则,纠纷发生时网约配送员还须承担举证责任,这使其维权难度进一步加大。总而言之,虽然目前商业保险已基本实现在网约配送领域的全覆盖,但其并不具备长期保障性,无法从实质上解决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救济问题。

3. 民事侵权救济困难

调研数据显示,84.72%的网约配送员认为其在劳动过程中存在较高的职业风险,且认为“风险极大”的网约配送员占比28.03%。同时,调研发现,实践中网约配送员在接单过程中或轻或重地遭受过职业伤害的占比达50.32%。从职业伤害类型的角度分析,交通事故作为主要伤害类型占比92.41%。

网约配送员在遭受伤害后,若事故系第三者所致或第三者对事故负有首要责任,则网约配送员可依据普通民事侵权之诉获得救济。但目前新业态从业人员遭受职业伤害的保障问题无法完全依赖民事侵权的救济。民事侵权救济周期长,很难及时解决医疗费、误工费及生活开支,网约配送员在此期间的生活负担进一步加重。同时,网约配送员举证难且实际获得的赔偿有限。特别是在侵权人财产不足的情况下,由此带来的社会困境愈发凸显。^①

三、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路径分析

“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②因此,针对当前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所面临的窘境,从法理层面和现实层面分析现有的纳入工伤保险模式路径与采用商业保险模式路径的合理性和现实性,进而借鉴以上两种模式的理论制度经验,对于健全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专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具有积极意义。

(一) 工伤保险路径分析及其弊端

纳入工伤保险模式是指将新业态从业人员直接纳入现有工伤保险制度中予以保障,从而使其获得彻底的、公正的职业伤害保障。当前,该路径的赞同者主要通过普世的公平正义、劳动权保障等理论论证工伤保险模式的正当性。他们认为基于公平正义理论及劳动权保障理论,应当对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新业态从业人员予以一定的差别待遇保障其劳动安全。同时,由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风险在本质上与传统劳动风险具有同质性,应当将其与传统劳动者同等纳入工伤保险予以保障。

但是,以上理论并未正面回答工伤保险路径的核心问题,即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解绑问题。当前,我国工伤保险制度是基于雇主责任理论依托劳动关系所设立的,着重依赖劳动者的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而新业态从业人员并未与新业态平台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不能直接适用工伤保险。为解决这一法理适用问题,部分学者主张对现有的工伤保险制度进行扩大解释,从而将其扩大适用于新业态从业人员。娄宇教授就从传统劳动关系实际控制权的产生基础时间和流程要素分析,阐明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作时间如足够长,则可能在客观上满足延续性的要求,从而在实质上与源自人格从属性中时间要素的一些劳动权益类型相关联。^③但人格从属性强调的是用人单位对从业人员的实际控制权,因此即便从业人员客观上具备了时间要素,新业态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实际控制程度也不能与传统劳动关系相等同。除此之外,另一部分学者倡导解绑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将工伤保险适用主体扩大至新业态从业人员。张荣芳教授认为,基于共享发展理

^① 苏炜杰:《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制度:模式选择与构建思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21年第3期,第74—90页。

^②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9页。

^③ 娄宇:《新业态从业人员专属保险的法理探微与制度构建》,《保险研究》2022年第6期,第106—107页。

念，将新业态从业人员排挤在社会保险团体之外，使其仅承担高价的商品和服务，却不能通过社会保险分散其风险是对从业人员的一种剥夺。^① 但我国当前并不具备社会保险完全社会化的经济基础，贸然解绑不仅会加重民事法律关系中用工主体责任，还会颠覆现有的民事劳务关系责任分配现状，从而引发一系列新问题。同时，也将面临工伤认定标准模糊，工伤保险边界难以确认等问题。

工伤保险模式作为当前地方试点的主流选择方案之一，总体来说是对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问题进行的有益探索。但从我国地方试点的具体实践来看，早期将新业态从业人员整体纳入社会保险的潍坊、南通方案^②，即使是在严格限制参保资格、参与人数的情况下，将新业态从业人员缴纳经费与工伤保险基金进行统收统支，也依旧对试点地区传统工伤保险基金产生了一定冲击，导致部分试点工伤基金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另有后期将工伤保险单独排除于社会保险团体之外，从而将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的浙江、广东等方案^③，虽然对新业态从业人员缴费与传统工伤保险基金进行了分离，对其专门管理。但在工伤认定方面也存在将工伤认定标准直接套用于职业伤害认定的问题。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作其灵活度较高，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简单以传统的工伤认定标准衡量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问题，严重限缩了职业伤害的范围，从而导致试点过程中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的保障力度严重不足。以江苏太仓为例，截至2016年底登记参加职业伤害保险人员已达2万多，但真正认定为工伤并予以保障的仅有59起。^④

（二）商业保险路径分析及其缺陷

鉴于当前工伤保险制度与劳动关系的深度绑定状态，纳入工伤保险路径在当前并不现实。故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转而开始关注商业保险模式，认为新业态从业人员实质上是以放弃一定标准的社会保障水平换取更为灵活的工作方式以及更高的工资待遇。因此基于利益平衡原则，平台企业与新业态从业人员仅构成劳务关系，仅需依据过错原则在其对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存在过错时承担相应责任，不需要承担用人责任。因此新业态从业人员想要规避工作中的职业伤害，就需通过自行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转嫁职业风险。

首先，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问题是一个社会化问题，不应当被局限于新业态平台企业与从业者之间，更不应当将新业态职业伤害问题转嫁给劳动者个人。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深化，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务实际串联了全部社会成员的利益。以外卖行业为例，平台企业作为网约配送员的用工单位，其利益获取方式为通过网约配送员劳务活动吸引消费者注册，从而获取数据信息并通过分析数据获取广告及其他增值费用；外卖商家作为网约配送员的“临时共同用工企业”，其可通过配送员的配送服务拓宽其营业服务范围，从而获得更多的销售金额；与外卖商家相似，消费者可通过配送员的及时配送便捷其生活、提升其生活质量。因此，基于共享发展理念，网约配送员在此劳务过程中产生的职业伤害风险应当纳入社会保险予以保障。其次，采用商业保险模

① 张荣芳：《共享发展理念下社会保险体系的完善》，《东岳论丛》2019年第2期，第134页。

② 廊坊、南通方案为直接参加工伤保险的试点方案，工伤保险的缴纳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同步征收，由灵活就业者自行承担，并将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工伤待遇给付责任转嫁给参保人，同时其将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费直接纳入现行工伤保险基金进行管理。

③ 浙江、广东方案为单工伤保险试点方案，其将工伤保险的参保与其他社会保险种脱钩，转而要求平台企业承担工伤保险费用缴纳的责任，同时对单工伤保险缴费进行专门管理，但在工伤认定层面上仍以传统工伤认定标准为主。

④ 陈韞竹、倪宏：《关于现阶段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思考》，《中国医疗保险》2017年第10期，第64页。

式将面临制度错位问题,不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整体统一性。长久以来,商业保险是作为社会保险的“历时性补充”,是为进一步提升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质量,保障其获取更好的发展机会与享受体面生活的“进阶性权利”而存在的。^①因此,忽视社会保险的兜底性保障作用,采用完全商业保险模式路径势必致使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欠缺层次性及强制性。

当前,现有商业保险主要由新业态企业牵头设立,通过与保险公司联合推出,由新业态从业人员强制购买的商业保险,初步终结了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零保障状态。除此以外,苏州吴江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开展政府主导的商业保险模式。然而,因商业保险具有逐利性的本质,其首先面临属性冲突问题。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言“商业公司的本质是逐利”,商业保险产生的根本目的也在于营利,这便与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非营利性存在内在冲突。即使是在政府主导购买服务的吴江区,保险承办机构也从保费缴纳水平与保险待遇差中获取了相应利益。此外,商业保险也面临保障性性价比不对等的问题。以美团为例,网约配送员每月平均保费为90元,但保障内容仅为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及医疗费用,并具有最高5万元的赔付限额^②。在吴江区的试点过程中,其保障水平也仅为现行工伤保险的一半,且对伤残、死亡从业人员并未设置长期待遇,同样缺乏误工费基础保障。

基于以上分析,纳入工伤保险模式和采用商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宜解决我国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困境。因此,针对新业态职业伤害特点和所存在的困境,探索建立专门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新型保障之路是迫切且必要的。

四、云南省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完善思路

(一)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专门保险的构建依据

因新业态从业人员欠缺传统劳动关系认定中的核心组织从属性及人格从属性,且大部分并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因此简单将其纳入工伤保险是不现实的。同时,由于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存在的,因而也不适宜采用商业保险模式。故在此基础上,坚持社会保险的基本属性,在现有工伤保险基金基础上另行构建独立的专门职业伤害保障基金,并通过制度设计促使政府、从业人员、企业合理分担职业伤害风险的专门保险模式值得探索研究。

社会责任原则与利益平衡原则是构建政府、企业与个人分担职业伤害风险的专门保险制度的法理依据。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利益的重要手段,应当发挥相应的社会责任,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予以保障。故在我国传统保障机制对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问题保障力有不逮的情况下,法律应当积极为构建专门职业伤害保险提供相应的制度基础。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其风险分担责任应当由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分担。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③政府应当在保证新业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对处于相对弱势地

^① 张双梅、谢小弓:《商业保险制度:工伤劳动者权益保护之补充》,《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249页。

^② 数据详见“美团众包”APP中“骑手保险”模块保单详情,另见王月兰、曾晓佳《美团骑手综合险的理赔优化分析》,《市场论坛》2019年第12期,第53—55页。

^③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第30页。

位的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予以特殊关注，主导开展新业态职业伤害专门社会保险试点工作，并通过一定的财政支持保障试点工作的开展，从而为新业态从业人员提供兜底性、基础性、强制性的保障制度。其次，平台企业应当进行风险分担，通过平台算法的精准计算实现对从业人员的有效使用。职业伤害风险看似与企业不存在直接关联，但其实质是大数据算法下诱发的不安全因素导致的。因此，新业态企业具备负担用工安全保障义务的基础。同时，调研数据显示，平台企业在每一配送订单过程中通常会从商家与骑手处共计抽成40%左右^①。因此，固然网约配送员群体庞大且易发职业风险，但精准的利益算法构成足以支撑平台企业按一定的比例分担从业人员的风险。最后，对于从业人员而言，分担风险并不等同于完全不承担。新业态从业人员相较于传统劳动关系具有更强的自由性及更大的选择空间，实践中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产生的原因虽离不开平台企业算法的诱导，但究其根本从业人员对于职业伤害的产生具有更高的过错，从业人员对职业伤害发生的原因作用力度更大。因此，从业人员应当根据过错原则自行负担部分职业伤害风险。

（二）云南省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险制度的完善建议

法理证成是制度设计的初步考量，其目的在于论证制度的“应当”且“合理”的可预性要求，而制度要为广大群众所普遍认可，就必须通过制度框架的试点落地实践，并通过试点对现有制度进行健全完善。实际上，近期我国新一轮的专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相继开展，海南省开展的由平台企业按单为从业人员投保的新型专门保险模式更是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②。云南省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省份之一，新业态从业人员群体不断扩大，职业伤害保障形势也日趋严峻。对此，2021年底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云南省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业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云人社发〔2021〕40号），但受制于经济发展等原因，云南省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范围、力度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参考海南模式^③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云南省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势在必行。

首先，就专门保险保障主体范围而言，部分学者主张专门职业伤害保险要涵盖所有不属于应当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就业者群体，以期为所有未能纳入工伤保险保障的劳动者提供兜底保障。但笔者认为这一主张缺乏合理性。将所有非劳动关系的主体全部纳入专门职业伤害保险并予以与工伤保险相当的保障力度，其实质就是“工伤保险”完全社会化。那么，直接将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解绑其实是更为合理的选择，新设保险完全没有必要。除此以外，将非劳动关系主体全部纳入专门保险，无疑颠覆了传统民事劳务关系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变相加重民事用工主体的责任。因此，专门保险主体的覆盖范围应当仅包含新业态从业人员。平台企业对新业态从业人员具有较之劳务关系更为严格的管理，其依靠科技信息手段——通过互联网进行算法考勤、绩效考核等新型管理方式是传统劳务关系所不具备的。综合而言，云南省试点的专门保险的主体覆盖范围应为所有通过平台注册并在云南省行政区域内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劳动并获得报酬或者收入的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平台从业人员。

其次，就专门保险的参保形式而言，合理分配平台企业与从业人员的缴费责任，通过设计不

^① 该数据是笔者基于实地走访昆明市内的14家美团站点，访谈部分美团骑手所推算的大概数据，因调研数据有限，具体抽成情况可能存在出入。

^② 林琳：《数字经济对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影响及其实践路径》，2023年5月10日，<http://news.hndaily.cn/resfile/2023-05-10/005/hnr20230510005.pdf>。

^③ 海南模式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将在其行政区域内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由用工平台企业根据《海南省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试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按单缴纳工伤保险保费，并对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保费进行专门管理。

同行业标准按单缴纳保险费用更为科学合理。从地方试点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专门试点的缴费责任主要采取雇主责任制,将缴纳责任全部归于平台企业。但依据权利义务平等原则,平台企业对于职业伤害的风险产生缘由的作用力度远弱于传统劳动关系,甚至弱于从业人员个人。因此采取完全的雇主责任,对用工企业是不公平的,且不利于新业态经济下中小平台企业的发展。因此,合理划分平台新业态企业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责任是必要的。笔者认为,云南省专门保险试点的具体缴纳形式上可参考海南省的试点经验,根据不同行业的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缴费标准,采用浮动费率以单位标准按月缴纳。这样,更贴合新业态从业人员任务制的工作特点,且不需面对固定基数按月缴纳所面临的多雇主保费分担问题。根据不同行业职业伤害风险产生概率设计不同标准,并采取浮动费率是保障专门保险基金正常运行的必要手段。

再次,就专门保险中职业伤害认定而言,应当突破传统工伤认定标准,在以“执行平台订单任务”为核心的基础上,采取“概括+例外”的形式具体明确职业伤害的认定标准。新业态从业人员区别于传统劳动者,传统工伤认定“三工”原则并不适宜职业伤害认定。因此,结合网约配送员订单配送制的工作特点及按单缴费的参保形式,采用“为完成特定订单服务+订单服务执行过程中”更为贴合。“为完成特定订单服务”强调引发职业风险的行为应当为与完成特定订单服务具有必要关联性,即订单服务执行过程中从业人员故意为与完成订单服务不具有必要关联性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职业伤害;而“订单服务执行过程中”其字面含义是指从业人员在平台上接到特定订单到该特定订单在平台上被确认完成这个过程,但参考传统工伤保险制度中关于“上下班途中”的法律规定,对“订单服务过程”应当予以一定的扩张解释,即对于完成特定订单服务后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线也应当予以相对保护。

最后,就专门保险保障水平而言,云南省初期试点阶段应当重点关注基本医疗问题与职业伤害期间的生活保障问题。固然作为工伤保险项下独立的专门保险,在理论上专门保险的保障水平上应当与工伤保险保持一致,避免出现“同命不同价”的问题。但基于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考量,初期专门保险将职业伤害待遇与工伤待遇完全等同并不利于专门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在云南省专门保险试点过程中,应当抓住基本医疗及生活最低保障这一核心重点,全面保障从业人员的医疗待遇、工亡补助费用及伤残补助费用。再者就传统工伤保险制度中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停工留薪工资及护理费等费用,比照工伤保险标准完全由用工的平台企业承担并不现实。即使平台企业可通过购买雇主责任险等分担此风险,但用工单位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用人单位。为推进试点工作的顺利展开,以基本生活保障费用取代停工留薪工资并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方式分担企业的此项风险责任未尝不可。

五、结语

当前,云南省新业态从业人员群体庞大且职业伤害保障力度有限,可以学习借鉴海南模式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云南省经济发展情况对参保主体、参保形式、职业伤害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等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探索,是完善云南省新业态专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李亚强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年 1—4 期

(总第 97—100 期) 总目

-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刘树升 (4.18)
- 论新时代政治监督的科学内涵与实现形式 周朗生 (1.5)
-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领导干部网络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研究 吴 韬, 钟启超 (1.17)
- 统战理论与实践**
- 新的社会阶层三种组织建设模式比较 张 毅 (1.25)
- 人民政协凝聚乡村能人政治共识研究 闫红果 (1.34)
- 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班印正, 储 娟 (1.42)
- 中国古代统战形态、缘起及经验 宁小苏 (1.50)
- 湄公河国家华人新移民助推澜湄合作研究 刘海丹, 余海秋 (2.5)
- 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学术交流综述 念兴昌, 沈 艳 (2.13)
- “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研讨会综述 刘林华, 李亚强 (2.21)
- 统一战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尹学朋, 秦晓明 (3.5)
- 香港青年国家安全教育现实意义、现状与路径 盛渤乘, 陈卓武 (3.11)
-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软件和 CSSCI 文献的分析 杨松禄, 张 泽 (3.18)
-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研究述评: 基于系统化的思路 袁竞闻 (3.34)
- 中央治港方略中的底线思维探析 高明鸣 (4.5)
- 统一战线与宣传思想文化的逻辑关联 吉伟涛 (4.12)
- 统一战线共识教育的问题与创新路径探析 刘树升 (4.18)
- 新时代政协新闻宣传创新路径探究 张莹莹 (4.25)
- 协商民主**
- 协商民主研究现状与前沿热点分析 夏晓丽, 夏蓝天 (2.25)
-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研究——基于湘潭市的实证分析 唐 欢 (2.36)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及发展路径研究 张志远 (1.57)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宪法意蕴 辛庆玲 (1.66)
- 国内学界研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热点议题与前沿动态——基于 CNKI 文献可视化分析 施德君 (1.80)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与实践旨归 王蓉蓉, 马志芹 (2.44)
- 我国边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陆海发, 王淑萍 (2.52)
- 基于多民族文化共生的云南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理机制研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王瑞花 (2.65)
- 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意义、内涵和路径 李应伟 (2.75)
- 民族互嵌式社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社会基础 马国芳, 叶 浩 (3.45)
- 交往交流交融: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文化动力——云南鹤庆县新华村银匠个案 谷家荣, 孙雨彤 (3.55)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讲好民族团结交融史话 薛 昊 (3.63)
- 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现实

- 困囿与纾解路径 王俊玮, 蒙 莉 (3.70)
- 边疆治理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 董国菊 (4.32)
- 藏羌彝走廊: 中华民族共同体要素、特质、共同性的具现 王 芬 (4.41)
- 中华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边境幸福村文化建设研究
——以临沧市44个沿边行政村为例 唐 伟 (4.47)
- 演进·热点·展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探析
——基于VOSviewer的CNKI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李俊余, 安 敏 (4.54)
- 历史与文化**
- 马叙伦的民主立场、民生意识与党派合作理念 陈红旗 (1.94)
- 民族地区乡村民族文化建设现状及发展路径探析
——以弥勒市为例 杨庶嵘 (1.103)
- 云南傣族文学艺术中的生态文化 周 露 (2.81)
- 从“想象的云南”到“形象的云南”
——论曾昭抡《缅边日记》对云南的“发现” 余梦成 (2.88)
- 清朝石屏罗凤彩文学家族考说 陈友康 (3.75)
- 保甲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在民国时期的重建 杨明辉 (3.87)
- 缘水而起: 一个彝族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互动关系研究 钟瑞华, 许姝钰 (4.64)
- 逻辑、困境和路径: 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和发展的多维思考 郭 路 (4.72)
-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治理秩序建构 陈 静 (4.79)
- 非遗保护传承应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基于云龙“耳子歌”个案的思考 叶 莹 (4.87)
- “西南联大精神”的多维赓续及其当代价值 余梦成, 李直飞 (4.93)
- 发展问题研究**
- 社会灾难与社会重构: 论黑死病对欧洲社会演进的影响 李亚强, 刘林华 (1.109)
- 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请求权主体缺位问题研究 黄魏思思 (1.115)
- 文化自信视域下短视频“热”的“冷”思考 骆 丹, 魏明勇 (2.95)
- 共同富裕背景下山区乡村跨越式发展的路径探寻
——基于柯桥区南部三镇“党建共富联盟”的个案研究 费 婷 (2.102)
- 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效果的影响机理
——框架建构与案例分析 张红凤, 陈晓彤, 杨方腾 (2.112)
-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困难挑战及其解决场域研究
——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谈起 刘大程 (3.95)
- 再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超越
——基于“民主”的视角 王付欣, 郭笑笑 (3.103)
- 嵌入性理论视域下新乡贤赋能农村基层党组织振兴的实现路径 陈毓铝, 赖昕铖 (3.112)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钱仕英 (4.100)
- 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以云南省网约配送员为例 黄银秀, 陈思璇 (4.109)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 重点征稿选题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主管、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公开发行的政治类社科期刊，也是云南省唯一公开发行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类学术期刊。

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致力于做好对党的创新理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的研究宣传阐释，在全省、全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逐年提高，竭诚欢迎专家学者惠赐稿件。

一、2024年重点征稿选题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与统一战线研究
- （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 （五）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六）统一战线与“两个结合”研究
- （七）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与统一战线研究
- （八）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 （九）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所涉重大关系研究
- （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 （十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 （十二）统一战线与社会治理研究
- （十三）统一战线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
- （十四）统一战线领域重大风险隐患防范及化解研究
- （十五）统一战线历史与统一战线人物研究
- （十六）统一战线中的云南故事研究

二、来稿要求

- 1.稿件做到政治导向正确，主旨鲜明，论证充分，逻辑严密，格式规范，行文简洁流畅准确。
- 2.稿件字数以8000-12000字为宜，原则上不超过15000字，格式按照《〈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投稿体例格式规范（试行）》（详见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官方网站）要求调整。
- 3.稿件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原则上查重率不超过20%，参考文献不少于15条。
- 4.投稿后两个月内没有收到稿件修改意见或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 5.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对录用稿件采取优稿优酬，来稿请投学报邮箱：ynsyxbjb@163.com。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2023年12月1日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1999年创刊)

2023年12月 第4期(总第100期) 第25卷

主管: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650031

联系电话:0871-68091598

电子邮箱:ynsyxbbjb@163.com

出版日期:2023年12月20日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Started in 1999)

Dec. 2023 No.4 (Sum.100) Vol.25

Responsible Institution: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No.221 Wu Yi Road,Kunming City,PRC

Post code:650031

Tel: (0871)68091598

E-mail: ynsyxbbjb@163.com

Published: Dec. 20, 2023

ISSN 1671-2811



9 771671 281234

定价: 9.00元